

統一書號：10019·1788

定 价： 0.42 元

目 录

- 一家橡胶厂的剥削帐 頁仲琳整理 (1)
- 用工人血汗創立的“家业” 徐妙祥 (9)
- “文明監獄” 石 英 (18)
- 刻骨恨 韓映山 (39)
- “罰款通知单” 刘道华 (54)
- 从一包棉紗变成百万财产 何仁初 (59)
- 在“二衙門”里
.....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 济宁火柴厂党委办公室通訊組 (70)
- “蛋大王”的伎倆 张仁宝 (78)
- “一毛不拔”的梁新記 关学成 (91)
- 药老虎发家史 张文显 (98)
- “鞋帽大王”的生意經 中共黃浦区鞋帽公司
..... 总 支 委 員 会 (109)
- 道德油厂老板的“道德” 周荣隆 (116)
- “黑心店”老板的“花样經” 徐爱琪 (122)
- 一幢大楼的变迁 唐家俊 (134)
- 柜台生活四十一年 曹杏声 (142)
- “广告大王”的“門檻” 郭性善 (155)
- 在“40000”的后面 黃玉成 (164)

一家橡胶厂的剥削帐

“上工正是五更头，手里拎着饭罐头，冲进厂门抢梳头，领班找儂触霉头，汽油味道熏昏头，生活做到半夜头，整年吃的萝卜头，衣服烂成碎布头，合家一条破被头，小囡绑在床横头。”这首《十头歌》流传于解放前上海的一家橡胶厂里，它形象地反映了工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悲惨生活。

这家橡胶厂，解放前拥有六个制造厂、三个原料厂、一个机修厂，以及本埠外埠二十几所销售机构，职工人数最高时达四千余人。但是，这家工厂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规模。当一九二八年创建的时候，它仅有八万元资本，八十三个工人，主要生产设备是开放式炼胶机三台、硫化罐两只。这家工厂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用工人的话说：“那是我们的血汗凝成的。”

招收工人的苛刻条件

这家橡胶厂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工人们大多是贫苦农民。资本家招收工人，都要进行严格挑选，条件十分

苛刻。当时，由于粥少僧多，资本家就采取了“考试”的办法。首先要工人赛跑和举石担，看你跑得快不快，力气大不大，接着便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录取标准是：皮肤黑、手脚粗、年轻力壮，最好是不识字。对女工有所谓“四不要”：怀孕不要、脸黄不要、胖的瘦的不要（瘦的没力气，胖的行动不便）、衣着好的不要（怕吃不了苦），而且还要女工走一圈，怕的是招进跛足拐脚的人来。

录取的工人大多是该厂老工人的亲属，资本家有言在先：“一人出事，合家开除。”他们用封建宗族关系来控制工人，迫使工人逆来顺受，不敢反抗。

名目繁多的“厂法”

自一九三四年起，橡胶厂的资本家建立了“保单”制度，工人进厂做工要有保证人，填保单，隔一段时间还要对保一次。保单上这样写着：“被保人如有违背公司规章，……致使公司蒙受损失时，一经查明，通知保证人，愿完全负责，立即如数偿还。倘有被保人避匿不出，亦由保证人寻覓，决不推诿，并愿遵守下列各条件。”其中共有六条很苛刻的条件，如第一条是：“保证人对于应负清偿之款项，自愿抛弃先诉抗辩权、检索权，依照公司所开数目立即偿还，决不借口向被保人查询或用其他任何理由冀延时日。”

资本家还蛮横地要工人交纳什么保证金，厂法规定：

“凡經本厂檢驗(合格)录用的临时工,为表示双方誠实雇
佣关系起見,每人必須交納保證金国币伍元。”进厂做工
的都是些赤貧如洗、走投无路的穷人,为了找保人、筹保
证金,不知要費多少周折化多少冤錢,人还没有进厂就先
背了一身的債。

进厂难,做了工人更难。资本家为了加紧剝削,强制
工人付出最大限度的劳动力,制定了一套花样百出、名目
繁多的“厂法”,共計三十八条之多,違反了哪一条也得受
罰。他們就是想用这样一套“紧箍咒”,迫使工人規規矩
矩、服服貼貼地为他卖命,任其宰割。当时,厂里常用以
处罰工人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开除:厂法明文規定:“凡符合下列六条者即行开
除:在規定所在地以外吸烟者;两人以上打架者;阻撓职
权者;窃物(无论巨細)者;胁迫行为者;为首搗乱者。”此
外,“連續三天曠工”、“屢次迟到”、“服务不勤”、“出言不
逊”……又都是些“明文”以外的开除原因。其实,这都是
官样文章,只要资本家想开除工人,随手抓个原因也能扣
在你的头上。如女工周林妹因家里有孩子,下班后匆匆
出厂,不留心口袋里放了一点草紙,资本家发觉后誣她
“盜窃”,立即被开除。又据資方材料記載:“內胎临时工
徐阿凤,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上午七时五十分,自己不
开工,反責他人巴結,如此懶惰成性,已非一次,为警誡以
后計,即日着予停职处分。”許多工人就是这样被资本家
无理开除了,仅一九四〇年被开除的工人就有六十三人

之多。

二、罰款扣薪：凡“工作大意”、“口角”、“毀坏公物、糟蹋原料”等，都要罰款扣薪。有个工人损坏了一只螺絲，被扣工資二元，并且接連扣了几个月才算数。另一个工人弄坏了一个齒輪，竟被扣了半年的工資。套鞋剪口工人朱小妹的一把剪刀用了半年，自己磨了磨，資本家說磨坏了，硬要她賠了一元八角。打眼部女工薛玉琴不慎在一只球鞋上多打了一个眼，資本家硬叫她照价买去。陶金宝因向旁边的姊妹說了声：“今天的鞋面硬呵！”便被扣掉两双鞋子的工錢，理由是上班不能說閑話。一九四〇年一年就有一百零六人受降薪罰款的处分。

三、罰停工：凡“不听調配”、“高声叫喊”、“擅自搬取棺头”、“下班后沒有扫地”等都要罰停工。罰停工时要一声不响規規矩矩地坐在位子上，否則，就要再罰。有个工人多搬了一块“面子板”，就被罰停工四小时。老工人薛阿仁因資本家无故罵他，还了句嘴，就被罰停工七天，弄得难以糊口。

除此以外，还有記过、留厂察看、写悔过书等等方式。更恶毒的还有人身污辱，如罰立正，双手側平举等。甚至把工人双手反縛，敲鑼打鼓到各部門去“游街示众”，然后再开除。

不仅是生产工人，就是中小職員也同样受到資本家的迫害。資本家为了专利，对技术工人控制极严，技术工人要訂終身保密契約：“若是泄密，願受法律制裁。”一个

姓包的技术員，还是总經理的亲戚，只因将鞋子的样式告訴了別厂，全家都被开除。配药工人薛福祥因生活所迫，下班后又到另外一家橡胶厂去做工，資本家知道后，立即把他抓来，吊打了半天。

这种封建式的专制統治，压得工人們透不过气来，工人們气愤地說：“不做餓煞，做做气煞、苦煞。”

恶劣的工作条件

在解放前，尽管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厂，但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厂房、工場破旧失修，杂乱不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夏天象蒸籠，冬天象冷宮。”車間里除了簡陋的生产設備外，什么都沒有。一到冬天，胶料发硬，干起活来双手痠疼，操作困难，工人們只能多用些汽油来軟化它。汽油用多了，使得工人手上皮肤破裂，鮮血淋漓。夏天，資本家为了减少汽油蒸发，不准开窗，致使工人当中汽油慢性中毒現象相当普遍，患头晕的女工，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許多工人都患头疼目眩、关节疼的毛病。

那时，軋炼橡胶都用开放式炼胶机，因缺乏安全防护設施，加上作业場地狹小，劳动時間过长，經常发生断指折臂等工伤事故。資本家只重机器不重人，对工人死活漠不关心，甚至当你受伤殘废不能再为資本家卖命时，就把你一脚踢开。如工人张云溪等都是这样被資本家解雇

的。老工人薛山如的遭遇更悲慘，他在一次事故中，左手四个指头各被軋掉一节，资本家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答应负责治疗，但他为了节约医药费，通知医院用最快最便当的方法治疗，结果把手腕一刀锯断，使老薛成了残废。

资本家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还故弄玄虚，利用封建迷信来蒙蔽工人，说什么机器到了一定时间就要“吃人”，企图使工人相信，发生人身事故、断手断脚是“命里注定”的。有一个时期，每逢初一、十五，资本家叫人在车间摆祭桌、烧纸锭，每年还要请道士做道场，愚弄工人，麻痹工人的斗志。

工人的悲惨生活

为了残酷地剥削工人，资本家尽可能多用临时工，每个临时工都得订立契约，只以三个月为期。契约上写着：“如生意清淡，随时可以解雇。”所以临时工职业没有保障，天天提心吊胆，怕打破饭碗。资本家还用各种手段把原来的长工也降为临时工。解放前，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都是临时工。不少工人已经做了十几年，还是个临时工。

资本家怕工人起来斗争，把临时工分为两等：一等是红色的工卡，叫“红临时”，一等是蓝色的工卡，叫“蓝临时”。“红临时”比“蓝临时”的待遇稍好些。资本家居心险恶，企图借此来分化工人的团结。

工人們工作時間長，工資收入低，生活沒有保障。當時，流行着兩句話：“從雞叫做到‘鬼’叫，混不到一家開銷。”許多工人都是借債度日。資本家雖然明文規定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小時，但實際上是沒有限制的。在一般情況下，從早六點做到晚八點。但生產膠鞋有季節性，每到雨雪季節，銷路最旺，資本家為了多賺鈔票，不管工人死活，便硬派大家工作十七八個小時，甚至二十小時。有一次，有部煉膠機壞了，資本家叫工人張鵬舉去修理，硬逼着老張持續修了三天三夜，眼都沒合。修好后剛要睡覺，又被叫去修另一部機車，一直搞到第四天下午。老張終因積勞成疾，得了重病。

到了淡季，生產不忙，便大批解雇工人。老工人朱玉良做了十多年臨時工，四進三出（被解雇好幾次），受盡生活的折磨。僥幸未被解雇的，資本家則是百般挑剔，雞蛋里找骨頭。如做鞋子的女工，經常是被逼着拆了再做，做了再拆，一天做不了幾雙鞋子。女工丘新妹做了四十雙鞋，全被認為不合規格，要她全部拆了重做，結果只算八雙鞋的工錢，气得她在廁所上吊尋死，險些送命。

一九三九年九月，資本家惡毒地實行輪班工作制，每兩月輪換一次，使一千八百多個工人處於半失業狀態。到一九四二年一月，除了留廠二百零七人外，其餘一律強迫遣散，造成各種慘劇。被解雇的工人東奔西走，尋找出路：有的打短工，有的做娘姨，有的流浪街頭淪為乞丐。

至于工人的吃、住，就更苦了。一般吃的是雜糧、蘿

卜干加盐。很多工人都到街上或菜場去拾菜皮；住的是棚屋、茅房，許多人挤在一起睡地鋪，也有的工人全家露宿街头。好多工人生下孩子无力撫养，送进“育嬰堂”，实在舍不得的，上班时只好綁在床上。工人患病无力医治，請病假还要扣薪金。修理部工人张国如有病不敢請假，一边吐血一边干活，活活被折磨死了。不知有多少工人兄弟就这样被資本家活活吞吃了。

在旧社会里，工人就是这样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压榨、摧殘，“不做餓煞，做做气煞苦煞，‘排头’当飯吃，眼泪当茶咽。”这正道出了工人的苦衷，同时，也道出了資本家为了个人发财，不惜用尽种种手段，損人利己。天下烏鴉一般黑，資本家哪一个不是靠剝削起家的呢！

頁仲琳整理

用工人血汗創立的“家业”

上海大隆机器厂工会主席 徐妙祥

殘酷剝削学徒起家

大隆机器厂从一家弄堂小作坊，发展到解放之前成为私营机器制造业中数一数二的大厂，这是与资本家对学徒的殘酷剝削不可分的。

我是这个厂的老工人，深知资本家許多不可告人的罪恶，也熟悉这家厂的资本家是怎样发家的。

资本家严裕棠本来是一家铁厂的跑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捞到了不少外快。一九〇二年，他和一个铁匠出身的人合伙开办大隆机器厂，在楊树浦梅家弄弄了两間平房，雇了六、七个工人和四个学徒，为几家絲厂和軋花厂做做修理生意。严裕棠感到生意蛮好，有利可图，就把另一个合伙的人排挤出去，当了大隆厂的独资老板。又在光复路购地七十多亩，開設新厂。工人和学徒最多时有一千几百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资本家把光复路的全部动产（机器設備、原材料）統統搬到当时越界筑路的諸安浜，于一九三八年以美商名义重新開設“泰

利机器厂”。上海淪陷后，在光复路的不动产（土地、厂房）由大隆資本家勾結日寇以一百八十五万日元卖給日本帝国主义，由日寇重新安装机器进行經營，改名为“大陆铁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陆铁厂”由国民党資源委员会接收，改名为“上海机器厂第一厂”。到一九四七年，大隆資本家又勾結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原业主”名义用原价的几千分之一的代价买回大隆厂。因此，自一九四七年九月起，仍由大隆資本家經營，仍为“大隆机器厂”。

严家老板所以能这样“发财致富”，完全是由于他們殘酷地剝削工人，尤其是剝削占全厂工人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徒。因为学徒的劳动力最便宜，可以在学徒身上进行更多的剝削。如雇用一個工人，每天工資大約六角錢，而雇用一個学徒，每天的开支大約不到二角。再从学徒的劳动情况来看，一般学徒每天約做四十个紗管螺絲，值二十八元，而成本費只有三元多一点，加上学徒每天的伙食費用等开支，总共成本三元五角。老板对学徒的剝削由此可見！

老板对学徒剝削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时資本家收学徒，学徒必須自备一副大香烛，还要举行一种仪式。学徒要跪下来向老板叩头，然后老板当着学徒的家长、介紹人的面，对学徒进行一番奴化教育。資本家在这副香烛上也动了脑筋。他介紹你买香烛，到与資本家有关系的一家香烛店去买。因为点一副香烛可以收納几十个学徒，而多余下来的大香烛，資本家又可以退回給这家香

烛店撈一笔香烛錢，或者去調換肥皂用。以后老板規定学徒只要到这家指定的香烛店买一张烛票交給老板就可以了。

每个学徒进厂前还要交納制服費、医药費等杂費約十六元。在那民不聊生的旧社会里，要想进大隆厂当一个学徒，只得咬着牙关到处借債来交納这笔杂費。老板拿了这笔杂費后，既可以不怕学徒不听使喚，又可以得到一笔額外收入，作为資金。

“关約书”实是“卖身契”

学徒进厂时必须訂立一张“关約书”。这张关約书上一共訂有十九条規定。如学习時間規定为学三年、帮二年，共五年。如果在規定期內自动离厂，則要賠償从第一天进厂到离厂时的全部伙食費和每月的月規錢。老板規定的这学三年、帮二年的五年時間是实足的時間，凡是逢年过节、病假、事假等都要补足。資本家到后来干脆規定学徒期为一万零八百个小时（三足年）。每天以十小时計算。但实际上每个学徒每天总要做十四到十六个小时。如翻砂間的学徒每天早晨四点钟起来，篩砂泥，整理場地，让老师傅七点钟上班好做生活。晚上总要做到九点半、十点钟才好歇手。

如有工伤或死亡，厂方也不負任何責任。“关約书”上写明：“倘措手不及或工作不慎或者意外不測，各归天

命，与厂无涉。”学徒龔关金因触电死亡，曹福根因淬火炉爆炸死亡，当家属来厂与老板交涉时，老板都以“关約书”为凭，要家属画押具結，領回尸首了事。

“关約书”上还規定：“除本身父母丧亡或本人婚娶事項外不得借故請假出外。”許多学徒說，进了厂門就等于进了牢門。即使有要事要出厂門，还要經過五道关口，盖工头、厂务主任等五个图章才能出門；搞不好，厂門沒有出，而耳光倒吃了不少。即使允許出厂，老板也規定必須于当晚八时前回厂，如因故稍迟回厂，輕則受罰，重則开除。当时老板規定：凡过五分钟回厂的，挨藤条两下；过十分钟的，除去藤条外还要听訓話；过十五分钟以上者，关禁閉，在老板专設的一間禁閉室里罰跪。罰跪也有等級，第一种是跪地板，第二种是跪焦炭，第三种是跪三角铁，并剝夺一个时期的出厂权利。

此外，剃头規定光头或平头，被褥的面子、夹里多少长、多少闊，什么布，也都有規定。这张“关約书”实质上是一张“卖身契”，学徒从头到脚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听凭資本家的打罵、欺压和剝削。

人不如狗

在旧社会当学徒，真是人不如狗。那时工人操作，根本没有什么防护設備，工伤事故經常发生。如工人丘炳泉，有一次在砂輪上磨工作物，一不留神一只手指被軋进

了皮帶輪子里，他心一急，把手一拉，却把手指里的一根筋也拉了出来，痛得他話都讲不出来。但老板对此事沒有过問过一句話，气得他忍痛捧住伤手回家，借債治疗。

那时候学徒每天的工作時間很长，吃得又差，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餓着肚子做准备工作，直做到晚上十点多才好休息。所以学徒都是又黃又瘦，大都害黃肿病和脚肿病。那时的宿舍是在翻砂間楼上，等于住在蒸籠里，热得要命。床鋪象現在倉庫里放半成品用的木架子。十五平方米大小的面积，装上三层鋪位，每层睡九个人，共二十七人。大家都叫它“白鴿籠”。这样的床鋪如果睡上一个长得高一点的学徒，連脚也伸不直。

那时老板养了一只“獅子狗”，用专人服侍它，每天喂它牛肉和大米飯。可是当工人、学徒向老板提出要求改善生活时，老板竟然說：“我找一百条狗不容易，要找一百个学徒容易得很，誰不願在这里工作，就給我滾。”更痛心的是，一九四一年，学徒徐福大积劳成疾，死在厂里。狠心的老板不准家属把死者从厂門口抬出去，而是叫两个工人在后面围着的竹籬笆处拆个洞，从洞里塞出厂外。可是当那只“獅子狗”死时，却为它选择了葬身之地，并叫两个工人特地为这条死狗做了一只“狗棺材”，大开正門从大門口抬了出去“安葬”。

老板剝削的名目是非常多的。“儲蓄”也是資本家进行剝削的一种办法。不管学徒还是老师傅，老板都規定要

参加儲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在工資中扣除百分之一的“儲蓄金”。凡是家里死人或火烧这样的急事，才有权利向老板去要自己每月被扣去的百分之一的儲蓄金。除此之外，是沒有权利取回“儲蓄金”的。此外，資本家家里，有什么大事情，也要逼着学徒、工人掏腰包送礼。

老板利欲熏心，剝削的手段既狠又毒。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間，大隆老板借口市面不好，大量解雇工人，以便招雇新的学徒，加强剝削。老板解雇工人，找不到什么借口，就用“体格检查”的办法，对工人从头检查到脚。老板不是說你肺里有病，就是說你脚上有病，連輕度砂眼和烂脚，都作为解雇的理由。如工人老秦，体格检查后，老板說他有脚肿病（当时学徒营养极差，工作時間长，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有脚肿病），叫他回家去“休养”，他只好离开了工厂。当时先后被解雇的工人（包括滿师的学徒）約有四百人。

革命的火焰

严家老板对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压迫，激起了工人和学徒的反抗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老板对学徒严加控制，学徒被压得实在透不过气来，每月拿来的月規錢連买一块肥皂、理一次发也不够。在这情况下，学徒起来进行罢工斗争，要求每月增加三角月規錢，但是資本家連这一点最低的要求都拒絕了，这就激起了老师傅的

义憤，一九四一年，实行了全厂的罢工。但这次斗争因沒有党的领导和缺乏斗争經驗，終于失敗了。

大隆厂工人在长期与严家資本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經驗，并在一九四四年建立了党的地下組織。有了党的正确领导，虽然严家老板与反动派勾結，使用种种阴谋，派遣了許多特务，企图扑灭大隆厂工人的革命火焰，但工人們在党的领导下，每一斗争都获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工人阶级与敌人的斗争是十分尖銳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隆厂工人看作是眼中釘。他們不断派遣特务来大隆厂进行严密控制和监督。資本家还与反动政府勾結，企图分化工人团結，扼杀工人的斗争。

有着斗争經驗的大隆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严家老板的种种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貪官污吏，以明卖暗送的办法将大隆厂卖给严家老板。严家老板来接收大隆厂时，只接收工厂，不接收工人，而且拒不开工，企图辞掉原有工人。大隆厂工人坚持了两个月的斗争，得到全市职工兄弟的大力支持，終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一九四八年春节后，严家老板又借口停电，拒不开工，与厂内特务一起开了一张黑名单，阴谋开除大隆厂三十六位工人領袖。資本家又与反动政府勾結，阴谋搞“流血事件”。在党的领导下，工人机警地避开了資本

家的挑畔行为，粉碎了資本家的阴謀詭計，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严家老板哪里甘心他的失败呢？他与上海特务头子勾結在一起，在厂内的特务配合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派遣了几个武装特务，趁工人領袖出厂吃饭的时候，企图逮捕他。正当特务在武力綁架时，被一工人发觉，他立即奔赴飯厅，向工人们报告特务抓人的消息。工人们听到这消息后，个个放下飯盒，随手撿了木棍、铁棒，急忙追赶出来，终于把工人領袖救了回来，把特务的左輪手枪也繳了，并抓住了三个特务，进行了公审，揭露了資本家和特务的阴謀，又一次教育了全厂职工。

国民党匪軍在前綫兵敗如山倒，蔣家王朝的末日将要来临，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瘋狂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反动派以“违反戒严法令”的罪名，逮捕了十一位工人同志。同时資本家又阴謀拆迁机器，逃往台湾。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組織了护厂斗争和营救被捕同志的斗争，终于迫使反动派释放了被捕工人，使資本家拆迁机器运往台湾的阴謀也未能全部实现，保存了大部分机器，迎接了解放。

天翻地覆的变化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大隆厂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后，对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厂起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我們厂坚持了艰苦奋斗、勤儉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針，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建設。大隆厂在私营企业时只能模仿制造一些棉紡織机，現在不仅自己能制造精密大型的設備，而且还能自行設計、自行制造。从公私合营以来，全厂生产了五六百种新产品。

职工的政治地位也起了根本的变化。現在这个厂里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这个厂的工人和学徒出身。全厂有六分之一的职工当选为厂里的职工代表，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

社会主义企业对职工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十分重视，厂里建立了安全卫生科，負責管理全厂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

工人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公私合营后，建造了四幢职工单人宿舍。为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厂里除了有保健站以外，还有两家特約医院，为职工治疗疾病。厂里还有保健食堂和托儿所。文化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从一九五二年起，厂里办起了职工业余学校和图书馆，現有专职教师十五名。其他如足、籃球、乒乓球等活动也开展得很活跃。

現在这个厂的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觉悟水平不断提高，他們正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发揮更大的智慧，积极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文明監獄”

石 英

东亚毛紡織厂建厂于一九三一年，它的前身是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黑暗深重的年代里，工人们都称它为“模范監獄”。这里的“模范”是表，而“監獄”是实。所谓“模范”，是以它的总经理——资本家宋紫卿为首，实行着一套欧美式的所谓“文明”管理方式，以图掩盖着他们恶毒残忍的嘴脸。所谓“監獄”，它比一般封建式的露骨盘剥更阴险，更巧妙，它榨干了工人的血汗还叫你看不出伤痕。在当时英租界的这座现代企业的高墙里面，曾发生过多少桩令人发指的血腥事件，至于那种慢性的摧残和“文明”的毒化，就更是罄竹难书了。当今天东亚厂的老工人们历述旧日的苦痛遭遇时，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而对照今日当家作主人的幸福光景，又流露出对党和毛主席多么深厚的情感呵！

“抵羊牌”的来历

一走近东亚公司的铁门，就可以看见大门正中双羊

抵角的图案。那拼命角逐的架势，表露了宋棐卿建立霸业的野心。在院中的水池里，还有一对同样姿态的石羊。春、夏、秋三季，二羊竞相喷水。透过这眩目的水雾，可以发现资本家大发横财的隐秘。

的确，宋棐卿发家的历史跟“抵羊牌”毛线是紧密联系着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全国抗日声浪高涨，掀起抵制洋货的新热潮。宋棐卿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他想，要是办起一个标榜“国货”的企业，那就比安装倒卖汽车更有来头了。

那时候，毛线这行业在中国还是初创，他就把自己的野心押在开办一个毛纺织厂的赌注上。机器和设备就利用他原在济南旧德昌工厂现成的一套，资金呢？他通过他的得力助手赵子贞打入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内线，撮掇韩复榘投资合作。而宋棐卿呢？他是一个大铜子儿不掏，只把原来德昌的机器折价，算做了投资。

为了这件事，他特地召集一班高级谋士，进行了商量。他伸出两根手指，提起在座人们的注意力，一字一板地说：“你们绝不要轻看了这个厂名！至于商标嘛，更是非同小可，第一要响亮，能够一下子把人心抓住。第二要表现出我们的雄心。第三，也是最紧要的，是要投合国人的心理。既然人们现在提倡国货，那么，咱们就起它一个爱国的名称。我的话不必多讲，诸位想必是能完全领会

的……”

他的高級謀士們了解總經理的脾气：即使他已成竹在胸，也不肯輕易把自己的方案合盘托出，总是喜欢考問一下每个人見解的高低，誰不想在總經理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学識，于是七嘴八舌地貢獻了許多厂名，諸如：“中华”、“福华”、“福中”、“复昌”等。宋棻卿听了淡笑着搖了搖頭，輕描淡写地說：“諸位所設計的都有一些意思，又都不尽合乎理想。”他以为“中华”、“福华”、“福中”范围太小，局限于国内，不能施展他的野心。“复昌”虽含有恢复“德昌”的含意，但又感到过于狹窄。最后他便在“亚洲”、“远东”、“亚东”、和“东亚”几个名称中，选择了“东亚”这个厂名。

在选择商标时，他的謀士們为了迎合他的喜好，提議用一个时髦的名字：“抵洋”商标。宋棻卿馬上灵机一动追問：“是哪个抵字？哪个洋字？”謀士們为他写了一下，他听罢哈哈大笑，謀士們莫名其妙，个个面面相覷，宋棻卿这才說明自己的看法：“抵洋二字，确能順应国内潮流，但字面太露，容易引起外国列强的不滿，倘有交涉，对我们的事业非常不利。我倒是想了一个不冒风险的办法，这就是采用一个双羊抵角的图案，借用抵羊的谐音，也許是一个万全的良策。”謀士們一致拍手称妙，借机大大恭維了宋棻卿一番。随后宋棻卿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采用抵制洋貨的“抵”字和“抵羊”的“羊”字，这样語意双关，更能左右逢源了。

他的这番心計显然沒有白費。“抵羊牌”毛綫一登上三十年代的国内市場，立刻就获得了人們的喜爱，因为它毕竟是在中国織造出来的呵。随着这种心理的日益高涨，宋棻卿就越发财运亨通了。这时他通过自办的刊物，特別卖劲地扩大宣传：“‘抵羊牌’毛綫是真正的爱国毛綫，从原料到成品，都是中国出产中国制造。凡是有爱国良心的中国人，都穿这种毛綫織的毛衣”等等。其实这种宣传連宋棻卿本人也会暗自发笑的。因为他用来紡綫的羊毛从来就不是什么国貨，而是进口的“澳毛”。

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更证明他的所謂爱国只不过是随着他个人发财致富的根本利益为轉移的。当在几年以后，当“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天津后，他見毛綫的原料和銷路都成了問題，便和日寇的一八二零部队挂上了鈎，添制了一套紡麻袋的机器，为日軍制造軍用麻袋。日本軍方当然求之不得，便用洋面和粮食作为对宋棻卿的回酬。而宋又把这些粮食和白面与高級職員們私分囤积，高价倒卖。在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中，宋棻卿的发財事业反而“更上一层楼”。这时在他所办的刊物上，就把冠冕堂皇的爱国口号悄悄收拾起来，而代之以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人生不是什么斗争，而不过是一种游戏，就和打籃球一样，誰能得分誰就是英雄。”

抗战胜利后，宋棻卿又搖身一变，飞到重庆和美国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搭上了鈎。回来以后，又忙着筹备欢迎“盟軍”（美国鬼子）进入天津。为了这桩

事，他头一回这样不惜工本，给每个女工发了一件靠色大褂、一双皮鞋，“以示整齐划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他还又一次到美国去“考察”，从美国回来，又充当华尔街老板的义务宣传员，向职工们大肆宣扬美国如何“民主”，如何“繁荣”。他这时私心里已形成以美帝国主义分子为靠山的幻影。

宋棊卿虽然一般是喜怒不形于色，但有时也不免得意忘形地摸着刮得溜光的嘴巴说：“顺应爱国潮流，而又善于维系国际朋友的感情，哈哈……”这就是他的发财要术之一。

迈进铁门的一天

如果说东亚公司院内双羊喷出的水花为资本家大大招徕了主顾，那么，水池里不竭的源流就是宋棊卿所榨取的工人血汗。

在那时候，东亚公司的门槛就是一道鬼门关，谁想进来，比登天还难。想来东亚当工人，必须经过花样翻新的种种考试。这套考试方法，也是从美国抄来的。主要有以下的项目：试握力，叫考工者试握表；试目力，站在一定距离内，看视力表；测手指的灵敏度，在一块板子上凿了许多小孔，叫应考者把不到一寸长的小绣花针插在那些孔里，每个眼里只准插三根，多了塞不下，少了又宽松。还有什么性格测验，工人来在铁门外面排队，那位负责考

工的人事科长故作冷淡，甚至假装沒有看見。要是应考者熬得急了，露出不耐煩的神色，那他估計你进厂后也可能“搗乱”。这当然不符合他們“听话”的要求。尤其对于女工的性格測驗，实际上是对人格的侮辱。黑胖子科长总是用那凌厉的眼光盯視着应试的女工，有时目不轉睛地瞅上小半天。据說是用来試驗她的性格是否“溫柔”。結过婚的女工是不收的，在通常情况下，他們是一开口就說：“我們这里可最喜欢沒結婚的。”但有时也用欺詐的口吻反說：“我們这里最喜欢結过婚的。”如果被考人一口咬定沒結婚，便叫她在地上連走几圈，从走路的姿势上加以判断。不少前来应考的穷苦妇女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侮辱，在初考之后，說什么也不来第二次了。

好歹迈进这道門槛，所要受的折磨开始了。在这所“模范監獄”里，就連吃飯也是不自由的。每到吃飯的时間，工人們进入餐厅，必須直挺挺地站着，由厂里“专用”的鄒牧师带头唱《謝飯歌》，以感謝天主的“恩賜”：

感謝天父，保佑平安，
养我肉体，賜我一餐，
更賜灵粮，心灵强健，
敬虔为人，討主喜欢。

阿門——

可在这时，工人們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事：貨場里的搬运工肩膀都被二百多斤的麻包磨破了，在寻思着第二天怎样应付这沉重的負担；搓棉粘皮的女工双手都磨

烂了，在想家里的孩子正等待喂奶，盼着领下那可怜的工資买点棒子面，誰还有心思唱什么《謝飯歌》？誰又願意感謝那騙人的“天主”？有的工人气急了，就用原来的韵脚改成一首《反謝飯歌》：

什么天父，全是扯蛋！
我們吃的，自己血汗。
我做牛馬，你来白拣，
我不干活，你就完蛋！

媽的！

也有人最后唱成了“蛤蟆”。这是因为領唱人鄒牧师的嘴特別大，背地里人們都管他叫“蛤蟆”。有一次唱歌时，一个小伙子高声唱了“蛤蟆”，被鄒牧师听見了，他登时大声吼起来：“是誰唱的？”前头有个男工故意問他：“唱的什么？”牧师涨紅了脸：“唱的什么你們知道！”他自己总也不好說出唱的什么，只好不了了之。

大伙吃飯的当儿，专门有一个女监工在一旁盯着，嘴里喊着：“吃饱点儿，吃饱了好多干活！”話虽这么說，眼里瞅見哪个人吃多了，馬上伸出两根胖手指头，冲着鄒牧师打个手式，鄒牧师立即会意地走过来，冷不防把窩头給夺了下来。

晚上下班后的难关就更难过了，回家的要接受搜腰检查，检查口只能过一个人，有时晚八点下工，直搜到十点钟人才能全部出厂。在厂住宿的工人也不好过，鄒牧师每晚都要到工人宿舍查鋪。熄灯后規定誰也不許說

話，必須“立刻进入睡眠状态”，因为只有这样第二天才有精神干活。鄒牧师一走进女工宿舍，用手电到处乱照，看看女工們的眼睛是不是已經閉攏。女工們等牧师走近，就假装閉上眼睛，然后睜开眼睛仔細观察着这坏蛋有些什么勾当，鄒牧师——这位“天主的儿子”，一見女工們都“睡”着了，馬上露出一副流氓相，猥褻地摸着女工的脸。有一次他刚想伸手，被一位女工抬手砍着他那枯瘦的手臂，他連哼也沒敢哼一声，象老鼠一样地溜出門去，然后用大鎖“咔嚓”一声反鎖上大門。

天還沒亮，工人們急急忙忙起来上工，鄒牧师又溜进宿舍里来，逐個鋪位仔細检查，看看有沒有违禁书刊和別的什么可疑物件。有一次只是因为一位男工鋪底下翻出一张女工照片，便不容分說，通过人事科宣布把这个男工开除。

这就是在“模范監獄”的二十四小时內人人都难以逃避的“課程”。

圈套种种

东亚的資本家除对工人血汗进行瘋狂榨取外，也注重“精神灌輸”。按照宋斐卿的理想，要工人們被榨干了一切之后，还能感謝他的“洪恩大德”；被打罵之后，还能呼喊“痛快”！根据这种“理想”，他挖空心思，制定了一套綱領性的“东亚精神”，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

他規定“东亚精神”是每个工人的必修課程，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尽管这里面的花样繁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欺騙工人們說：“咱們都是一家人”。他提倡“劳資互惠”，那就是要工人卖力气替資本家干活，服服貼貼地接受他的剝削和摆布；他強調“求职困难”，說什么社会上失业的工人很多，謀求职业很困难，所以要大家“莫偷懶”、“不要蹭”、“使主管人滿意”，不然“迟早总会把位置丢掉”。在另外一課“东亚礼仪”上明文規定：工人在馬路上遇到經理、副理或職員，要鞠四十五度大躬，不可太快，也不要太慢；如果騎着自行車，必須先下車后再鞠躬。

《东亚銘》，每个职工一份，务必悬挂在家中显眼的所在。上写厂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公司的主义：“我們要实行劳資互惠”，最后还有耶穌圣訓：“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东亚声》刊物每双周出一期，常常登載宋棊卿的讲话：“在当今社会里，无所谓資本家与工人之区别，所谓資本家，也就是靠自己經營为生者。譬如一个三輪車夫，他靠拉三輪为生，那他也可以說是一个資本家。”用这些鬼話来麻痹工人的階級意識。

后来，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們的反抗斗争愈趋发展。宋棊卿心知光靠口头上的安插，已沒有多大效力。于是他便別出心裁，使出了一个更能迷人的花招，这就是“贈股”。

所謂“贈股”，美其名是要每個工人都關心企業。一九四三年，宋棊卿召開了一次“贈股”大會：日工一股，月工兩股，年工三股，職員四股，主任五股。在這次“贈股”大會上，他裝出一副恩賜者的笑臉，向工人們放毒說：“從現在起，工人們也就是股東，公司是大家的公司，今後多賺錢，大家也多沾光。咱們都是一家人，你們好好干吧。”“你們也是有產階級，咱們要愛惜自己的財產。”他挖空心思地想給工人們造成一種幻想。可是曾幾何時，這些象肥皂泡似的美麗的設想，還是由宋棊卿自己把它吹滅了。

原來他的所謂“贈股”，都附帶着極其苛刻的條件：必須三年之內不犯“廠規”，到期後才能以臨時收據的小紙條，換取正式股票，如果在這三年之內被記過，股票就晚給一年，中途開除，就一筆勾銷了。實際上，他的廠規又多又苛，縱然不犯廠規，管理也會找碴兒記過或是開除的。到頭來，除了他那些心腹的“棒錘匠”能得到實有的股票之外，一般工人常常在中途被開除，所以這些股票也都成了騙人的空頭支票，只不過是資本家撒下的釣魚的餌而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只是說給工人們聽的。至於資本家們，他們是另外解釋的。宋棊卿有時也格外開恩，給工人發一點微不足道的毛錢，但他隨後可以理直氣壯地延長工時一點鐘，有時也發給工人一點面粉，而他們的面粉則用火車往家裏拉。對於資本家自己來說，他們內心深處的廠訓是：“己所欲，勿施于人”。或者是：“己所

不欲，施于人”。

獾 狼 为 奸

树有根，水有源。追根溯源，宋家的发家史，跟英美、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有着血緣的关系。宋棻卿的亲信們常替他宣传說：宋總經理是一担两筐，白手起家的。这完全都是騙人的鬼話。其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宗教势力，构成为宋家賴以发家的精神支柱。所謂“东亚精神”，也不是宋棻卿的独创，不过是基督教义和美国福特公司厂規的混合物而已。

宋棻卿的祖父宋光旭，本来在他的老家山东益都給教会看門，由于他丢弃民族良心，甘当美帝国主义教士的忠順奴仆，特別在清末义和团掀起的反帝怒潮中，象宋光旭这样的人就更容易受到外国牧师的格外恩寵。宋棻卿的父亲宋传典，当时常随他父亲到教会去。那里的庫牧师見他十分机灵，认为可以培养成为效忠于他們的干才，就把他留在教会学校里讀書。宋传典果然不負主子的青睞，年事稍长，就显得比他父亲的本領更高一等了。因此庫牧师回国时，就把他靠吸吮中国农民血汗經營起来的“德昌号”（先是經營花边，后才改为发网）移交給他了。宋传典就是以这发网庄作基石，把剝削的触角伸到冀魯两省許多城鎮、乡村，搜刮农民血汗。而在德昌内部，他和妻子聶德馨（宋棻卿的母亲）一方面用教会麻醉心灵的办

法，一面又以中国封建势力残酷压榨的惯技，靠这两手来盘剥童工。当时在德昌做工的童工，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

要想吃上德昌飯，就得拿着性命換；
早晨上班天不明，半夜三更才下班；
身上疥疮痒又痒，何时才能把家还？

只要他們一瞅見哪个工人不順眼，聶德馨就把他从这“幸福的伊甸国”里赶了出去。有一次她抓住一个童工的头发，从陡直的楼梯上推了下来，然后凶狠地用手一指：“不許你再登这个台阶！”德昌号的紅漆楼梯，可說是用童工的血染成的呵！

就这样，宋传典踏着以童工和农民血汗鋪成的路，由一个基督教热心的传道者又跨入了“政界”。他花了十万元的巨款买了一个山东省議会議长的位置。

及至宋斐卿，那更是一个在美国鍍过金的奴才。他在美国芝加哥商业大学毕业回国后，与他同船而来的就是美国資本家沙尔夫。他回来开办东亚毛紡織公司，专用鄒牧师监督工人的起居飲食。在厂里組織了基督教青年会，并授意他的內弟何清儒負責介紹美帝国主义教会的精神麻醉剂。何清儒在一九四二年亲手翻譯了一本美国宣传基督教义和統治工人的书，叫做《人生的游戏》，由东亚自印自发行，广为流传。目的在于轉移工人的視綫，緩和日益加剧的階級矛盾。

何清儒(自称何博士)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他們的“事业”进行宣传。有一次，宋棻卿召集工人在大院訓話，何首先致詞：“工友們，你們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呀，毒热的太阳被云彩遮住，凉爽得很，这是上帝賜給咱們的一把大伞……而咱們公司的兴旺，都是靠咱宋總經理操持有方……”在这里，他又把上帝的形象和宋棻卿联系在一起，仿佛他来統治工人，也是上帝的旨意了。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宋棻卿更高地撑起了教会的这把“大伞”。当时的紅衣主教田枢机、于斌等也来过工厂視察。除去极少数教会御用的信徒外，广大工人們都对他們冷眉相对，結果这些坏蛋只好草草收場，夹着尾巴跑了。

宋棻卿与教会势力互为利用，狼狽为奸：基督教青年会和三友团（宋棻卿的黑帮，专搞些告密之类的卑劣勾当）无独有偶，是那时东亚公司在組織上的一对毒瘤。

洪水猛兽

宋棻卿的拿手好戏，就是对工人的“精神訓話”。这也是工人跟他見面最多的場合。訓話时，他的四肢橫平豎直，不輕易露齿一笑，以免在工人面前失了他的尊严。不过如果认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那也不太完全。他偶尔也有对工人展現笑脸的时候，那就是在一九三九

年洪水将要吞卷东亚公司的时候。

一九三九年八月，天津地区连降暴雨，海河上游洪水暴涨，汹涌下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宋棻卿知道这时最用得着工人们。他那平时绷着的长脸也添了几分笑意，十万火急地召集了职工讲话：“大水眼儿就要压到天津市，哦——”他顿了顿，又改口说，“压到我们公司里来了！我们公司就好比是一条船，咱们大家都是这条船上的船员，能不能在惊涛骇浪里存在和前进，就要看我们大家了。所以我提议，在大水到来的时候，大家不要回家，务必各尽职守，合力护厂……如果公司这个大家庭保不住，你的小家庭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这时，工人们谁也没有准备，谁能不顾家？谁的家里没有三老四少？而且住的是那小破屋子，还经得住大水一冲？当宋棻卿讲完这番话，大伙禁不住在底下议论起来。

宋棻卿似乎看透了大家的心理，又干咳一声说：“本人代表公司董事会郑重宣布：事情过去之后，假如公司方面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一定给工友们增加酬劳。譬如发给洋面……”

任他说尽花言巧语，工人们的情绪还是不稳。宋棻卿一看情形不妙，便咬了咬牙，大声说：“各位护厂时，如果家里的财物有什么好歹，公司方面尽力负责。”

工人们却在想：你负责什么？我们连个信儿也没传到家里，假如出了人命，你又怎样负责？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前門那边忽然有人高喊：“大水来了，快堵門呀！”

工人們登上高处一看，公司西面一片白茫茫的大水，眼見冲了过来，要回家是来不及了，只好一齐动手，堵門的堵門，堵牆洞的堵牆洞。女工赶縫麻袋，男工扛麻包垒牆，提防大水继续上涨，就这样夜以继日，一连守护了三天，晚上实在打熬不住，刚想合眼打个盹儿，就被工头們吆喝起来：“你們不要命啦，大水来了咱們一个也跑不了！”

好歹等大水消了一些，工人們各自回家一看，禁不住一陣心酸：有的找不着父母，有的寻不到妻儿，有的四处打听，好歹寻着亲人，但那賴以存身的破房子，破盆烂罐，鍋碗瓢勺，却統統給大水冲走了。

公司的一切是靠工人的力量保住了，沒有受半点損失，而資本家和亲信們的眷属，有的早已搬进厂里，有的虽在厂外，但高楼大厦，牆坚門固，大水过后，他們还是尽情玩乐，从楼窗口送出来的仍是筵席的香味，仍是碰杯交盞和留声机的靡靡之音。而眼下正是抛售毛綫的大好季节，仓库里还积存着大量发潮的“抵羊牌”毛綫，宋棊卿决定打出“为賑济灾胞大甩卖”的牌子，果然大批毛綫順利脫手。連宋棊卿也沒想到，这浩茫大水倒帮了他的大忙。

而工人呢？这时却面对一幅惨景，无处存身。眼見深秋过后，漫长的冬天就要来临，这又怎么捱过？所領到

的只是一点点面粉的“酬劳”，质问公司方面，总经理宋斐卿不再露面，他的助手用那美国讼师腔调回答说：“不错，当初总经理是说你们家里有个好歹，公司尽力负责。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眼前有多少难民流落街头，谁能忍心不问不管。总经理有意从给大家的酬劳里分一部分给难民们，想必诸位不会不允的，同舟共济嘛！再说，原来讲的是尽力而为，公司不是已经给诸位洋面了吗？”

所谓的救济灾民，也实在叫人啼笑皆非，原来大水过后，在东亚公司周围集中了一些衣不蔽体、面呈菜色的饥民。宋斐卿“善心”大发，叫伙房里熬了几锅稀粥，和他老婆亲自“舍粥”。接着报纸上竭力鼓吹他是如何如何的“慈善”，于是，他又博得了一个“慈善家”的新头衔。

宋斐卿自然是暗暗得意的。他的算盘打得是从无半点差错；若是履行原来对工人许下的诺言，那腰包掏得太大了，而现在舍粥救济灾民，只消拿出几斗发霉的小米就足够了；假如救济工人，尽管拿出去的再多，在社会上也不会有多大反响，而救济街头灾民，就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就是他的信条之一：有钱要往铜锣上摔，响声大，名气好！

不论资本家怎样巧言诡辩，通过大水事件，工人们更看穿了他们的狼子心肠。洪水固然可恶，而他们的手段比洪水猛兽还要狠毒十分。

如此“文明”

东亚公司的资本家无论作什么事情，玩弄什么新花样，自然都要打上一个“文明”的戳记，尽可能避免露出狐狸尾巴。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他们常常为了牟取暴利而吞食工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动听的言词也难以掩盖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画。可是只要可能的话，他们还要给工人的惨死涂上一层“文明”的色彩，仿佛在他们东亚公司工人被压榨而死也是“文明”的。

一系列工人惨死的事件，至今仍刻印在老工人的记忆里。

在东亚公司的厂规里，结婚的女工固然不要，至于怀孕生孩子就更意味着大难临头，所以许多女工不得不在怀孕期间，用布带裹紧身子，直到临产时才请几天病假，三四天后又重新上班了。那时有一个叫徐温的女工，因为生孩子被资本家知道了，马上宣布开除。尽管这个女工曾在工厂里救过火，但这时资本家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过了一个时期，也就是宋棐卿和日本一八二零部队打得火热的当儿，由于黄麻原料缺乏，宋棐卿便异想天开，用棉秸皮作代用品编织麻袋。搓棉秸皮需要大量临时工，厂门口整天打出招工广告。徐温为生活所迫，只好前来应招。搓棉秸皮这桩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在厂院里挖下大池子，棉秸浸泡在硫酸液里，工人们就从池子里随捞

随搓，搓一天两手红肿，搓上一个星期就无法再干下去，因为两手皮肉都磨得脱落了。但徐温家里老少几口，还要靠她拿回微薄的工资糊口，只好捱着干下去。就这样，由于过分累饿，当她正搓棉秸时，一口鲜血吐在地上，回到家里便含恨死去。

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设备，造成了另一桩工人的惨死事件。那还是在东亚草创时期，工厂还在河东意租界旧址。当时厂里工人不多，有一个赵师傅是厂里唯一的电工。有一次厂里的高压电线发生故障，电工既没有安全手套，又没有绝缘手钳，资本家却又不肯耽误一分钟的生产，强令赵师傅带电接线。结果这位老工人连电带摔，死在资本家的面前。资本家一面捏着鼻子后退，一面还无耻地说：“他的技术太差，公司方面绝不能负责！”工友们托起赵师傅的尸体，怒视着资本家的背影，愤懑地说：“这笔血账是忘不了的！”

在这方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刘德忠墜楼事件。

女工刘德忠的丈夫曾在一家小饭馆做杂工，因为害了肺病，没钱医治，终于死去。刘德忠万般无奈，便到公司总务科借钱。资本家平时大唱高调：“对工人福利事项无微不至”，她料想借钱买口棺材总是可以的。况且自己也在公司里也有几股，最不济也能把股票钱拿出来吧。但当她来到总务科，管事的却待理不理。她说：“只要我以后有了法子，一定把钱还上。”管事的冷冷地答道：“公司

的光景也不好，沒有錢借給你。”刘德忠轉口又說：“既是不能借，那就把我那几个股付給我吧。”管事的这才抬起头来，从鼻子里嗤的发出一声冷笑：“什么？股票？亏你說得出口！股票是公司送給你的，只能存，不能兌現款，再說你是本公司工人，你的丈夫又算是老儿？”这番冷諷热嘲，还惹得公事房里那班“体面人物”一陣哄笑。

刘德忠知道事情是絕望了，她激憤地走出总务科，在車間里踱着步子，不一会，她的身影又消失了。

过了一刻钟光景，跟她平时很要好的一位女工听到厂房外面有人喊：“东亚跳下人来了！”这位女工和几个工人急忙跑出厂門，繞到營口道那边，一見刘德忠摔在墙外馬路便道上，口鼻里沁着血水，伙伴們把她抱起来，貼近她的臉問道：“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沒有別的路走了。資本家不让人活……”說着她的喉嚨被血堵住了，由于过分痛楚和激憤，失神的眼睛呈現着黯紅色。这时候，她的女伴大声喊来人，人事科那边連个人影也不見。还是男工們搭来一副担架，想把刘德忠抬到外面大医院去急救，这时人事科才有人出来拦阻：“送厂医院得了！”等抬到厂医院，医生給診斷了一下，皺起眉头說：“咱們这儿治不了。要治得送天和医院。”工友們問医生：“到天和要什么手續？”医生答道：“要到人事科开条子。”及至去人事科开了条子回来，時間又过了二十多分钟，这时才由工友們抬着伤者急奔天和医院。她的女伴一直守候在身旁。伤者神志昏迷，口里断断续續地囁語：“我的孩子……我的孩

子……”女伴安慰她：“医院就快到了，到了医院就有办法，你会好的。”男工們撒开大步，哪管热汗淋漓，力爭分秒来到医院。刚要挂号，医院管事的拉开二寸見方的小孔，見是工人，淡淡地問道：“挂号？带押金来了嗎？”

天呀，工人們从沒到过这样闊气的医院，哪里带得什么押金？而公司人事科明知有这项手續，又沒主动付給，当工友們回厂取来押金，挂上号，时间又过了半个多钟头，就这样耽誤来耽誤去，等把一切手續办完，戴着大口罩只露两只眼睛的大夫才姍姍地走来診断，只看了看，就把手輕輕一揮，說了声：“抬走吧。”跟来的女工把手貼近刘德忠的鼻息，她已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当工人們回来質問总务科时，总务科装痴卖傻地回答說：“职工死在本厂院里还可考虑承担責任，刘德忠是跳到厂外去的，这怎么找公司呢？”

工人們实在怒不可遏，一場新的风暴就要掀起。正在这时，报纸上忽然登出一項“惊人”新聞：“誰謂人心不古，今看烈妇殉夫！”几乎是同一时刻，公司方面也鼓吹起来：“本公司工友刘德忠女士因其夫中道夭亡，痛不欲生，卒于前日墜楼殉夫。本公司出此烈妇，实乃全体职工之荣幸！”昨天还是概不負責的小事，今天为什么又成了引为荣幸的要聞呢？

人們正在疑惑不解，由公司總經理宋榮卿为首，大力张罗，說是要給“节妇”出一个隆重的大殯，同她的丈夫一起举行葬礼，并号召工人們也都为她斂錢，多少也尽一

份心意。灵堂里，居然还挂上了伪市长张廷鍔送来的匾額：“节烈可风”。就近的杠房資本家 and 一班地痞流氓們也神气起来，到死者家里忙忙活活。連国民党反动派的“軍政委員”，所謂的“社会聞人”也来送葬。就这样出了一个天津市“闊人”們少見的大殯。这一鬧，反而把工人和社会上酝酿中的风暴暂时緩冲了下去。

虽說如此，宋棊卿还是心有余悸，因为这场鬧剧完全是他导演出来的，只有他最清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不是他暗地疏通，給伪市长送金条，給地痞流氓們嚐嚐甜头，张廷鍔又怎肯为他鳴鑼开道？一班地痞流氓們又怎肯为他吹吹打打？

这就是宋棊卿的“文明”！他的文明的幕布，不过是妄图籠住工人血光燃起的烈火，而这，是掩盖不了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东亚公司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宋棊卿口头上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实际上一直到他死掉，都是阳奉阴违，抗拒改造的。而作为工人階級当家作主的人民企业——东亚毛紡織厂，却以它全新的战斗姿态，屹立在海河之濱。工人階級的大手創造了它，它今天又在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創造着財富。今天，不少建厂时的老工人还在崗位上，而更多的曾被資本家迫入絕境的工人的子女，以及被开除、生活无着終于慘死的老工人們的后代，不会忘記他們先輩的遭遇，他們勇于挑起党和祖国交付的重担，把无产階級的革命事业永远推向前进！

刻 骨 恨

韓 映 山

地毯工业，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那些图案美观、手艺精巧的地毯，在旧社会，是用工人的血泪織成；闊人們的鞋底在上面踐踏，他們踐踏的是工人們的生命！

每一位老工人都有一部悲慘的家史，周占奎只是普通工人中的一个。这位老人五十多岁了，如今是一位檢驗工，人們都尊称他为周师傅。他那多皺的臉上，烙印着半生的劳苦，眼睛里閃爍着机智倔强的光，他的性格爽朗、乐观，举动利索。但是，当他回忆起过去，眼角里也忍不住流下泪滴。

那是一九二三年的深秋，周占奎十二岁。他背着一一个小破行李卷徒步走在庄稼道上。他是要到天津学徒的。他的寡母正在病中，想叫儿子找一条活路，听说天津地毯洋行的学徒工很吃香，住洋楼，挣洋钱。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子弟被人贩子騙走，在天津卫的碼頭、街巷，經常有一批批的貧苦孩子，被資本家买去。

周占奎，这个孤苦的农村少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城

市。正是軍閥混战的年月，各帝国主义象餓狼一样吞吃着中国。天津市的街面上，走着各种肤色的洋鬼子，占奎象走到一个妖魔的世界里。洋楼确是不少，他不知道哪一座是学徒工的住所，洋錢也很多，但那些洋錢只是在鋪面的柜台上叮当乱响。

經人領着，进了一个大圓門，这便是“銘兴永”地毯厂。柜台里站着資本家孙銘山，占奎一看，吓了一跳，这人长得滿脸橫肉，上眼皮下垂，眼睛里射出凶狠的光，用眼角扫了扫占奎，鼻子里哼了哼，尖声辣气地說：

“在这上边按个手印！”

那是一张卖身契。來人拉着占奎在这张白紙黑字的下角按了一下，然后宣讀：

“学徒三年零一节^①，投河覓井打死无論……”

听着鬼叫一样的声音，占奎象是走进冰窖里，渾身冷得打战。

从此，占奎就生活在地獄般的日子裡。

徒 工 泪

資本家对待这些徒工，就象对待奴隶一样，随便打罵，任意欺侮。占奎一进厂，并不让他学什么手艺，叫他端茶倒水，扫炕鋪被。茶倒凉了，資本家把眼一瞪，直泼到

① 一节是四个月。

你的头上；热了，就硬灌着你喝下去，随后是一顿耳光子，打完了还不许哭叫。每天从早晨五点，直干到夜里十二点才让休息。他们睡在那潮湿阴凉的地上，枕着一块半头砖。屋子里有一股股难闻的气味，虱子跳蚤成串，和资本家换着班地吸食着他们的血汗。每顿饭吃的是喂鸭子的食料，又臭又酸，咸菜也是臭的，吃在嘴里就想呕吐，个个徒工瘦得象囚犯，脸黄得象蜡纸一样，好多人都长了疮。一个徒工在机子的横板上正做活，孙铭山走过来，不知为什么，从高高的横板上把他扯下来，又是踢又是打。孙铭山手里，老是提一根绞棒或是一个有棱角的铁尺，专门敲打徒工的脑袋，“啪啪啪”连成点。占奎活这么大，只是看见过农村地主这样打过人。

夜里，劳累一天的身子疲乏得要死，可是谁也睡不着，都在偷偷地哭泣。这些穷苦的孩子，远离了自己的亲人，有苦无处诉，有冤不能申，他们跳不出这火坑，不能摆脱这命运，这是为什么啊！占奎想着，找不出答案。他想起家中生病的母亲，不由暗暗地哭了。

以后就让占奎学打线，那些杂乱的细毛线，要一根根地顺理好。学完打线又学上经线、上板砍毯子，每人要有五件工具：绞花剪子、平活剪子、耙子、刀子和镊子。学习这些活计，师傅并不耐心教，只是告诉你一下。主要是自己看，偷着学，不会就是一顿耳光子，工头打了，掌柜的打。一次占奎摆样子歪了一点，孙铭山用铁尺敲打着他的脑瓜骂道：“笨蛋！打死你！”把占奎打昏了，等醒过来

还得叫师傅考问：“地毯样式有几种？快说！”占奎颤抖着嘴唇还得回答：“有京式，有敦煌，有美术，有采花，有素古……”如果有半个字不对，就又是一顿打。占奎的记忆力很好，学活也灵。尽管如此，也不少挨打，那时教徒弟叫“打徒弟”。

日子就象在刀山上度过。占奎的手腕上长了几个枣似的黄水疮，砍毯子疼得拿不住刀柄，实在干不了。孙铭山走过来，说：

“怎么，想偷懒？噢，长了个小疙瘩，我给你治治。”他阴阳怪气地，从地上捡起一撮毯子絨絨毛，到炉子上烧成灰，带着火就糊到疮口上，占奎疼得滚在地上，尖声呼叫：

“亲娘呀，疼死我了！”

而孙铭山却得意地笑了，骂道：“哼！想偷懒，不干活，白吃我的饭呀，快给我好生干去！”

背地里师兄弟劝占奎说：“别哭了，你经着的还少呢！”接着一个瘦得只剩下两只大眼的徒工指着手上的疤痕说：

“有一次，我织毯子叫刀砍破了手指，血流不止，资本家硬拉着我到火炉上烫，一烫，伤口起一层焦皮，一疼就疼个半死！”

另一个长着长头发的徒工伸着伤手说：“我那次叫铰活剪子剪下一节手指头，资本家用火筷子烧……”

他们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低声骂着：“他妈的，资本家比狼还狠毒！”

可是徒工們不知道，比他們更慘的事，別的工厂更多；有一家地毯厂，一个徒工病了，資本家也不让休息，强迫那个徒工硬掙扎着干，結果累死了，資本家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发现，在乱毛堆里有一具死尸……

而孙銘山是有两面手法的，他有时說話也很和气，也浮現一絲笑容，他对徒工們說：

“好好熬着吧！这会儿受点苦，将来才有真本事。多給我干活，我多加工錢。”說完，就尖声地笑起来。

占奎一听见这种笑声，就厌恶得吐口水，他想：只有夜深坟地的桑树上那只“咕咕啍”才有这样的笑声！他恨透了这个大坏蛋！

可是，也真有人上他的当，听了他的話，便拚命地干活。占奎背地里跟师兄弟們小声說：

“我們不要听他啍啍，他光騙人，你就是累死，还不是落个棺材本？”

經他一說，大家都想起那个叫陆紅志的工人受騙的故事：他拚死拚活地干，結果到头来，只够給他姐买一个薄板棺材，从此就留下了这个話柄。

占奎說的話，不知怎么传到孙銘山的耳朵里。一天夜里，孙銘山把占奎叫到屋里，起先用好言哄劝：

“占奎，你我是同乡，小兔还不吃窩边草呢，这里不見家里見，你怎么拆我的台？”

占奎不吭声。

孙銘山又来硬的：“你說实話，你放什么屁来？不

說，今天我就打死你！”

占奎也硬硬地頂上去：“我什麼也沒說！”

“好小子！你敢跟我頂嘴，我打死你這六國反叛！”孫銘山把占奎一卡脖子按在地上，用鐵尺的棱角敲打占奎的腦袋，一尺下去就是一個大包，大包上冒出紅紅的血漿。

這次被打，激怒了好多師兄弟，他們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出這口氣。

“告他去！”一個師弟說，“真他媽狠！”

“不行就跑，不干了！”另一個咬着牙說。

兩種辦法都不行。他們知道，衙門口是沖有錢人開的，上次一個叫董福林的徒工被打急了，跑到東大局子^①去告，結果當場捉住送回來，說：“窮小子命不好，就該受罪。”還誣蔑說：“打七輩爹，罵八輩娘，今日才入地毯行——你們前世造了孽了！”資本家還在廠子周圍設有電網，就是能夠跑出去，資本家會追查到家，不光白給他干了活，還要賠償以往的飯錢。他們每個人都立下了賣身契，那幾個可怕的字，象刀尖似的陰森森地射向他們的眼前：“投河覓井打死無論……”

.....

然而，風暴要錘煉發芽的種子，壓迫會激發反抗的心靈！辱罵和毒打、威脅和利誘是馴服不了占奎倔強的性

^① 局子是指當時反動政府的警察局。

格的！

占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世事的磨炼，他不爱哭了，他把眼泪化成了仇恨；他也不胆小了，他觉得人间的痛苦，也不过是如此吧！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他常常记起离别老家时，送他走的那位贫苦的张大爷的话：“人穷要有志气！”那位老贫农，受了一辈子苦，也与地主搏斗了一辈子，他还告诉他：“天终究会变的！”

这期间，妈妈曾来看过他一次。妈妈一见儿子露着屁股的裤子和那头上的伤痕就哭了。占奎劝慰母亲：

“娘！别哭，哭是没用的，我快要学满了。”

一九二六年的灯节，正当阔人们花天酒地、晕头晕脑地赏灯的时候，占奎苦难的学徒期结束了——啊！三年零一节！整整是一千二百多个日日夜夜，对那些滑头油嘴的资本家，这象是眨了一下眼睛；但是，对于那些因在监狱里的奴隶们，就象过了一千二百多年！漫长而黑暗的岁月啊！

最后剩下一遭活了，占奎把织毯子用的家具一摔，向孙铭山去辞活。

“怎么？你真不在我这干了？”孙铭山嘻嘻笑着说，“哎，给我干完那遭活呀！”

“日期到了，半遭活也不干！”

听着占奎口气那么硬，孙铭山冷笑地说：

“嘿嘿，你不干，我有的是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可两条腿的人到处有。你就是一刀砍出个金豆子，我也

不留你！”

“好！咱走着瞧。”占奎頂上去，“有你好看的时候！”

刻 骨 恨

十五岁的周占奎，想凭着自己用血泪和汗水换取来的手艺挣碗飯吃，然而，这碗飯是多么难吃啊！手艺人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

几年来，他先后进了五六个地毯厂，給八九个资本家做工。天下的老鴿一般黑，资本家的心腸一样狠！

第一次他到“四号海京”地毯厂。这是美国人做东开的，因为占奎砍毯子飞进眼里一根絨毛，眼睛紅肿了，工头就說：“滾出去，你的眼早晚得瞎。”占奎被解雇了。他們解雇工人就象捻一个螞蟻一样。

以后，又經一位师兄介紹到“三合永”地毯厂。这是哥儿四个资本家伙开的。都有外号，“三疤拉”、“四麻子”、“五擻子”、“六疙瘩”，哥儿四个站在一起，是一幅群丑图，各有一张丑恶嘴臉。他們势力很大，在“永”字号里有名的厉害。

当时地毯行业分东西門儿，东門怕西門，西門都挂“永”字，一提“永”字号都不敢惹。特别是“三疤拉”，花一千多块現大洋买了个省議員，平常騎馬挎盒子，走在街上，老百姓都得閃开一条道。他吃喝嫖賭，无恶不作。邻家一个閨女，他硬霸占了去，哥几个还爭风吃醋。

且說周占奎還沒進“三合永”的門，只听柜台里传出一声声叫罵：“打死他！”随后是一陣噼啪的板子声响。

占奎一見，哥儿四个正打一个工人，两个人劈着胳膊，打得那个工人口吐鮮血。

占奎气得恨不能上去把那资本家撕碎，跟师兄說：“这家更不是东西，我不給他們干活！”

以后又到“乾昌”地毯厂，門崗是个西洋人，出来进去要搜腰，占奎呆了三天，挨了頓耳光子被开除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天津，实行“强化治安”，街面上火乱，枪声車声响成一片，人哭鬼叫，許多工厂被封閉，大批工人都失业了。地毯工人大都去拉洋車。占奎的母亲已經去世，他娶了妻，有了家小，生活更加艰难了，常常一家子餓得起不来炕。乡間也不能住，只好在天津学拉車。从中午十二点，花两角零五个大子，賃一辆洋車，肚內无食，两腿发酸，累得上吐下泻，拉着那胖胖的资本家上不去坡，头一天就赔了两角錢。全家五口，大人孩子，一天一夜只吃四两搀着麻绳的豆餅，住在半間破草棚里，雪片从屋頂上飄进来——这就是手艺人的命运！

他們的血汗被什么人榨干的？哪里是他們的生路？占奎挺直腰板，努力不倒下去，咬着牙，怀着恨，整整拉了八年車。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来到天津，地毯厂重又开办，周占奎只得又到“北平工厂”做

工。真是換湯不換藥，狼仍然是狼。

這個資本家叫劉夢洲，長巴臉，瘦黃，腦門兒上有撮白毛，外號叫“老白毛”，又名“蔣壞損”，做事陰險毒辣，這家伙上海也有買賣。他是靠著一個磕頭弟兄起家，成立工廠後，便一脚把人家踢開了。他的資本又是他的二哥、外號叫“二閻王”供給的。他們家是地主，“二閻王”在農村有兩頃多地，殘酷地剝削着貧苦農民，他們還和天津市長是兒女親家。這樣，這個資本家的氣候，就與眾不同了。他的魔爪伸展到了四面八方。

“老白毛”外表裝得很慈善，跟美國人學了好多手段。他未曾說話，先露笑容，點頭哈腰，對待工人不打不罵，可辦起事來特別壞損。

別的工廠都管工人的飯，唯獨“白毛”不管，工資也不多。當時物價猛漲，工人們掙一天工資，連盒煙也買不起，大家都在死亡綫上掙扎。

一次，周占奎的小女孩得了急病，抱到醫院，醫生說是盲腸炎，需要住院。可是家中半個錢也沒有，沒有錢，醫院不收，孩子的命危在旦夕。周占奎只好到櫃上借。

“白毛”正在眯眼坐着養神，看見周占奎急得汗流滿面，就慢慢地笑着問：

“怎麼？急成這樣！”

“我想支點錢，給孩子治病。”占奎說。

“哈哈……。”“白毛”奸笑着，仍不緊不忙地說，“支

錢？你又不是不知道柜上的規矩，下晚不能开支！”說完，斜着卫生球似的眼睛，看看傍晚的昏暗的夕阳。

占奎急得臉上青筋暴露，說：“孩子是急病，只支五塊錢，要不孩子就沒命了！”

“白毛”又用手摸摸那撮白毛，哼哼笑着說：“明天再借吧！”

“柜上存着我的錢，我只是提前支一下。”占奎急了。

“我只是不提前开支！”“白毛”仍不急。周占奎肺都要气炸了，賭气走出来。他的大女儿这时也当工人，到她厂里借，也沒借出来。他的妻子正伺候一个資本家的小老婆，那个小老婆也扭扭捏捏不借給，說：“有点病也值得上医院，叫嘛烧的？”借不到錢，就不能治病，天下資本家的心腸比毒蛇还毒！眼看着孩子就这样死去了！

孩子是用一領破炕席裹埋的！占奎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他們想起，在拉車的年月里餓死的那个孩子，也是用破炕席掩埋的！从此，全家决定不再鋪炕席，让这刻骨的仇恨深深記在心里！

难道地球永远这样轉动？黑夜就永远不明了嗎？不，不能！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人要活，要扭轉乾坤！要打碎脖子上的鎖鏈，要推倒头上的大山。

斗“白毛”

当时各地工厂大規模罢工运动早已展开了。由于地

毯行业，多是小作坊，工人比較分散，斗爭范围較小；但是在一些大厂子里，斗爭是很激烈的。

周占奎早想联络几个工人和资本家斗一斗。这时正值“白毛”要开除一个工人，全厂工人都不答应，有个姓张的工人說：

“不能叫他开除！我們要和他斗！”

占奎胸怀怒火，极力响应說：

“对！资本家逼得我們沒活路了，要和他斗！”

許多工人都齐声說：

“我們要他管飯，要他长工資！”

那个姓张的工人又說：

“現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运动，只有組織起来，资本家才怕咱們。咱們一定要抱团，众人捧柴火焰高！”

他的話，象一束束的火苗，点燃起大伙的勇气！占奎領先說：

“弟兄們！咱馬上找‘白毛’去！豁出去跟他拚一拚。”

“对！要不也得餓死！”大伙爭先恐后从高高的机板上跳下来，一拥就围上了柜台。

“白毛”正閉目养神，見这么多人，吓得那撮白毛都抖嗦，連連說：

“你，你們这是干嘛？”

“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工資！不許开除工人！”

“有話好說，別兴师动众的……”“白毛”故作鎮靜，

“好商量，咱們沒外人。”

当时“白毛”眉头一皱，計上心头：他想使个“金蟬脫壳”之計，于是象狐狸一样，狡猾地笑了，說：

“你們先散开，先干活去，一切好商量。”他劝着工人們散去，自己就夹着尾巴躲起来，他心里狠狠地說：“不怕你們鬧，餓你們几天就老实了。”

“白毛”好几天不露面，大伙急了。姓张的工人說：“‘白毛’騙了咱們！咱們怎么办？”

周占奎高声說：“他想餓死咱們，咱們砸开他的粮庫。”他的粮庫存着几十石玉米。工人們轰地上去把大鎖扭开，把粮食麻袋扛出来，架起七印大鍋，煮开了玉米粒吃。

工人們决定不回家，黑間白日集在一起。“白毛”听到消息，再也藏不住了，急急給警察局打电话，叫来一群武装警察鎮压。

工人們越集越多，个个拿起織毯子的刀子、剪子、絞棒，把全厂的毯子扣押起来。

警察长挎着个王八盒子，歪着脖子問：“为什么不好生干活，不交出毯子？”

周占奎挺身說：“我們要吃飯！我們要活命！毯子是工人的命，命就是这毯子！”

大伙随声吼叫，震得門窗都乱顛，象是一声声的劈雷！

警察长和那群狗腿子吓得往回縮，工人們趁势逼近

一步，一个个挺起胸膛，把織毯子的刀子、剪子、絞棒举起来：

“誰敢向前，咱就拚了！”

这些狗腿子們是吃过苦头的，他們知道，工人們一旦抱团是多么厉害！他們經過多少次血的教訓，他們害怕了。他們也耳聞着：解放軍快过来了，連自己的小命都不敢保住，还管这些閑事干什么？于是那个警察长，把王八盒子一挎，脖子一歪，罵了句街，跟狗腿子們縮着肩退走了。

这次斗争虽然胜利了，資本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但他們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还要施展。不久，占奎又失业了，只好又去拉車。

一天，他碰到那个姓张的工人告訴他：“天快晴了！”

啊！这是怎样的喜訊啊！漫漫的长夜终于渡过，多年的希望终于实现。东方升起了紅霞，映照着整个天空！占奎听到了解放天津的炮声，他激动得連夜睡不着。

解放后，当第一次和区长見面的时候，周占奎听到这样几句话，直到如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从此，就是我们的天下，我們工人阶级要当家做主，我們不再受人欺侮，我們站起来了！”

听了这些话，占奎的眼泪刷地流下来。

这个四十来岁的人，想起他的少年、青年和壮年，三十年来，多少个日月，多少个时辰，是怎样在資本家的毒打和謾罵、欺凌和侮辱下过来的，自己的一双手，被那刀

剪綫繩磨裂，身子坐穿了机板，头上結下了多少个伤疤！
啊！永远，永远不能忘記的階級仇恨啊！让这仇恨刻在
我們的身上，刻在我們的骨髓里吧！

“罰款通知單”

劉道華

在北洋紗廠廠史檔案里，保存着一批解放前資本家處罰工人的“罰款通知單”。這些“罰款通知單”的格式完全一樣。翻開它的內容看看：什麼小纒罰款若干；什麼扎絞不清罰款若干；什麼開大花罰款若干。真是名目繁多，無奇不有。

在舊社會里，挨罰和挨餓一樣是整天伴隨着工人的“家常便飯”。這些處罰條款是經過官方批准備案的“工廠法”，有所謂“法律根據”。

按北洋紗廠解放前的“工廠法”規定，資本家處罰工人的方式大體有五種：罰款、罰工、體罰、開除及送官究辦。罰款是其中最輕的一種，其他各種則往往也是和經濟處罰結合進行的。

單說罰款這一項，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屬於“情節較輕”者，諸如“不聽勸導”、“工作不力”等等，則“處以一角以上三元以下之罰金”；第二種，屬於“情節較重”者，諸如“工作怠惰”、“擅自集會”、“參加怠工、罷工”、“有蠱惑工潮之嫌疑”等等，則“處以五角以上，十元以下之罰

金，并得随时解雇”；第三种是“情节更重”者，如“不服处罚”、“蛊惑工潮”、“胁迫他人罢工”等等，则“除即时解雇外，并处罚其应得工资或违约金，必要时并送官究办”。一共是五十四项条款。在这些无孔不入的条款限制下，工人们随时随地都有被处罚的可能。真是寸步难行，谁要想顺顺当当地不挨罚，真比登天还难。

资本家对工人的处罚是从来不和工人当面讲清的，许多工人在被“处罚”之后还不知道为什么挨罚。那些资本家的狗腿子，每天在车间里来回巡视，只要他们对谁略加“注意”一下，或者他看哪个工人不顺眼，紧跟着一张四寸长二寸宽的写着各种名目的“罚款通知单”就会飞到“告牌”上。等到工人们下工看见自己的名字时，挨罚已经成为定局了。

假如有谁想去问问为什么受罚，那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根据“处罚条款”规定的“工作不力”、“疏忽怠惰”以及“其他比照事项”等等无所不包的内容，他们要想找谁一点什么“错”处，只要一张嘴就行了。

假如谁想要申辩，轻者就按“不服劝导，妄事争执”论，加罚一倍，重者要按“违犯厂规，不受处罚，强辞夺理”论，“除处罚全部应得之工资，还将即时解雇”。挨罚的人为了不再被加重处罚，只能“打下门牙往肚里咽”，将深仇大恨记在心里。

是不是都按着“条例”罚呢？也不一定。有一次，工人们象往常一样排成一条长龙，等候在搜身之后去领取

自己一份微薄的工資。当时，工人刘发心里焦急万分，他家里已經两天沒揭鍋了，他多么想赶快拿到自己的工資去买点粮食，让一家老小喝頓稀粥啊！好不容易挨到搜身了，工头們在他身上左摸右翻，猛然“啪”的一声，挨了一个嘴巴，打得脸上火辣辣的。他正懵头轉向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巴掌、拳头又飞了过来。“他媽的！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你要找死嗎？”刘发在怒吼声中低头一看，头上豆粒大的汗珠淌了下来，原来衣袋里被搜出一根紅头火柴。接着“条款”規定，“携带火柴”要处以一角以上三元以下的罰金。可是赶上关錢的日子，却不能那么“便宜”！发工資的职员把他的工資往抽屉里一放，板着面孔說：“回家去吧，明天不用来了！”不仅失了业，連当月的工資也被“罰”了去。

那年头，資本家不但找寻各种借口处罰工人，而且还逼迫工人忍辱含冤向厂方立字画押，表示“情願”接受那些蛮不讲理的处罰。这里只提供两份解放前工人向資本家立字画押的“悔过书”，就可以看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是多么阴险和毒辣。一份“悔过书”是张近武写的，他因为冒犯了資本家代理人的“尊严”，“情願接受处罰四月份工資三工”，恳求給予繼續干活的机会。另一份是李付书写的，除“情願接受罰款办法”外，倘若再犯，保人还得“願負五元之罰金”。罰了你的款，还要逼你承认这是“心甘情愿”的！真是岂有此理！

罰款对于工人來說要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熟

练的正式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仅仅拿到四角錢左右的工資。一个月里如果被处两元錢的“罰款”，就等于白干五天活。如果每月收支相抵的話，就得有五天吃不上飯，更何況当时的工資根本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呢！尽管工人的工資已經低得可怜，但是在关錢的日子，因为扣罰款，有几个工人能領取到自己全部的工資呢？

提起发工資来，过去北洋紗厂曾經有过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些忠实于資本家的狗腿子們除了和工人一样，每月分两次領取工資以外，还三天两头收到一些“小包”。这些小包是用紅紙紧紧包着的鈔票，有时是三元、五元，有时是十元、八元，有时甚至可能超过工資的数目。这些小包的特点不但是錢数不定，不說明原因，而且是暗中传递。每当他們收到小包之后，不但吃喝穿戴更加讲究，賭得更狠，而且工作更加勤于“职守”，执行“厂規”更为认真，处罚工人更为苛刻。局外人也許莫名其妙，內中人則“心照不宣”。原来这些奇怪的小包里，包着的正是从工人身上罰来的血汗錢，每一张鈔票上都沾滿了工人的斑斑血泪。

你不要以为資本家采取这种取之于此、用之于彼的手段，只是为了維持企业的“紀律”，是一笔不賠不賺的买卖。其实資本家采取經濟处罚的手段，不仅是为了把工人管得服服貼貼地給他干活，而且罰款还是一笔可观的額外收入。从北洋紗厂建立初期一九二三年流水总賬的賬面上看，当年罰款的純收入为四千七百多元。以三角

錢作为当时工人的日平均工资，它相当于四十多个工人的全年工资。这就是說有四十多个人为资本家进行着无偿劳动。资本家所以肯于拿出一部分残羹剩飯分給手下的走卒們，也是为了鼓励他們尽量多罰工人，来增加这笔額外的收入。

从这“罰款通知单”，也反映出了资本家狠毒的一面。

从一包棉紗变成百万財產

何仁初

上海曹家渡五角場南面，有一家荣丰綫厂，专门生产金手牌綉花綫、香檳牌木紗团。这个厂的资本家在一九二九年开厂时，只有一包棉紗，一部手搖机，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盘剝，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財產增加了三万倍。

一頁殘酷的剝削史

这个资本家是怎样从仅有一包棉紗变成“百万富翁”的呢？

在一九二七年，这个老板到上海和人合伙開設了余丰昌記百貨号，买卖絲綫、花边、十字綫等。当时，他只占股东的十五分之二。店的規模不大，資金也不多，但僱傭了三四个学徒，因为学徒基本上是无償劳动，加上剝削顧客，所以利潤很大，两年工夫，資金就增加了几倍。在一九二九年，他就開設了荣丰綫厂。当时的厂址設在車站的升成里，厂房是一个亭子間，用四十块銀元作資本，只

有一包棉紗、一部手搖機，僱傭一兩個工人，生產一般的十字綫。工人的工資很低，做一羅綫只有幾分錢，一天只能做五六羅，而老板的利潤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年以後，這個老板把廠房遷到閘北中興路，增添了兩部手搖機，工人增加到五六個人。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短短四年多時間，他的財產就增加到二萬多銀元。

榮豐綫廠老板在一九三一年以剝削工人所得，在山西路新泰安里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擴充了廠房，工人也從五六個人增加到三十人左右，生產綉花綫，定名為“金手牌”，利潤高達百分之一百以上。當時一羅綉花綫的成本只有一兩銀子，但可售二兩二錢銀子。可是工人的工資很低，一個工人一天可生產五六羅綉花綫，為老板創造七八兩銀子的利潤，而工人所得工資只有二角多錢。就這樣，經過兩年多的光景，老板的財產又從二萬多銀元增加到十萬多銀元。

老板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一九三四年又在開封路裕安坊租了兩幢房子做廠房，手搖機從六部增加到十二部，還新增了生產木紗團的木紗車、打蜡的蜡光車以及漂染設備等，工人增加到一百幾十人（臨時工占一半左右），開日夜兩班。老板為了把棉紗盡快製成綫，獲得高額利潤，有時候竟叫工人一連做幾十個小時，而工人得到的工資仍然很低，連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難以維持。在這個時期，老板又從工人身上榨取了大量的血汗，財產從一九三四年的十萬多銀元增加到三十多萬銀元。

一九四六年，榮丰綫廠老板又在曹家渡五角場的南面買了六畝多土地，建造了一批廠房。廠里的手搖機也从十二部增加到二十四部，蜡光車从三部增加到十二部，添置了一千三百多錠的并綫車。老板的剝削手段更殘酷、更毒辣了。他从乡下找來了一百多個十三四歲的童工，叫他們跟老工人學，等童工學會后，老板便把大多數老工人解雇。从此以后，这一百多個童工就成了老板的主要剝削对象。他們过着牛馬般的地獄生活，有些沒有等到解放，就被活活折磨死了。可是，老板却大发其財，成了一个拥有百万財產的大資本家，还在開封路、大林路、尚文路以及靜安寺附近等地購買了六七十幢房屋，造了花园洋房，在大場、江苏青陽买了許多田地。

那么，这个資本家又是用了哪些手段殘酷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价值的呢？

“若要发，工人头上刮”

榮丰廠老板常常对他的亲信說：“若要发，工人头上刮。”这是資本家发财的“奧妙”。

首先是这个老板把工人的工資压得很低。老板为了分化工人，更多地剝削工人，采取了四种工資制度：一种是他的亲信和少数職員，老板为了利用他們管工人，因此有較高的工資。第二种是男工，供給伙食，也有一定的工資，开始規定一个月有一担大米的工資，后来改为一担柚

米，再改为七斗籼米。后来他认为物价飞涨，发米对他不利，又改发伪钞。原来规定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发放两次工资，而实际发放的日期要拖到六日和二十日，还要在晚上六点钟以后才发，发时，不但仍然按照一日和十五日的生括指数^①，而且还要搭发本票^②。因此工人领得的工资又打了七折八扣，只能买三四斗米。第三种是女工，她们虽说是计件工资，但是每天做了十几个小时，被老板扣去饭钱以后，所得无几，有一段时候，三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能做一件布罩衫。第四种是童工，他们的工资更低，每天从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做到晚上九点钟以后，一个月三十天，一天也不请假，每月所得的工资只能勉强当饭钱，如果这个月生三天病，那么这个月的饭钱就付不出，有些童工还要倒贴饭钱。

其次是劳动时间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每天都在十五六小时，有的甚至达十七八小时。生意一好，老板在深夜把已经睡在床上的工人拖起来再干。

除了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他连工人的伙食费也要刮。不管工人是否吃饭，每月饭钱照扣，而给工人吃的

① 生括指数全称生活费指数，原来是反映居民家庭生活开支变动情况的指标。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狂涨，经过工人斗争，一度实行按生括指数计算工资的办法。但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伪造指数等手法，千方百计降低工人收入。

② 这里所说的银行本票，实际上是指银行所签发的“拨款单”。当时物价一日数跳，现钞不敷市上需要，因此用拨款单购货，就要贴水百分之五至十左右。所以资本家发工资搭发拨款单，就是对工人的一种额外剥削。

却是发了霉的黄糙米，而且稗子很多，一碗飯里可以拣出一小酒杯的稗子，小菜又是毫无油水的臭咸菜。

各种各样的罰款，也是老板剝削工人的一种手段。这个厂虽然沒有明文規定的罰款制度，但是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扣罰工人的工資。这个厂扣罰工資的办法之多，真是令人吃惊。比如一张商标落在地上要罰款，一根几寸长的紗头落在地上要罰款，車間內根本沒有痰盂，工人把痰吐在地上也要罰款……。老板在罰款时，事先根本不同工人讲一声，到发工資的时候，就扣掉了。女工臧玉娣，仅仅因为一根三四寸长的扎綉花綫用的綫头落在地上，被老板看見了，就被罰去两天工資。女工周文玉在貼商标时，有根头发夹在里面，老板不仅當場罵了她一頓，而且还罰了她一个星期的工資。莫名其妙地被老板扣罰工資的事例太多了！貪得无厌的資本家就是这样殘酷地剝削工人的。

从童工身上刮，也是資本家主要的剝削手段之一。他用童工的手法也很巧妙，一方面用小恩小惠籠絡人心。他回家乡的时候，給左邻右舍送一些东西，装出一副“慈善家”的样子。另一方面通过他的亲信去做个别工作，介紹童工来厂。同时，为了控制全厂、監督工人，老板所用的職員大多数是自己的至亲好友。他叮囑这些亲信，在剝削工人的同时，也要从童工身上打算盘，想尽办法控制童工。如果童工稍有反抗，他就通过介紹人把童工的家长找来，給予警告。

压迫工人的“规矩”

工人进了荣丰綫厂就失去了自由。这个厂的老板规定一般工人每天劳动时间要达十五六个钟头，一个月只有两天提早两小时停工，允许工人出去买点东西，但必须开门票。其余时间一律不得出厂。厂门整天上锁，好比监牢，工人有亲戚来探望，象探望“犯人”一样，只能通过铁门的小洞（这个小洞也装上铁栅）见见面，讲几句话。如果要进入厂里的会客室，必须得到老板的亲信批准，会见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在厂里，他也规定工人之间不能聚在一起谈话，一天劳动十几个钟头以后，要马上回工房，不能在露天三三两两地谈话。女工毛健英说：“监牢的犯人也还有规定放风的时间，晒晒太阳，而荣丰綫厂的工人连晒太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终年是“做工进车间，睡觉进工房”，不准你有跑动的自由。工人住的地方很象鸽棚，六个工人住一只鸽棚，一只鸽棚有三层，每层只有两尺半阔，但要睡两个工人，因此，常有工人从铺上跌下来摔伤。分纱工人李曼娟，跌伤了头部，患了脑震荡，直到现在还常常发病，成了终身的残疾。

这个厂的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受老板的残酷剥削，政治上受老板压迫，而且在精神上也受老板的各种侮辱。比如抄身制，起初在闾北的时候，是由老板娘亲自抄身的，女工们做完十五六个小时生活以后，要一个一个站

着，等老板娘来抄过身，才能离厂。抄身的时候，要从颈项起一直摸到脚底，工人的鞋子每天都要脱下来给老板娘摸过。有的女工裤带用旧了，有点线露在外头，老板娘一定要女工把裤带解下来检查。

这个厂的老板经常毫无理由地开除工人。有一天，有五个女工在收线的时候，竹竿上有几根纱线没有收干净，被老板看见了，当场把这五个女工训斥一顿，第二天全被开除。又如有个男工，一天晚上，因不小心撞翻了一盘木芯，他赶忙拾起来，可是老板硬说这个工人是有意损工具，立即开除出厂。这个工人回到家乡气得吐血不止，不久就死了。

男女之间不准谈话，不准相互看望，这也是老板立的规矩，如果违反，也要开除。蜡光间有个男工，一天因为蜡光车的皮带断了，不能操作，等候机匠来换，这时候，他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同女工讲了几句话，正好被老板撞见，说这是违反厂里的规矩，便叫他的亲信把这个工人的铺盖扔出厂门，当天开除出厂。老板为什么连男女工之间谈几句话也不允许呢？原来是他认为男女工之间谈话，是在动“坏脑筋”，会分心，不利于生产，不利于他更多地剥削工人，所以要开除。

筑在化人滩上的“百年基业”

荣丰线厂的厂基，原来是一块荒地，是化人滩（义冢

地)。这个老板以剝削工人所得的血汗錢，买下了这块化人滩，挖掉了这里的棺材、尸体，建造厂房。新厂房落成以后，老板特地做了一块“百年基业”的大匾挂上。工人们說这是老板搬掉了老的化人滩，却又筑起了新的化人滩。

在老板的殘酷压榨下，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惨。特别是童工，由于劳动時間很长，吃的又特別差，而她們絕大多数都还是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受到如此的摧殘，有些就被活活折磨而死。在工房里，每天有童工的哭声，她們有的是被資本家扣了工資，付不出飯錢而哭，多数則是生了病，无錢治疗而哭。許多童工，原来是很活泼的，但是进了这个“活地獄”以后，一个个都变得面黄肌瘦。童工楊有娣，日夜做死做活，得了“干血癆”，病倒在工房。工人看了，便去找資本家談，要他借点錢，給楊有娣治病。誰知这个狠心的老板却一文也不肯借。楊有娣在厂里，吃不下飯，还得付飯錢給資本家，实在沒有办法，只得回乡下去。回去后，沒有几个月就死了。童工王美容，她父亲也是荣丰綫厂的浆紗工，年老了，被資本家开除。王美容自己因劳累过度，不久也患了病，被資本家开除出厂，回乡后过了两三个月也死了。王美容的父亲因刺激太深，得了精神病，昏昏顛顛赶到上海，向老板算帳，要他賠償損失。可是这个老板把袖子一甩，坐上汽車走了。

工人生病、死亡的逐漸增多，老板就想出了一条詭計来欺騙工人。他叫他的亲信对工人說，这块土地原来是

化人滩，堆放棺材的，“有鬼”，所以生病的多，要大家每月初一、月半，买锡箔在車間里烧。而老板自己，也装腔作势地在車間里点烛烧香，还叫“风水先生”給他看“风水”。他用这一套迷信的鬼把戏来欺騙工人，忍受他的殘酷剝削。

“削尖头皮到处钻”

資本家在厂內殘酷剝削和压迫工人的同时，在对外經營业务中也用了許多投机取巧的手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削尖头皮到处钻”。

他为了推銷“金手牌”綉花綫、“香檳牌”木紗团，首先是大做广告，进行宣传。他在本市、外地的報紙上整版、半版的大登广告，用霓虹灯在国貨公司、永安公司等处做广告，还用电影广告、路牌广告等形式，到处吹嘘荣丰綫厂的产品质量好、顏色鮮艳、經久耐用，使人以为这一定是个大厂，信得过。当他的产品打开銷路以后，就提高价格，“金手牌”的綉花綫，比一般綉花綫的售价高出百分之三十以上。

他在大做广告的同时，还亲自出馬，同上海的国貨、永安、大新、先施、新新、丽华等六大公司的經售部負責人应酬，請客吃飯、送礼，然后再搞九九回佣（即經售一百元錢的貨，可以貼一元給經售部負責人），这样，逐步打入了六大公司。并在北京、青島、新加坡等地，搞特約經營店，以九折回佣予以优惠，但是，一經銷路打开，佣金就逐步

降低，以至取消。他还在南京、广州、汉口、昆明等大城市，設立发行所，用試銷、寄售、賒銷、贈送試用等办法，以及利用提倡国貨的机会，参加各地的国貨展覽，扩大推銷。此外，他还用跑街、推銷員的办法，派一些人拾了皮包一家一家去兜售。这样一来，“金手牌”綉花綫的銷路越来越好，利潤也越来越多。

剝削同反剝削的斗争

这个“百万富翁”为了保护他剝削所得的“百年基业”，还同伪警察局、社会局等勾結在一起，欺压工人。可是，这一切都不能抵制工人的反剝削斗争。这个厂的工人，曾經多次起来罢工，反抗老板的殘酷剝削。一九四八年，荣丰綫厂的工人，为了改善生活，保障最低的生活水平，提出了女工要供給伙食，工資要按每月发工資当日的生括指数发放，并且不得搭发本票等等条件，进行罢工斗争。当时，这个老板勾結了黄色工会的理事，用軟硬兼施的办法强迫工人开车，并且不許工人外出与其他厂联系。可是，工人们坚持斗争，一小时以后，飞綫厂的工人也赶到荣丰綫厂，一起罢工。当时，工人们把荣丰綫厂包围起来，要老板答应工人的条件。老板想了一条毒計：叫他的亲信越墙出去报告，伪警察局派来两个便衣警察，企图鎮压工人。可是工人团結一致，斗争非常坚决，这两个伪警探头探脑地看了一会便溜走了。后来老板与伪社

会局勾結起来，由伪社会局調解。反动政府当然不会支持工人的要求，工人和資本家的談判沒有进展。老板們坐着汽車要溜了，工人把老板的汽車都拦下来。最后，老板不能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工人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永远不能忘記階級仇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工人翻身了，可是，資本家不甘心，又用了毒計，把他的代理人(厂长)打入工会当主席，并搞什么“同乐会”，和工会唱对台戏，气焰囂张。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們展开了斗争，揭露了資本家的阴谋，取得了胜利。

解放以后，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企业公私合营以后，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党的教育下，工人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不少当年的童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为老板当牛馬，尽管一天强迫劳动十五六小时，一个工人只能生产五六罗綉花綫，而現在八小时劳动，却生产十多罗，劳动時間减少一半，产量提高一倍以上。工人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生、老、病、死有了保障，再也不用象过去那样愁吃愁穿。許多老工人說：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我們决不能忘記階級仇恨，决不能忘記階級斗争，要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二衙門”里

山东济宁火柴厂从一九二〇年开办，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工人在这个厂吃的苦、受的罪，說起来阶级仇恨涌上心头，那喝人血的资本家，那作恶多端的工头，欠下了工人们多少“债”啊！

济宁的“二衙門”

旧社会，这个厂是鲁西南一带出名的“二衙門”、人間的“閻王殿”。厂門口挂着軍閥、道尹、县长用金字写的“兵士禁进”、“庶民禁入”的大招牌，門口有两个荷枪站崗的警卫，在这高达两丈的墙头上設有三道电网，四角設有崗楼，厂內住着县大队的一个小队防守，资本家出出进进有专车，有挎着盒子枪的跟班，活似衙門口。

每逢星期三、星期六的晚上，是工厂“教习室”过堂的日子。教习把犯了“罪”的工人，輕者吊起来用竹苗子抽打个半死，重者按倒在地用“黑紅棍”打个皮开肉綻，然后开除，这叫“一打二革”。这两天晚上，厂子里除了受刑工人的呻吟声之外，再沒有別的声音。工人们只好咬着

牙，瞪着眼，看着自己受难的弟兄，把仇恨記在心里。

新进厂的工人，三个月不准出大門。以后每半个月才准出外一次。外出时必须向教习請假。天一黑，大門就落了鎖，工人就被撵进象鸽子籠一样的宿舍里，出来解个手也得报告“舍长”。夜里有拿枪的軍警放哨巡邏，有拿二齿鈎的更夫打更。你看，这与在衙門里坐監牢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 张 卖 身 契

那时候，穷苦人为有碗飯吃，托人担保进这个厂，必须在“鋪保书”上写明：“三年不拿工資，食宿由厂負責。遇有天灾人禍，死亡疾病，各听天命，与厂方无关。”写了这样一个卖身契才能进这“二衙門”。

工人一进厂的大門，就完全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做工时有大小把头們監視着，工头手里拿着木板子、竹苗子，看到誰不順眼就連罵加打。工人一天到晚劳动十六、七个钟头，好不容易熬过三年，每月才掙二、三块钱的工資。就是这几个微薄的工資，资本家和工头們还是眼紅，常借紅白喜事、阴寿阳寿等名义，敲詐勒索，硬要工人向他們“贈送”烟酒、茶点等礼物。送得少的就調你做笨重难做的活；不送的，不出三天就会无中生有地找个借口把你痛打一頓，踢掉飯碗。例如：“总教习”添了个儿子，逼着每个工人拿出五角錢送“祝米

礼”，五角錢是工人好几天的工資啊！工人郭緒明因为沒錢，沒送这份礼，一天，吃晚飯时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筷子，“教习”卢淑臣就說他“飯吃够了”，拉到教习室，用“黑紅棍”打了个皮开肉綻，撵出了工厂。把头們还引誘工人賭博，毒害工人。有个叫王运周的工人，每月只二、三元錢的工資，平时就欠下很多債。他在把头們的引誘下，也参加了賭博。有的把头对他說：“賭吧！你沒錢，我借給你。”有一次輸掉了二、三十元（相当他一年的工資），債主逼着向他要，并打了他两个嘴巴，活活把他逼死了。

往日的火柴厂，黃磷的毒气、油盘的烤热是对工人生命的两大威胁。資本家只想賺錢，哪管工人的死活？車間里沒有任何劳动保护設施，劳动条件坏到了极点。厂房仅是一层薄瓦，夏天暴日一晒，加上油盘烘炉的高溫，車間里热得象蒸籠，悶得人們喘不过气来。工人实在受不了，只好借上厕所的工夫出去松一口气。被工头們知道了，說什么是“偷懶”、“磨洋工”。于是，立了个“簽子制”。工人上厕所必須到工头那儿要“簽子”，百把人的車間仅两个簽子。夏天，天气炎热，工人要求中午讓他們休息一下，資本家也不答应，反而把窗戶紧閉上了，門給上了鎖，想通通風都不行。有的工人热昏在地，还得經過工头的允許，才能拉出車間，用凉水噴过来。工人汪宗湘就是因抗不住热，暈倒在車間，工人急报資本家，可是資本家不理，終于死了。

許多工人由于蜡油的烟熏鬧眼病。厂里不但不給治，“教习”卢淑臣还丧尽天良地用碘酒給工人点眼。不少工人中了黄磷毒，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吐黄水，天长日久，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资本家宁願人死了，也不給治。一天，张二非病得很厉害，实在不能起来干活了，“教习”卢淑臣看見了就說：“三脚踢不起来，才算真有病。”于是把二非踢了几脚，硬拉起来逼着他去做工。有一天他要求調他做輕便工作，还被把头打了两个嘴巴。沒多少日子，二非实在爬不起来了，工头和资本家一合計，认为在他身上实在榨不出油水了，便說：“厂里沒有閑飯养活閑人。不能干活就叫他滾！”中午，二非就被一脚踢出了厂門。二非被开除后，大伙儿給他雇了輛車送他走，走到城西南八里庙就断了气。资本家为了掩人耳目，偷偷地用一領破席把张二非的尸体埋了。不久，张二非的老母亲来厂看儿子，资本家竟避开工人耳目对她說：“你来得正好，你儿子偷跑了，正想跟你要人哩！”

资本家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不許工人請假。排梗工人老陈，家住城东小郝村，离厂十一、二里路。他母亲病死了，家里一早就来报信，大門上不給传，直到晚上收工时老陈才知道。他馬上找“教习”卢淑臣去請假，卢淑臣不但不准，反說：“人死了，你回去也治不活啦。不准！”老陈出門时，把門帶得响了点，卢淑臣就大发雷霆，把他拉进教习室，打了一頓“黑紅棍”，撵出工厂。

誘騙童工摧殘女工

資本家為了賺錢，曾採取登廣告和派工頭到附近農村去招收工人的辦法，騙來大批童工。特別是在災荒年頭，趁機去誘騙那些挨餓受凍的農民。他們說，到城里去做工如何享福，如何住洋房，吃洋面，逛大街，工資又高。一旦騙到廠里，就要完全聽資本家擺佈了。有個童工，聽了招工的鬼話來到火柴廠，分配到排梗工段。資本家要他和大人一樣每天干十六、七個鐘頭的活。他整天累死累活，吃霉面餅，晚上還不得好睡。不久就得了胃病，吃不下飯去。伙伴們眼看他一天天吃不下飯，就要病垮了，大伙湊了几个錢，托人买来一点杂面条，为他补补身体。刚煮好了面条，被监工刘猴子瞅见了，刘猴子进屋照锅就是一脚，二话没说揪着他的耳朵就拉出了厂门。晚上又把这一屋的童工痛打一頓。

不久，另一件更殘忍的事又發生了；刘猴子有个侄儿得了貧血症，需要輸血。刘猴子找到身体較好、年龄仅十五、六岁的小楊說：“你如願意給我侄儿輸点血，以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小楊受了騙，給他侄儿輸了二百CC鮮血。小楊輸过血，加上久受摧殘，面黃肌瘦，不能干活了。資本家看看不能替他出力了，就和刘猴子一起使出了惡毒的手段來。一天，刘猴子和几个工頭在一块打牌，叫小楊在一边侍候，到了半夜他們就支使他去燒湯。

小楊到厨房刚点着火，刘猴子就一步闖进厨房，喊着：“你要放火烧工厂？”他們就用这个借口，把小楊开除了。

火柴厂的包装女工就更苦了，她們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得进厂，晚点就进不去大門。不管傾盆大雨，还是大雪封地，都得早早地到厂門口等着。厂里規定：結了婚的女工，如怀了孕、生了孩子的就开除。許多女工夜里生了孩子，因怕资本家知道踢了飯碗，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頂着西北风去上班，多数落下了腰痠背痛的疾病。陈永怀的媳妇，怀孕三、四个月了。一次，一連两三天沒吃一点飯，恶心、头晕、眼花，手头有些慢。监工郭闊王上去照腰就是几板子，还罰她四个牌。本来一天只挣八九个牌，又被罰去一半，这日子怎么过？

同资本家斗争

火柴厂工人一天要干十六、七个钟头的工，可是住的是四四方方象鸽子籠一样的屋子，十二三个人挤在一个破烂木板釘的通鋪上。资本家拿着从工人身上榨取的血汗錢尽情揮霍，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請一次客就花几百块現大洋。“教习”卢淑臣去听戏，每次都是包厢。资本家喂的狗有专人侍候着，专为狗盖了一座瓦房，每天喂白面饅饅和烧肉。

资本家这样压迫工人剝削工人，工人們就想法子反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工人們腰杆子就更

硬了。

資本家走狗卢淑臣的朋友包办工人的伙食。一月六块钱的伙食费，吃不到三块钱。工会一成立，工人就收回了自己的食堂。从此，月月不仅吃的好了，每月还有结余，分一两块的伙食钱。同时，工会又给工人粉刷了宿舍，分了床铺。

“教习”卢淑臣，看见工人的生活好了，勾结壩口区的大流氓刘玉太（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惩办）来包办工人的伙食。一天，卢淑臣对工人伙食委员们说：“你们一天到晚干活够累的了，还要为大伙操劳伙食，长久下去会搞垮身子的，还是把伙食包给玉太吧。”大伙一听，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把戏，当场工人们就说：“我们情愿劳累！”文的不成，卢淑臣就唆使刘玉太在街上截打工人伙食委员，想迫使工人把伙食包出去。大伙一听气得要炸，立时组织起三百名竿子队，实行自卫。

资本家一看工人的力量越来越大，就指示卢淑臣出面，组织个“师徒会”来与工会唱对台戏。谁是真，谁是假，谁是干什么的，工人眼睛雪亮，卢淑臣那一套始终没人理。

资本家一看，这一手不成，就采取了不来原料、停止生产的手段对付工人，并且扣着两个月的工资不发。一天，工会召开了工人大会。会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马上开工，马上发两个月的工资。为了争取工人的生活权利，还举行了罢工。

解放后，“二衙門”变成了人民的工厂，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今天，火柴厂的生产，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发展，工人生活也改善了。不过，党时刻教育工人，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也不会忘记过去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永远把这笔账记在心间。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济宁火柴厂党委办公室通讯组

“蛋大王”的伎俩

上海禽蛋二厂老年人 张仁宝

解放前，上海黄浦江畔外白渡桥边，有家茂昌蛋业冷藏公司。那时，这家公司在上海、青岛、香港等地开设了十多个蛋厂；在全国的主要产蛋地区设下一百多个鲜蛋收购处；在英国伦敦开设海昌公司；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设有销售代办处。这个公司的老板在旧中国是赫赫有名的一个“蛋大王”。

可耻的起家

茂昌蛋业冷藏公司大老板是浙江奉化人。他到上海进了一家蛋行以后，由于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效劳，得到资本家的赏识，不几年就爬上了经理的位置。他在这个蛋行里捞了一笔钱，就和别人合伙开设了“承余蛋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那时，上海滩上大大小小的蛋行很多，一般都是自购自销，有的也做点出口生意。这个老板为了发大财，一九二一年，恬不知耻地花钱去买了个葡萄牙国籍，改名换姓，变成葡萄牙人。随后，就从承余公司抽出

一笔錢独資开了茂昌洋行，招牌上加上了“葡商”两字。以后，他看到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得势，就改为×商，招牌上一忽儿“葡商”，一忽儿“英商”，一忽儿又是“日商”。他挂着洋招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特別优待，当时他到农村采购鮮蛋，从产地到上海，真是通行无阻。同时，他为了垄断鮮蛋，还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等主要产蛋地区，設下一百多个鮮蛋收购处，还勾結当地地痞、流氓、把头为他效劳，收购鮮蛋时，任意压低价格，剝削农民。

这样，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为了要做出口生意，一九二三年，这个老板到洛士利洋行（当时做冰蛋出口生意必須經過上海洛士利洋行代办）勾結上了一个英国人，每月送他一千元，叫他办“外交”，专门同外国商人打交道。同时，还到大美冰厂勾結一个叫卡尔登的美国人，叫他管“内政”，帮他制造出口冰蛋。老板对这个美国人說：“茂昌蛋很多，可以大量制造出口冰蛋，能做成生意，賺錢按成头分。”第一年，这些外国人就帮他推銷冰蛋五百吨，第二年增加一倍，第五年就增加到五千吨，以后出口生意越做越大。五年內，老板光分給美国人卡尔登的成头就有四十万銀元。不久，这个老板又在青島开了一个蛋厂。他又亲自去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葡萄牙等国兜生意。后来，他在英国开設了海昌蛋公司，勾結当时上海培林食品厂的一个外国人，以月薪七八百元为代价，叫他去当經理。并在这些国家挂起“中国茂昌蛋品銷

售代办”的牌子。

这个老板为了压榨工人，把美国人卡尔登长期豢养在厂内，称他为“工程师”，专门对付工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勾结国民党一个特务头子，叫他到厂里来监视工人活动。

两种牌子

茂昌蛋厂老板压榨工人的手段十分狠毒、狡猾。当时，厂里除了长期雇用的工头外，绝大部分工人是临时工。雇临时工的花样也很多，分成什么基本临时工、长临时工、短临时工、临时工、特别临时工等许多种。基本临时工，一般每年能做十个月左右。特别临时工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其他临时工，只能做上一个旺季。一到旺季，一个总厂，就雇用一千多临时工；生意一清，就把临时工大批退掉。

那时谁要进茂昌蛋厂做临时工，也不是容易的。首先要向老板交保单，而且要殷实铺保，老虎灶、浴室、剃头店、小纸烟店都不能作保。当时很多失业工人听说厂里老板的亲信能作保，只好借借当当、拼拼凑凑，给他们送礼，要他们在保单上盖个章。同时，还规定每年要打一次保，每打一次，都要送礼。

当时，老板发给临时工的工资很少。一般工头每天可以拿到一元多，大工头还要多得多，而临时工刚进去，

只有三角八分一天。老板規定，临时工每隔一年可以加二分工銀，可我在厂里做了二十多年临时工，也只拿四角八分一天。

老板为了从大批临时工身上榨出油来，还想出許多恶毒的办法。临时工一进去，就要他在头頸上吊块牌子，挂在胸前。牌子分两种八档：一种是紙牌子，紙牌按白、蓝、黄、紅四个顏色分档；另一种是銅牌子，以繩子作标志，繩子也按白、蓝、黄、紅四色分档。

老板把牌子弄成这許多花样，完全是便利他对临时工的剝削。刚进去，只能从白紙牌子吊起，到淡季解雇时，挂白紙牌的第一批先走。

吊紙牌子的，一年能做三至五个月左右，吊銅牌的，能做六至十个月左右。这样，就促使工人为他卖命。他看你能拚死拚活做的，才允許一档一档地升上去。

强迫我們工人吊上了这块牌子，也就沒有我們自己的姓名了。老板只认牌子上的号碼，不喊工人的姓名，也不准工人互叫姓名。工人上班，要凭一本小折子去領牌子，領牌子一定要一次准确地报出牌子的号碼，要是报錯号碼，先要低头立在一边，最后来一番“考試”，如果再报不出，那就只好回家。

当时，临时工的工作時間相当长，旺季每天要做十三四个小时，常常还被逼着不分日夜地干。那时我們工人是“有牌拿命抵，无牌餓肚皮”，因此只好拚命做。很多工人劳累得站立不住了，还得支撑着干。有一次，一个吊着

紅紙牌的女工在肩蛋時，由於勞累過度，地上又潮濕，身子一晃，腳下一滑，就摔倒在地。不幸的是，一根鐵絲恰巧戳進她的太陽穴，她當場昏過去了。工人們看到這個女工流血過多，就要把她送去急救。可是老板臉一沉，冷笑說：“不要大驚小怪，你們快去出蛋。”工人們氣憤地說：“不能見死不救啊！”這個老板却氣勢洶洶地說：“她自己不當心，怪誰？嗯，外白渡橋邊找一條狗困難，喊一百個人來弄蛋便當得很！你們還不去出蛋，蛋出了問題，個個都跑不了！”說着，他就走了。

“救人要緊！”工人們偷偷地把這個女工送到醫務室去。誰知因為她是臨時工，醫務室不管診治。沒法想，只好把她暫時送回家去。可是，剛抬到家，就斷氣了。後來，死訊傳到廠里，老板第一句話就問：“牌子收回了嗎？”

處罰種種

這個老板豢養了許多大小工頭來壓迫工人。工頭名目繁多，有監工、拿摩溫、副頭等等。小工頭送“情報”，大工頭專門搜查、監視工人。要是工人犯了點“規則”，大工頭就要來處罰。

老板的“規則”真是五花八門，連工人說句話都算犯規。有一次，我在拷蛋，和對面一個女工說了兩句話，笑了一下，一個大工頭馬上走過來氣勢洶洶地說：“你們要說說笑笑，索性回家笑三天！”說着，就逼我們把牌子拿下

来了。

老板还规定一套处罚工人的办法。只要哪个工人有点“不是”，就采取“罚款”、“警告”、“记过”、“审堂”来迫害工人。工人照错一只蛋、拷坏一只蛋，都要处罚。当时工人被记上“警告”，就要挨工头一顿臭骂；记上“小过”，工资就不能加；记上“大过”，年底保单不好打；三次“大过”，当场开除。特别是在六、七月份，天气热，坏蛋、臭蛋特别多，我们临时工就常常遇到“记过”、“审堂”的灾难。那时，凡是一记上“小过”的临时工，就象吃官司一样，到了晚上，被逼去站在大工头面前挨“审堂”。工头逼着工人要说出三句话：“自己不好，下次当心，买礼讨饒。”才能被“释放”，礼到他们手，才给工人“消过”。

老板豢养的这些大工头还强迫工人一年四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给他们送礼，要是谁不送，就要吃苦头。有一次，有个工人因为买礼送工头，自己餓了一天肚皮，气愤之下在墙上写了“十个头老、九个孤老”几个字。工头一发现，马上就來揪住他的头发，大罵：“坏蛋、坏蛋！”另外一个工头也杀气腾腾地抓着一把扫帚乱抽，打得这个工人嘴巴、鼻孔鲜血直流。最后强迫他答应重新买礼，才算了结。

后来，老板对我们工人的处罚更野蛮了。他规定巡夜工人自晚上八时到次晨五时，每隔一小时在厂内巡视一圈，并身带更表，巡查到每一座楼前，用楼门上特装的钥匙，在更表上转一下，更表便会自动记录一次，次日交

給職員檢查，如發現不按时巡查，就以失責論處，輕則罰款，重則开除。照蛋工人照錯一只蛋，被工头复查出来要罰二角。有个叫袁双法的临时工在扶梯口吃香烟，老板知道后，被罰掉二元。有个挂黃紙牌的女工，因为一只空罐子掉在地上，凹了一点，工头就逼她罰了二角。罰款真是多如牛毛。要是临时工对这种處罰有一点反抗的表示，馬上就被“摘帽子”。有一次，老板逼着工人加班。工人从早上做到晚上九点钟，还不肯放走，工人个个餓得要命。当大家听到放工哨声，都急着朝外奔，去想法弄点吃的。但是，这时过道处的一架磅秤上放着的一只流青蛋盘，不知怎么翻了。有个工头看到了，不分青紅皂白，他从人群中一把抓住女工厉月姐恶狠狠地說：“是你撞翻的吧！賴勿了啦！”这个女工着急地說：“盘翻在地上，我还没到这里呐！”工头說：“你嘴巴还老？还敢不承认？”

“我没碰，叫我承认啥？”

有个副头走来嬉皮笑脸地說：“你就老实点吧，賠也只不过几块钱，飯碗要紧啊！”

厉月姐气愤地說：“不是我撞翻的，我不賠。我宁可回家餓几天肚皮！”

工头看她不低头，就火冒三丈，气势汹汹地把她头上的帽子摘下，朝地上一扔，嚷道：“你犟，今朝沒工資，回家三天。”

有冤无处伸，月姐只好含泪交出牌子回家去了。

人間地獄

当时，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女工。老板規定不准女工帶小孩到厂里來喂奶。有了小孩的女工，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口奶，都得想法子和家里約好時間，由家里人把小孩抱到厂門口，自己裝着去小便，偷偷地到馬路边上給小孩喂点奶。有一次，一个女工去給小孩喂奶，被工头看見了。工头冷笑地說：“这下子，你怎么办？”这个女工好說歹說，后来买了斤蜜枣給工头送了礼，才算饒过她。那时，工头監視得很紧，要找个机会給孩子喂口奶可真难啊！

那时女工是沒有产假的。有一次，一个女工忽然在馬桶間分娩，因为怕老板知道要开除，不顾自己身上寒冷，脫下棉衣把小孩包起来，当作一包东西，偷偷地藏到大炉間后边的一个煤灰堆边。恐怕被人发现，她还特地找了张坏草席盖在上面，自己再支撑着去干活。但是当她晚上赶去抱小孩时，却不見了。她急得团团轉，又不敢問人。有些工人看到她焦急、害怕的样子，主动問她：什么事情这样急？这个女工着急地說：“我有包东西放在煤灰堆那边，不見了！”工人们說：“下午有車子来出煤灰的呀！可能和煤灰一道拉走了。”顿时，这个女工泣不成声。但是，为了保牢飯碗，她又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找寻自己的亲骨肉！

工人在厂里做工，是没有劳动保护的。照蛋女工都是赤着脚弄蛋。冷藏工人就只能穿件百孔千疮的棉衣，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冷藏仓库里干活，一天要干十二个钟点。老板怕工人出来“偷懒”，还叫工头把冷藏仓库大门锁牢，不让工人自由进出，硬逼着工人在冷藏仓库内挨饿受冻。

资本家只顾赚钱，哪顾工人死活。厂里有电梯，从底层可通达四层楼。但这电梯只送老板、外国人和老板的亲信，搬运东西都强迫工人肩背抬扛。特别是冷藏工人，一天扛到晚，从底层一直肩扛到楼上，最高的冷藏仓库有九层高，也只能肩背抬扛。有一次，一个冷藏运输工人，肩了一箱货往上跑，因为又累又饿，支撑不住了，一个“倒栽葱”，从三楼摔下来，当场身死。

由于没有劳动防护措施，蛋厂工人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一九三〇年，有一次厂里工人刚拿上饭盒准备吃饭时，阿莫尼亚管子突然爆炸，造成一个大惨案。一个工人从二楼跳下跌死，几百个工人受伤，有的头撞破，有的眼睛出血。事后，老板看到有些工人受伤，不能为他卖命了，就逼着他们回家“休息”。还有一次，十六铺南茂昌分厂，有个叫小馬的工人被机器活活轧死，当时工人要求老板买口棺材为他送葬，可老板不但不理，还强迫工人在后墙壁上挖了洞，叫工头把小馬的尸体从这个洞口送出去。

那时厂里经常发生伤亡，老板看到我们工人很气愤

的样子，就要了个新花招，强迫工人組織“长生会”，規定每死一人，每个工人出二角，作为死亡职工的喪葬費，并規定从工資里扣除。以当时厂里工人計算，每死一人，扣下的喪葬費就有一百多元，相当于一个临时工一年多的工資。这些錢也都被老板撈进腰包里去了。

在資本家殘酷的剝削下，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慘，都恨透了資本家。后来，厂里工人紛紛起来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这个老板感到事情不妙，就采取軟硬兼施的办法，一面以記过、开除等来威胁我們工人，一面假惺惺地装着“同情”工人的样子，表示願意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并玩弄“賞工”手法来欺騙工人。他吹嘘：凡是工人連續做滿十工，就可“賞”一工，拿十一工的工資；連續做滿十四工的，可“賞”两工，即拿十六工的工資。这完全是老板敲骨吸髓地剝削工人的一种手法。工人常常做到九工半、十三工半时，老板就借口說蛋不多了，叫工头来逼我們工人把牌子交出，回去停工一天，或是强迫工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念“耶穌經”。一停工，“賞工”就要从头算起。因此，工人經常拿不到这个“賞工”。

那时，我們工人除了担心打罵、处罰和发生工伤事故外，更担心的是做不动了，被一脚踢开。

厂里有件很悲慘的事，我們永远也忘不了。

有个吊着 16 号銅牌的老年工人陈金娥，在厂里做死做活做了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她白天要为資本家卖命，晚上还要被逼去服侍老板的亲信，烧水、冲茶，直到深

夜才能回家。后来，她被榨干了，一点气力也没有，走一步、哼一声。但她不做不行啊！丈夫死了，六个孩子死了五个，唯一的一个男孩病在床上，不能动弹。一天夜里，她回到家里，儿子病死了，在家里忙了一天。第二天清早，她拖着沉重的腿，赶来上班了。

“我是紅繩銅牌 16 号！”陈金娥很准确地报出牌号。

一个工头斜視了一下，冷冷地說：“江北老太婆，16 号銅牌收掉啦！”

陈金娥还以为自己听錯了，于是又再报一次。可是那个工头連忙搶下她手上的一本小折子，又猛地推上一把：“去！去！这里沒有你的牌子！”

陈金娥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請你照顾我这个孤老……”

老板听說江北老太婆在門口大哭大鬧，就急忙奔来。他先是嬉皮笑臉地說：“老太婆，你年紀大了，不來事啦，回去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吧！”

陈金娥哀求說：“老板，我昨天因为儿子死了，在家呆了一天。現在回家实在无依无靠啊！我是吊的 16 号紅繩銅牌，我做得动，請照顾我吧！……”

老板看到軟的不行，立即恶狠狠地說：“滾！滾！滾！老东西，这里沒你的牌子！”說着，馬上叫工头把她拖到馬路上去了。

陈金娥呼天不应，喚地不灵，越想越气，不久就吊

死了！

我們工人心頭的憤怒實在忍耐不住，反抗的怒火在胸中燃燒。一九四八年，廠里工人團結起來準備成立工會，跟資本家作鬥爭。老板聽到風聲，馬上就溜到偽社會局，勾結國民黨特工頭子陸京士，派特務打進我們工會內部來，說什麼支持我們辦工會，并把我們工會籌備會的委員代表騙去開會，我們的同志一去就被特務押起來了。在廠里的委員，也被開除了。

解放前，茂昌蛋廠老板就是這樣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我們工人。這家工廠，實際上就是一個人間地獄啊！

黑夜總有盡頭，我們工人終於見到了太陽。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蛋廠工人從政治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很快就成立了工會，工人團結起來把壓迫工人的各種廠規、罰規，一掃而光。一九五二年經過民主改革，那些一貫欺壓工人的工頭也被我們鬥倒了。一九五四年，蛋廠公私合營後，我們都成為正式工人了。我們勞動條件也有很大變化。過去肩背磨爛，現在我們平地運輸有車子，上下搬運有吊梯，照蛋、拷蛋都有輸送帶。照蛋工人都有工作服、膠鞋，冷藏工人穿上很厚的棉大衣和棉鞋。我們有了大飯廳、托兒所、保健站、休息室。生、老、病、死都有保障。這一切，我們蛋廠老工人過去做夢也想不到呀！過去我們都是站在蛋壳上過日子，飽嘗黃連苦。今天我們過的幸福生活，都是黨和

毛主席帶給我們的啊！我們一定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永遠不忘階級壓迫，永遠不忘階級鬥爭，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李玉瑩整理

“一毛不拔”的梁新記

上海塑料制品八厂党支部宣传委員 关学成

老上海几乎都熟悉：解放前有一种以“一毛不拔”四个字做广告字句的牙刷，可說风行一时。出产这种牙刷的“梁新記牙刷公司”，曾自吹为“中国的牙刷大王”。“一毛不拔”这話，用来形容梁新記的牙刷是言过其实的，但用来形容梁新記老板对职工的剝削，倒是再恰当沒有了。

为了賺錢 六亲不认

梁新記的老板是广东佛山人，梁新記的工人多数也是佛山人。这些工人是老板利用广东同乡花言巧語把他們騙来的。他騙这些同乡人說，凡是佛山梁姓兄弟，随时可以进厂做工，做滿三年以后可以回乡探亲一次，探亲期間工資照发，来回旅費也由老板負担。这些“消息”传到广东佛山，許多失业同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果然离乡背井上了他的鈎。他們被騙来上海以后，老板就六亲不认，背信弃义，半句話都沒兌現。这时，你想不做吧，人

地生疏，路費又缺，弄得來得去不得。這些同鄉人就这样成了梁新記案板上的肉，只好听凭老板的摆布了。

工人进厂后，老板根本不管他們死活。大热天，一百几十个工人挤在一个車間里，牛骨与猪毛不仅臭气冲天，而且四周都是蛆虫在爬，既悶又臭，难受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如立孔部有个工人叫楊煥章，实在受不住了，就弄来两块铁皮装在地軸上打风，一不小心，把手指削去了一段，当时痛得厉害，与厂方交涉时，老板把人命当儿戏，說：“軍隊打仗失去一条腿也沒啥希奇，你短短一段指头又算得了什么!?”就在老板的拖延下，这个工人得了破伤风，結果死掉了。严冬腊月，这一百几十个工人的車間为了保暖，門窗关得紧紧的，但牛骨头制成牙刷柄时，骨灰到处飞揚，当时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工人都得了肺病，有些人貧病交迫，就此送了命。工人王恒祥，給老板干了一輩子，后来得了肺病，老板看不中他了，就停了他的生意。另一个工人陈明水，技术較强，是从外厂挖来的，当他带出一批艺徒后，因劳累过度，生了严重的胃病，老板就叫他回乡“休养”，就此把他一脚踢开了。当时生产設備簡陋，毫无安全設施。如当时开骨工人钟以同，是一个年輕力壯的青年，有一次在开骨机上生产，由于缺乏防护設備，骨头弹出来，打伤了他的胸部，这时老板不仅不給治疗，而且要挾說不开工就要停生意，这个工人就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失常，不久就死了。

剝削成性 花样百出

梁新記老板的剝削手法又狠又毒。他在厂里雇用了一些制造牙刷柄和洗猪鬃的基本工人，至于大量穿鬃这项活儿，就分发给家庭妇女去干。据一九四〇年的统计，当时老板雇用的基本工约二百人，而所雇用的家庭妇女竟达七百人之多。这样做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一是防止工人团结起来反抗他，二是家庭妇女的劳动力特别低廉，他从中可以进行更残酷的剝削。老板对这些家庭妇女的剝削是十分惊人的。比如说，猪鬃有白有黑，混杂一起，得一根一根地分拣开来，然后还得慢慢的穿制。她们一天手脚不停地干，顶多只能穿五十枝牙刷，而老板给的工资是穿一百枝牙刷才施舍三角钱，一个月也不过拿到两块银洋。女工们在穿牙刷前，为使眼子不毛，穿起来省力些，就把牙刷柄放在肥皂水里浸一下，老板吝啬得连一块肥皂都不发，都是女工们自己掏腰包买的。许多女工为了多挣一块钱，十只手指日以继夜地穿，日子一久，手指弯曲成畸形，但有什么办法呢？还得拚命地干啊！这还不算，他发给她们的猪鬃是用水洗过而未干透的，制成牙刷后就晾干了，可是老板还要用秤称过，斤两前后相比不一样，工人就得赔钱。所以名义上每百枝三角钱，实发却都得打八折或七折。如果在百枝牙刷中，发现有一两枝穿得不够结实、整齐，还得重新返工呢！

为了进一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老板还雇用了占全厂职工五分之二童工，这些童工年龄最小的只有八岁，任其剥削和打骂。老板把童工分为两部分，男的童工规定睡在厂里，三年无工资，一个月二元月规钱，一天只供给两顿饭，但一天要做十二、三个小时工，有时还经常加班。有一次厂休息日，老板要加班，厂内又不开早饭，童工吴乃犹要求拿点冷饭吃吃，老板不同意。可是过了一会，老板却发起“慈悲”来了，说：“哪个要吃早饭的，就讲！”吴乃犹饿极了，就冲口而出地说：“我要吃！”话刚出口，老板举起右手，“啪！啪！”两记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接着老板又狠狠地训斥他们：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就是来试试你们是否诚心诚意在工作！第二天，这个童工就被老板开除了。老板对女童工的剥削更为残酷，厂里既不供给吃饭，也不准她们住宿，一个月能拿到一斗米钱的已算不错了，有的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泡几壶开水。这些女童工大多拣猪毛，有的人实在矮小，只好跪在高凳上拣。每天天朦朦亮就上工，做到顶着星星回家，终日不见太阳，还是填不饱肚子。老板根本不把这些女童工当人。七八十个童工挤在一间擗楼上，擗楼顶上遮盖一层洋铁皮，擗楼下面是间炉火熊熊的漂白间，上下“夹攻”，热得擗楼象“蒸笼”，而且这间擗楼仅有的一个通道，必须经过漂白间。有一次，漂白间因牛骨油漂进灶炉而发生大火，几十个童工走投无路，只好爬窗跳到隔壁酱园的酱缸上喊救命，跌伤了不少人。

剝削成性的梁新記老板，不但在平时吮吸工人的血汗，就是在工人斗争得来的年终分红项下，也挖空心思打剝削主意。原来规定每年在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四十作为红金，但每年分红时，老板照例要以“公积金”的名义抽掉一半，余下的二十，又要抽去一半，作为他所任用的高级职员的酬劳。最后百分之九十的职工只拿到仅仅百分之十的红金。到了这时，工人们总可以把红金拿到手了吧？不！老板还要节外生枝，发起组织什么公兴毛刷厂，诱骗工人买股票，人人做老板，买股票的錢就在红金中强行扣除。在这种情况下，誰敢“不識抬举”，敲掉“飯碗”呢？老板在发红金时，还有意一拖再拖，红金本来少得可怜，由于物价日益高涨，拖到最后更是不值什么錢了。因而到现在，档案中还留存着一包又一包工人们不愿去领取的红金。

脫毛包換 一片谎言

老板把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錢，用来大做广告欺騙顾客。他雇用了六十多个农村破产的农民，每人前后背着竹籬，竹籬的四周围着印有广告的白布，竹籬内陈列着被吹嘘为“一毛不拔”的牙刷，要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做活广告。为了吸引顾客，老板还教他们唱会自己编的卖牙刷歌，边走边唱，去吸引顾客。老板还抽出大量資金登广告、放幻灯、做路牌，他还广泛送发“优待券”，凭“优待券”

买滿十枝牙刷九折优惠。一九三四年，伪政府为了鼓吹“新生活运动”，举办了一个提灯会，梁新記老板就雇了一批大人和小孩，举着他的牙刷模型广告参加，乘机大吹大擂。这种言过其实的吹嘘，居然发生了作用，招徕了不少顾客。

梁新記老板吹嘘他的牙刷“一毛不拔”、“脫毛包換”，其实，尽是騙人的。当时別家出产的牙刷，因为穿猪鬃的弦綫常浸水潮烂，容易脫毛，寿命不长，而他在弦綫上塗上一层漆，不易受潮腐烂。就凭这一点，他就夸口說是“一毛不拔”，并規定他的牙刷价格要比同行貴好几成。事实上，用过梁新記牙刷的人，都知道这种牙刷的寿命虽长一点，但仍然逃不过脫毛的命运。至于“脫毛包換”，更是謊言，他会采取变相办法收取修理費用，根本不吃亏，同时，更可以此为招徕，欺騙更多的顾客上門。到了后来，梁新記的牙刷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小厂低价收进，改头換面，高价出售，人們不明真相，慕名“一毛不拔”和“脫毛包換”，大上其当，而老板的腰包也就逐渐膨大了。

就这样，梁新記老板从一个小商贩出身，一面依靠剝削工人，一面施展多种欺騙性的吹嘘发起家来了。到后来，他成为拥有六个牙刷厂，在上海、广州、佛山、香港、武汉、重庆等地設了十七个門市部的所謂“牙刷大王”。

解放后，工人階級翻身做了主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梁新記牙刷公司（現为上海塑料制品八厂）的职工，

都享受了劳保待遇，生、老、病、死有了保障。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陈明水，由于在旧社会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病，这几年经过治疗已恢复了健康。过去受尽老板重重剥削的近五十个老工人，现在已经光荣退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过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现在车间里都装上防护设备，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全厂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药老虎发家史

黄浦区徐重道国药号党支部书记 张文显

上海北京路上，有并六开间门面的药店——徐重道国药总号。解放前，它是旧上海国药业中数一数二的一家大药店。这家药店的老板是当时有名的一只“药老虎”。那时候，这个老板在旧上海市区开设的分店就有十七间，还开了药酒加工厂、制药厂、制胶厂、药材行等。说来也怪，象这个老板自己吹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大药店”，却是用二十几只银角子起家的。

徐重道老板靠了这二十几只角子，把药店弄得这么大，是不是象有些资本家所说的是靠“勤俭起家”的呢？不，这是骗人的鬼话。象其他资本家一样，在徐重道老板的“发家史”中，不知隐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罪恶！我从小就在徐重道药店当学徒，听到和亲眼看到这只“药老虎”怎么吃人的许许多多事实。这里，我所叙述的只不过是一些片断。

二十几只角子起家

徐重道国药店老板，是浙江慈溪人。他曾在汉口帮

他叔叔照管店务，眼看店里生意兴隆，非常羡慕，一心要走叔叔的道路。一九一五年，他便到上海来“淘金”。到上海时，他身边衣袋里只剩下二十几只角子。怎么起家呢？他说：“若要发，众人头上刮！”后来，他看准了一个好兆头：那时上海滩上，妓院成堆，很多人患花柳病。他便向熟人借了一点钱，在派克路（现在的黄河路）上租了两间房子，挂上“徐重道国药号”的招牌，专卖“妇女白带丸”、“五淋白浊丸”等等。他没有学过什么医，竟在自己的小店里，一面卖假药，一面做假郎中。

开头，店里没啥生意，他就站在店门口，看到过路人便打躬作揖，笑嘻嘻打招呼。日子一久，人头熟了。附近女佣人生了病进不起医院看病，也常到他店里来问病买药。当这些女佣人到徐重道那里来看病买药的时候，这个老板又在她们身上动脑筋，说什么把零星钱存到徐重道店里，利息大，又可靠。那些女佣人贪图利息大，见他逢人便笑，“人缘又好”，便把血汗钱三块五块存进他店里，日积月累，这笔数目倒也不小。但这个老板心里明白，在这些女佣人身上榨不出多大油水。为了招徕更多主顾，他便在假药仿单上印了十二个黑色大字：“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向买主宣扬自己为人“正直”“公道”，同时逢人夸耀自己的药店是“良心店”，徐重道是以“道德”为重，为民解除疾苦。当时有不少人被他吸引了，徐重道国药号的生意也就慢慢兴隆起来。这个老板盘剥了一些钱，不久，便在成都路开了第二间徐重道国

药店。

一九二三年春天，也就是他开第三月徐重道药店的那年，店里有个职员叫戴生茂，在新闾路上找到一月店址，向徐重道老板拉点股子，想自己开月国药店。老板说：“你有困难，我应该帮忙。”便满口答应，还假惺惺地跟了戴生茂去看地段。徐重道老板到那里一看地段好：附近弄堂多，人口多，药店少，便笑嘻嘻地拉着戴生茂，回到店里一道打牌，接着说：“你不要开店了，钱存在我这里，这月店让我去开，每月付你利息，再给你做个阿大，坐第一把椅子！哈哈，你何乐而不为呢！”戴生茂经他这么一说，便把钱给了徐重道老板。药店开起来了，戴生茂也当阿大了，可是老板不但一直不把这笔钱还给他，后来还借故把戴生茂一脚踢开！戴生茂气出了病，回到乡下，不久就死了。

徐重道老板的家，就这样发起来了。

“优待券”和木图章

一九三〇年，这个老板已在上海开了第十月徐重道国药支店了。这一年，他在北京路上开了徐重道国药总号。他在开国药总号的时候，为了欺骗顾客，不惜工本，店堂里全套红木设备，门面装饰得富丽堂皇，砌上什么“国药环球总店”、“首创发明参燕百补膏”、“养血补脑汁”、“妇女调经药”等等，来欺骗顾客。

資本家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徐重道药店一月一月开出来，这个老板整天动脑筋，打鬼算盘，来实现更大的骗局。

有一天，徐重道老板把临时工龔元华叫到房里，对他說：“从現在起，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給你一辆自行車，到外面去兜圈子。看到弄堂口、馬路上有医生招牌，你把它抄下来，几弄几号，叫什么名字，拿来給我。”从早到晚，龔元华的自行車踏遍了上海大街小巷。一个个医生的名单，出現在老板面前了，他就把医生的名字編了“一〇一”“一〇二”等等代号，叫自己的亲信采办礼物：名医送皮貨；一般医生送扇面、雪花膏；业务清淡的医生送水果糖。随礼物送去的，是一叠叠“优待券”，上面印着“誠意为病家服务，七折优待”等文句。虽然礼分輕重，但医生感到情面难却，开好药方，就順手递給病家一张“优待券”。旧社会里，中药利潤很厚，一分本錢，三分五分利潤不足为奇。当时行业中有一句話：“吃的黃連飯，穿的桂朴衣”，意思是指經營“黃連”、“玉桂”、“厚朴”等中药都是好生意，利潤大，而且常常是一种規格，可以定出几档价目，看人論价。所以“优待券”不过是用来招徠生意，欺騙病家的。

店里生意好起来，这时，老板走到切药房里，拍着切药师傅的肩，笑嘻嘻地說：“同是一根药材，你切下来分三等，两头切得小点，中間切得大点，分成等級存放。”他又叫自己的亲信去刻了“謀”“民”“众”“健”“康”五只木图

章，对职工說：“你們做生意头子要活絡点，看人头做生意。对衣着好的人，药方上敲个‘謀’字图章，药材拣中心段的大片子，药价开得大点，好敲，就多敲一点；衣着一般的敲‘民’字图章，也好敲一点錢；穷人来买药，敲‘健’‘康’图章，把坏药放进去！”

代客煎药的真相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剧增，因居住条件不好，患病的人日漸增加。这个老板灵机一动，认为这正是推销积压次药的好机会。这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电车上、报刊上、电影院里，出現了一批新式广告：“徐重道药店，首創代客煎药，随接随送，日夜服务”；“本店誠悬为病家服务，首創代客煎药，选料道地，配煎认真……”。有些人看到了这种广告，貪图方便，把药方往徐重道药店里送。徐重道老板站在店堂里，眼看着顾客把药方送进来，总是堆着笑：“你們放心好了，我們馬上就煎，煎好就送。”顾客出了門，他就叫职工把那些霉药、坏药放进药罐，还只准煎药师傅把头汁、忒汁药合煎一次，多放点水，一烧开，就倒进两只药瓶。

在抗战初期，上海設立了許多难民所。老板又动出了鬼脑筋，他向这些难民所的主持机关去游說：“我徐重道是良心店，重道不重道，只要看我这块牌子，現在国难临头，全上海难民所的药，我全部包下来，七折优惠，为难民

煎药送药。”就这样，上海玉佛寺、金司徒庙、浙江路等十多个难民所里几千个难民，配药煎药全部由徐重道办理。老板把这笔生意抓到了手以后，就对煎药师傅说：“现在店里代客煎药忙啊！分不开手。凡是难民的药，一律到夜里十点钟以后煎，反正是施舍药，救济的！”他又到店堂里对配药师傅说：“难民药方一来就是一百多张，你们来不及称，不要称了，用手抓两把算了！”深夜里，我们送药师傅把药送进难民所里，有的难民病重，等不到药送去，已离开了人间！送药师傅看到这般惨景，怎么不心痛呢？可是徐重道老板眼看煎药生意越来越好，霉药、蛀药畅销一空，发了大财，乐得心花怒放，在背里常说：“真是种田靠天，生意靠骗呵！”

挂羊头 卖狗肉

资本家利欲熏心，哪顾病家死活，生意越好，心肠越毒。有一年夏天，他看到劳动人民中暑的很多，就“发明”了一种“甜质金银花露”。当时他又在各大电影院大做广告。有些人上了他的当，都来买这种金银花露。徐重道老板站在药房间里笑眯眯地对职工说：“金银花露来不及用蒸汽水，放点冷水掺点糖精就行了！”职工不同意，要他照方配制。他却说：“你晓得什么？上海人吃噱头，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徐某就可发大财！”制造丸散膏丹，各种药品都有一定份量，可是这个老板却动了许多脑筋，

专门写成一本“徐重道罕有丸散配合簿”，上面用毛笔写上了“牛黄至宝丹”、“紫雪丹”等等药名，凡是成方中用到的麝香、羚羊角、犀角等贵重药品的份量，都被他减去一半，甚至麝香里还要掺盐卤。有一次，他的一个亲信把盐卤偷偷放进麝香里，被职工王占华看见了，当场把他抓住，经理走过来，弹着眼睛说：“是老板叫放的！”后来，老板来了，他奸笑地对合药师傅说：“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做好了，药料磨粉做丸药，神仙也难识真伪。”一次有人把一只死羚羊的角拿来卖给徐重道。一般成药用的羚羊角，是要活锯的，角上有血筋才有效用，死了的羚羊角不能合药。而老板的亲信却买下了这只死羚羊的角，把它配进丸药里去了。就是一般的成药制造，老板也不肯轻易放过。如治咳嗽的“枇杷膏”，妇女调经的“益母膏”，药和糖都有一定的比例，他却以利润为标准，如药价贵时，就多掺糖，少放药；糖价贵时，就药多糖少了。“虎骨木瓜酒”是治筋骨疼痛的药酒，有祛风活血功效。处方中有虎骨胶、木瓜、红花等十几种药品。老板说，“这酒是吃着玩的，只要饮了能醉就达到功效了。”于是他把十几种药料全部减掉，只用生黄枝子打碎泡在水里，掺入“土烧”中，加点糖精，看来颜色好，味道甜，可是治疗效果一点也没有。解放前，这个老板靠偷工减料，挂羊头，卖狗肉，不知捞进多少银洋！

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这个老板对店內职工的压榨是十分殘酷的。学徒进店前，他先笑嘻嘻地問介紹人：“人品長得好嗎？口齒伶俐嗎？出手快嗎？什麼地方人？”凡是达不到他的要求，他是不收的。职工进店以前，也要再三盤問介紹人：“上海有家屬嗎？”要是上海有家屬的，他也不要，怕他們手脚不干净，把店里的东西拿回家去。每年逢时过节，他总要辞掉二三十人，招进一批帮工。据一九四二年的統計資料，徐重道药店一百多名职工中，全部不超过三十岁，快滿三十岁的职工，名字上已經划了紅圈。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旧社会失业者很多，辞掉一批职工，招收帮工，可以在这些帮工头上打算盘。一九四七年，徐重道药店又招收了一批帮工。这些帮工进店以后，老板規定：先試用三个月，試用期滿了，正式成为帮工的，工資一律打六折。一进店門，还要填三份关书：一份“僱傭书”，一份“荐保书”，一份“守則书”。在这些关书上，規定入店后，无条件放弃訴訟权，控辯权。他还訂出了許多店規，縛住职工的手脚，一个不对，就請你滾蛋。

有个职员名叫周嘉岳，四十多岁，平时有胃痛病。有一天，他站在柜台上營業，胃病发作了，痛得实在支撐不住。为了怕老板見了要停生意，就偷偷地拉开药抽斗，拿了两顆只值一角錢的豆蔻药，放进口袋，做好生意，用开

水服下肚去。可是，給老板知道了，說：“周嘉岳，你违反店規，偷药吃，从現在起，另請高就！”周嘉岳就此被踢出店門。有个青年工人名叫张水堂，由于受尽老板折磨，得了肺病，吐血。他偷偷地請医生开了药方，拿了方子到店里配药。老板知道了，就把他一脚踢出店外。更惨的是，有个孤老头子老洪头，在徐重道第二支店做丸散师傅，无依无靠，到晚年才討了个老婆。老板知道了，說：“他討了老婆，一定要偷东西，不能再用了！”八月中秋那天，老板給了他一张卡片，上面写道：“本店无意雇佣，另請高就。”老洪头拿了这张催命符，回到家里，老婆跟他离婚了。后来他活活餓死在店門口的人行道上。

我們这些僥幸保牢飯碗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真象药店柜台上的揩布，揩来揩去尽是苦。記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职工从早到夜累死累活給老板卖命，老板給我們吃的是什么呢？他仓库里大米堆得小山高，发了霉，叫职工炒焦磨粉，制成“五香飯灰”，卖给病家。給我們吃的常常是磨着石砂的面粉六谷糊，难得吃上几頓烂飯薄粥。他还嫌我們胃口大，暗里关照飯司务：“飯要煮得稀烂，粥要烧得稀薄。”說到工資，真低得可怜，一个月的工資只能买二斗米，这样我們自己顾自己还很困难，哪里还顾得上家？如果碰到家里有人生病，那就更惨了。有个职工名叫岑秀章，他女儿生了病，因为没有錢延医买药，病死了。很多职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白天忍受着繁重的工作，一到夜里，瞞着老板到街头去做小販。狠心的老板还是常

常不发工資。他笑着說：“你們不要急，我实在沒有錢，有錢会給你們的！”

职工們恨透了老板，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上午，二十四个职工，在店楼上开了个小会，提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誰知道，刚刚坐下，老板的电话早打进了伪警察局。十点钟光景，徐重道药店被伪警察包围，伪警、流氓手持武器冲到楼上，用枪口对准职工，說：“不許动！一个个名字都写上！”这时，徐重道老板和經理也来了。老板露出猙獰的面目，指着职工說：“这是非法开会，这是搗乱！”他嘴巴一歪，伪警就把他們带到楼下店堂里，排成队，要用绳子綁起来。这时，經理走过来了，假惺惺地笑着說：“不用綁了！带走吧！”

就这样，这二十四个职工被抓进了監獄。第二天，老板串通伪警察局，逼他們每人填一张“无条件解雇书”，如果不填，就要关在牢里！这二十四个人从此失业了，掙扎在死亡綫上。

新药店 新作风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劳动人民终于熬出了头，見到了太阳。一九五二年，由于徐重道老板在解放后繼續偷工减料，危害病人，我們和他开展了斗争，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他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各項运动，徐重道药店改变了面貌，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公

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人民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国药企业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经营作风，建立了各种科学的责任制度，提高了服务质量。进药、配药、煎药、送药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真正做到了为病人负责。譬如拿煎药来说吧，各种药的煎熬时间，都有一定规定，在操作过程中，还做到药汁煎透，药渣撇干，按照病人规定时间，及时送上门；来方配药，也是同样做到尽量满足需要。如有个病人需要服用石榴树根，但这种货物，药店是不备的，为了满足病人的需要，我们店里就派出三四个职工，骑着自行车出去采购。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公园、苗圃和花鸟商店，都没有这种东西。后来，又专门派人到农村去采办，并把石榴树根送到病人家里。在药物质量上，更是精益求精，从原料到成品，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复核，尽量做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解放后，我们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有的职工当了公方经理。我们职工的生活也逐步提高，生老病死有劳保。过去不少患肺病的职工，都得到了治疗，恢复了健康。领导上对我们各方面都很关怀，店里还设立了图书站，不少工人进了业余文化学校。经过党的教育，我们职工的政治觉悟都有提高，有的同志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我也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想想过去徐重道这爿黑店，看看现在徐重道国药号新面貌，真是两个世界，两种景象。

若 芳整理

“鞋帽大王”的生意經

极尽欺騙之能事

解放前，上海鶴鳴鞋帽商店的老板楊撫生經常說：“上海有幾百萬人，只要每個人上我一次當，我的鈔票就多得莫佬佬了”。欺騙顧客，這就是他的生意經，也就是他的生財之道。老板經常吹噓自己是“鞋帽大王”，說什麼鶴鳴鞋帽商店出售的鞋子，“皮掌之厚無以復加，利潤之薄無以復減”。他吹噓、欺騙慣用的伎倆，就是不擇手段濫做廣告。鶴鳴老板在錦江飯店長期租了一個大房間，作為他的私人辦公室，專門請了一個“文人”為他設計廣告，他挖空心思、別出心裁地想出了許多騙人的花樣經。

鶴鳴老板楊撫生曾到資本主義國家留過學，他對洋老板怎樣欺騙顧客賺鈔票的“門檻”是作過專門研究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做生意是七分噱頭三分貨。”因此，他利用報紙大做廣告，是不惜工本、更是不遺余力的。當一九三六年上海金陵東路第一片鶴鳴鞋帽商店開張的時候，老板就把他仅有的資金的百分之八十用來大做廣告，以後，他又經常拿出百分之十的營業額來大肆宣傳吹噓。

这些广告真是五花八門，极尽欺騙之能事。如老板經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提倡商业道德、提高商业水准的事业家，吹嘘自己是九本一利、薄利祖师、不以賺錢为目的的。他在广告中无耻地宣传說自己是“天下第一厚皮”，还說：“有的廉貨不好，有的好貨不廉，我的又廉又好！”“材料一样的皮鞋，我們做工最牢；做工一样的皮鞋，我們材料最好。”“愿天下大头小头、大脚小脚都来归我。”“別家买不到的，我們一定有；別家买得到的，我們特別多。”当时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象这样的大幅广告几乎天天不断。鶴鳴的名声一时搞得很响，近到沪宁、沪杭铁路沿綫，远至全国其他城市，都知道这家“鞋帽大王”。

另外是請“头面”人物給他撑市面、做广告。一九三六年金陵东路第一丹鶴鳴鞋帽商店開門的时候，他請他父亲的結拜兄弟、流氓头子金廷蓀，和大流氓黄金荣在店堂里坐鎮，想借此“威风”拉生意。一九三九年開設南京东路和百乐門鶴鳴鞋帽商店的时候，他还特地請了著名“电影明星”前来剪彩揭幕。一时轰动上海，来看熱鬧的人挤得有軌电車开不过。如此一来，給他招徠了不少生意。

折扣优待、囓卖賤卖是鶴鳴老板欺騙顧客的另一种手法。如购买皮鞋一双，贈送外国人拍摄六寸照片一张。老板还規定：每逢星期折价优待，逢年过节照碼八五折出售。美其名說是为了照顾有工作的人可以买到囓貨。到年底还要贈送精美日历一只。这样一做，果然被他引来一大批顧客，店堂內經常挤得連坐立的地方都沒有。

老板还把营业员当做活广告。他在报上刊登大幅招考职员、续聘人才的骗人广告，规定大学毕业学生方可应试。上海人曾把它当作新闻奇谈，不少人都说鹤鸣派头大，人格高尚，为此来参观大学生当营业员的络绎不绝，而老板借此既出了名，抬高了身价，又多做了生意。

老板杨撫生又勾结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子开设了新声广播电台，给鹤鸣独家使用。他整天利用电台大肆吹嘘鹤鸣备货充足、式样新颖、价钱便宜。

面皮之厚无以复加

其实，全市鞋帽业都知道，鹤鸣出售的鞋子是“叫货”、“纸头鞋”，不少顾客都是吃了一次亏，再也不愿上当，说鹤鸣的鞋子是“油条鞋”“礼拜鞋”。原来，老板在进货时，只注意外表光洁，进价低廉，有钱好赚，不问质量。当时有一百多个作坊和鹤鸣有产购关系，因为鹤鸣杀价厉害，这些作坊为了有利可图，一味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大量的皮鞋都是用硬纸打衬的，穿上了之后，稍一湿水，或者多穿几天，就会走样。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老板从美国批进三万双“非礼门”皮鞋，其式样象根油条，底皮薄得比女人的绣花鞋底还薄，脚头重一点的人一穿即破。可是杨撫生还是厚颜无耻地在报纸和电台上大做广告，说“新从美国进口优质皮鞋”。后来还剩下一千多双实在卖不掉，只好当柴烧了。

美其名的大减价、特别优待也是骗人的把戏。其实，每逢实行减价的前天晚上，老板已把所有的鞋价提高一成至二成，结果顾客不仅没有买到便宜货，反而比平时还要吃亏。所谓九本一利、薄利祖师，也全是骗人的谎话。解放前鹤鸣卖出鞋子的利润在一·三三（即一块钱赚三角三分）已算是牺牲品了，绝大部分鞋子的利润都在一·四四和一·五五以上，有的竟达百分之六十。

老板压迫剥削职工的伎俩

楊撫生为了进一步压迫和剥削职工，在店内实行店长、巡视员的制度。他把每个职工编上暗号，规定店长、巡视员每天在特制的信箋上写上每个营业员的动态情况，封在特制的信封内亲自送给他。这些店长、巡视员不做工作，整天捧住小茶壶在店堂内踱来踱去，监视营业员的行动。老板还在职工中安插他的亲信，这些人也经常跑到老板家里当面汇报，所以被称为“公馆派”或“第五纵队”。老板根据这些密报，每到月底就要停掉一批人的生意。

老板为了迫使营业员为他多做生意，更多地进行剥削，采取了一种厘金制度，规定营业员做满一百元生意，才有一二元厘金。风吹、雨落做不着生意就没有厘金。一般拚死拚活地干上一个月，也只能换上四五斗米。在这种制度下，营业员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几乎每天都要

干上十六七个小时。负责管理商品的营业员在营业结束后还要做加货、整理商品的工作。练习生担任的杂务工作都在业余时间进行。那时，营业员迫于生活，想多做点生意，连喝茶、小便都不安心；饭还在嘴边，人已在店堂内接待顾客了。为了无休止地为他卖命，老板还经常拿出避倦丸要营业员吞服，这样日积月累，就严重地影响了健康。职工中患肺病、胃病和脚肿病的很多。青年职工陈兰芳原来身强力壮，由于工作繁重紧张，长期睡眠不足，进店不久就得了肺病，吐血不止。他怕因病被老板停生意，一直不敢声张。陈兰芳一边吐血一边工作，病势日益加重，狠心的老板看到在他身上再没有血好抽了，便把他赶出店门，不到两个月他就病死了。年仅二十出头的营业员范根良，他管理的女鞋部，适令商品不脱销，落令货色不积压，连老板都在背后夸他好，可是范根良被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了。这时候老板又换了一副嘴脸，他口蜜腹剑地对范根良说：“范先生，你病了，歇歇吧！”范根良就这样被老板一脚踢开了。

过去在鹤鸣当职工，大家还经常为自己年龄的增长而担忧，不少人就因为年过三十被老板认为不中用了而被停了生意。老板连营业员的穿着也是管得牢牢的。大热天太阳晒得地上直冒青烟，老板要他们穿着鹤鸣的制服，上身是雪白的衬衫紧扣黑领带，下身是厚厚的白帆布裤子。从外表上看，一个个西装革履，穿得很漂亮。可是一天做到晚，一天跑到晚，一天站到晚，繁重的劳动累得

他們背脊上的汗直流到皮鞋內，渾身上下濕透，就象從水里撈上來一樣。穿上這種制服簡直使人悶得頭髮昏，腦發脹，可老板不顧人們死活，連領帶都不准松一點，厚帆布褲子不准卷高一寸；大冷天，老板又要他們穿着黑色制服，不管刮風下雪，氣候多么寒冷，也不准穿外套，不准任何人把手插進衣袋內，更不准關上門避風，一定要把大門敞開，讓西北風呼呼地直往店堂內刮，凍得人們手指紅得象根胡蘿卜，渾身直打哆嗦。更加惡劣的是，楊撫生經常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善人，好象非常關心職工生活，每到春秋兩季，名義上是照顧他們去旅行，實際上，是叫他們穿着鶴鳴的制服，別着鶴鳴的徽章，打着鶴鳴的旗子，遠到南京、杭州，近至蘇州、無錫和上海四郊，往來招搖。老板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把人們當作活廣告，為他裝璜門面。誰要是違反了這些規定，或不稱老板的心，一到月底就要被停掉生意。因此，在職工中有句很流行的話：“月底就要到，心里別別跳，接到停職書，好比勾魂票。”

新企業新作風

解放以後，鶴鳴鞋帽商店隨着上海的改造而改造，隨着上海的進步而進步。特別是公私合營以後，企業的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它的經營思想、經營作風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上海共有五片鶴鳴鞋帽商店，家家都有附屬工場，双双鞋子的選料、制作和售價，都嚴格遵照國家的

規定，真正做到貨真價實。

職工同志，不僅做好門市工作，他們還經常攜帶着大量的鞋子到上海的四郊農村設攤，為農民兄弟服務；乘着帆船，帶着各式各樣的鞋子到遠離上海八九十里的小島設攤，為漁民服務，深得勞動人民的好評。

中共黃浦區鞋帽公司總支委員會
社列民整理

道德油厂老板的“道德”

黄浦区粮食局警卫员 周荣隆

资本家常常吹嘘他们是最讲“道德”的，这是骗人的鬼话。解放前，我在中国道德油厂做工，看到和听到道德油厂老板行的是什么“道”，讲的是什么“德”。

黑手起家

中国道德油厂老板原来是专收赃物的。当时，他勾结了码头上的恶霸、仓库看守人员以及地痞流氓、伪警等，专门搞盗窃贩卖赃物，捞了一笔钱后，在一九三二年开设第一号道德油厂。这个走江湖与流氓为伍的人，一变而成为油厂老板，他榨取工人和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十分毒辣。

道德油厂老板经常对职工说：“我开‘厂’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吃我的‘油’，而我只是吃点‘油脚’，你们要好好地给我干啊！”他用这种模糊职工阶级界限的手法，要职工为他做坏事。他差遣职工到处搜集积垢较厚的旧油箱，规定每只重量要在两斤半以上，而一般油箱都是两斤

四两，他搜集来这种积垢較厚的重油箱，充两斤四两的油箱，从中“吃皮捞油”，一轉手一箱油就被他吞掉了四两。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居民的食油非常困难，道德油厂老板认为这是他赚钞票的好机会。这个厂是經售“戶口油”的，老板連少得可怜的“戶口油”也要捞一票。他特地做了一批“吊提”代替量具，照規定一斤油的重量是十六两（老秤），道德油厂的“吊提”只有十五两二錢，这样，无形中一斤油就少給八錢。更恶劣的是，当职工在为居民拾提灌油时，他站在身边，睜着两只眼睛对职工說：“把吊提側一側、側一側。”这一側不打紧，而居民买回去的一斤油只有十四两左右了。誰要是不遵照他的話办事，事后就要找你岔子，說你对店不忠，輕則痛罵一頓，重則叫你卷鋪盖。道德油厂老板为了私吞居民的“戶口油”，轉手卖黑市赚大錢，常常故意不开店門，推迟卖油時間。有时，只卖了儿桶油，就推說卖光了，把压下的油轉手卖黑市。

老板常說：“一百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上一次当，我就可发财了。”因此，他經常弄虛作假，以次充好。如那时他店里經售一种紅香麻油，价格要三十六元一担，而一般生油只卖十五元一担，为了賺錢，老板就在一百斤麻油中掺入五十斤生油。这样紅香麻油被冲得和生油几乎一样，不能充紅香麻油卖出去。这时，老板又想出了一条坏主意：用一种紅顏料拌和在麻油內，看起来同紅香麻油一样。当时，我們对資本家这种唯利是图、損人利己的行为

非常气愤。

道德油厂老板为了扩大营业，别出心裁地“出产”了一种“道德美酒”。其实，当时老板既没有开设酒厂，又没有加工场，哪能出产什么“美酒”呢？原来老板看到搞瓶装酒卖得出价，赚头好，因此，他把买来的烧酒掺上水，贴上“道德美酒”的招牌，就算是他的产品了。

放“庄”搜刮

在旧社会里，农民身受地主的重重盘剥，他们一年劳动所得的果实，绝大部分都被地主所掠夺，即使剩下一点油料等物，也是为数不多。他们很想拿这些花生、黄豆等油料换取粮食或急需要用的钱钞。就在这时，道德油厂的老板派出他的亲信，到苏北、山东、安徽等油料产区去放“庄”，也就是设立临时采购站，杀价收购。有不少农民因为手里的豆油和花生油为数不多，如果直接拿到城市出卖，往返车费较多，不很值得，加上又急等钱用，只好忍痛低价卖给他。老板把豆油、花生油拿到上海，囤积起来，当花生、黄豆落市以后，就高价出售。他这样一翻一覆，就赚了很多钱。

老板还开了“钱庄”，专门搜刮附近的女佣人，他以一分、一分二的所谓高息，来引诱她们把每月所得的几个工钿，存到这个老板的“钱庄”里。老板拿了这些存款去做投机，赚大钱。记得有个常熟妈妈把多年辛劳积蓄的一

百块銀洋，存在道德油厂老板那里。那时，物价一日数涨，紙币贬值，最后把常熟媽媽的一百块銀洋变得只能买一包香烟。常熟媽媽拿着这一包香烟錢的“存折”，一气，撕得粉碎。而老板拿着人家的血汗錢，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賺了許多錢。

殘酷剝削

記得我們剛进店門，老板就向我們宣布了五條店規：

不准留長發；

不准穿白襯衫；

不准回家住宿；

不准穿有口袋的衣服；

不准雙手插入袖子或褲袋內。

另外還加上一條抄身制度。

從頭到腳、從里到外，把我們職工管得死死的。他連我們站櫃台做生意一雙手怎麼放都作了規定。老板規定職工的雙手要八字撐開放置在櫃台上，不准交叉在身前，也不准放在背後。

道德油廠是一座五層樓的樓房，老板把他自己的住房安在店堂的樓上。他為了監視職工，要職工無限度地為他賣命，他還在地板上開了一個大洞。這個洞直對着店堂間，老板和老板娘經常坐在大洞的旁邊，監視着職工的一言一動，稍有不稱他們的心，不是打罵就是停生意。

那时，我們从早到夜劳累一天，做得筋疲力尽，到深夜，倒下就呼呼地睡着了。但是到三四点钟，正当我們好睡的时候，老板从外面吃喝玩乐回来，到职工睡觉的地方“值差”来了。老板先跑到学徒的鋪前，气势汹汹地叫学徒起身；接着又把职工們一个一个叫醒。当他看到职工都起身到店堂里去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由于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得不到好好的休息，許多职工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很虛弱。誰要是生了病，老板就把你一脚踢开。

苦 难 生 涯

道德油厂新进一个职工，必須經過“三堂会审”以后才录取。所謂“三堂会审”，就是老板的母亲、父亲以及老板夫妻两人都要給新进人員談話、“看相”，要他們三方面都同意了，才可进店工作。

对于所謂违反了“店規”的职工，也要經過“三堂会审”才放你过門，有时还要遭到一頓毒打。

有一天清晨，刚开店門，老板接到他亲信的密告，說一个姓金的学徒拿了一块腐乳錢。老板瞪着眼睛一把揪住这个学徒的头发，不問情由，先是“啪啪啪”几个耳光，然后把这个学徒拖到一个小房間里，关上門痛打了半天，打得这个学徒鼻青眼肿、血流滿面。打了不算，还一脚把他踢出店門，連被头鋪盖也不准拿走。有个姓顾的学徒，

老板說他卖东西不收錢，将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把
这个学徒双手反吊在店堂里的帳台銅栏杆上，一面打，一面
罵，以此示众。据了解，被他毒打后赶出店門、連鋪盖不
准拿走的职工就有十多个人。

我們职工成天象牛馬般地劳动，但一个月只能拿到
两三斗麦子的工錮，后来只能买上几斤油，根本养不活老
婆和孩子，經常过着穷苦的生活。但老板袋里的錢越来
越多，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开了四升
店、两升酿造厂、三家旅館，拥有豆油三千桶（每桶三百六
十斤）。这些財富都是从工人、顾客身上刮下来的。

資本家口口声声讲什么“道德”，拆穿了，他們宣揚
“道德”，只是为了更有利于他們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
汗罢了！

杜列民整理

“黑心店”老板的“花样经”

沈大成飲食街工会主席 徐爱琪

南京路沈大成飲食店，在創辦之初不过是一家小小的粥店，可是沒有几年工夫，它就成了一家赫赫有名的点心店。

沈大成最早的老板綽号叫“粥店阿金”。他是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七年初，他看到上海商业发展，眼紅了，也想开店做生意。当时沒有本錢，他就到亲戚那里，东凑西拼，才弄到了四千个銅錢(約五斗米錢)，在湖北路大新街附近開設了一家小粥店，自做自卖，做了三年，撈到了一笔鈔票。后来他看到做糕团利潤厚，容易賺鈔票，就盘掉粥店，在汉口路上開設沈大成糕团店。做了几年后，又把店移到广西路九江路口营业。那时他的店范围不大，全店只有十四个工人，每天卖二三十块銀洋。后来“粥店阿金”死了，就由他的儿子当了老板。

这个老板虽然对本行业务并不懂，可是賺錢的“門檻”却很精。一九二四年，沈大成老板看到南京路的市面逐渐兴旺，认为发財的机会来了，就连忙通过亲戚，借了一笔錢，托人在南京路浙江路口，挖到一間七开間門面，

將沈大成搬到南京路擴大營業。一開市，生意就很好。到一九三二年，他的資本已達原有資金的三十多倍。那時，他不僅在福州路青蓮閣下面開設了一家分店，合伙開設了恒裕興酒店和一家印刷所，在虹口買進了七幢樓房，而且倉庫里還存着二千四百多斤火腿、一千六百多包面粉（每包五十斤）、二百多担大米等物資。到一九三八年，沈大成老板又買下了店堂樓上九開間樓面擴大營業，工人也由二十多個增加到八十多個，生意做得更大了。

沈大成為什麼會發展得這樣快呢？是不是象有的資本家所說：“是依靠‘小本經營，勤儉起家’”的那樣呢？不，絕對不！沈大成老板也是靠“對外騙，對內刮”、靠剝削我們勞動人民血汗發財致富的。

禮券和“點心券”

解放前，送禮通行送“禮券”。糕團店的老板，為了賺鈔票，就發放購買糕團的一種禮券。沈大成搬到南京路營業後，老板就立即發放了五元、十元、十五元、二十元、五十元等五種票面的禮券。這種禮券名義上說是為了方便顧客，買了禮券可以長期通用、優先照顧、送禮方便等，實際上，這是老板利用通貨膨脹而騙取錢財的一種手段。顧客購買這種禮券時，是按貨價付款的，但取貨時，則按貨物市價折算。由於它只作幣值不作貨，因此時間一長，隨着物價上漲，禮券的幣值就大大下降。抗日戰爭前，沈

大成发出的一张十元錢的礼券，可买一担多米，但是到后来礼券主人来取貨的时候，一张十元票面的礼券，就只值一碗肉面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顾客在当月初购买一张五元票面的礼券，可以买一百只团子，但到了下月中旬来取貨时，就只能买五只团子了。如果要按原来买券时所需要的团子，那就要重新补錢再买。沈大成这种礼券，自一九二四年开始，到解放前夕，就发放了好几万张，騙到了大批錢財。

这个老板看到发放糕团礼券有錢可撈，而大批来店堂吃面点的顾客还是現吃現付，賺錢虽多，但不穩定，心想：如果吃点心也发一种券，既可以先收进顾客一笔錢，又可以拉牢顾客生意。因此，他挖空思想出了預发“点心券”的办法。这种“点心券”規定只限在店堂吃面点。老板对顾客說：“誰买了点心券，不論什么时候来店就餐都可以优先照顾。”其实这种“点心券”和礼券基本上一样，顾客今天买了二角錢一碗的肉面券，当天不吃过几天来吃，面价涨到二角五分了，吃时又要再加五分錢。老板撈錢，真是无孔不入，在一九三八年，他还以沈大成名义叫印刷所印了一分、二分、五分的大量“代价券”用来找給顾客。当时，沈大成每天做五六百元营业，“代价券”要找出二三十元，这种“代价券”連續发了一年半时间。据估計，沈大成老板当时发出的代价券，一分头的約有三十多万张，二分头的有十七万多张，五分头的也有十多万张。发出去的这些券，顾客使用时，只能重新用到沈大成来。有

不少顧客拿去后沒有再用，這樣老板又撈到了顧客的一大筆錢。

“贈獎券”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春天，沈大成生意一度較清淡，老板為了拉生意，又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贈獎券”的辦法：規定凡是來沈大成就餐吃滿一元的，均奉送獎券一張，一月一開獎，中獎者可得巨額獎金。並在報紙上、戲院里大做廣告。為了擴大影響，他自己站在門口大吹大擂作宣傳。這樣一做，果然被他引來了大批顧客。第一個月的營業額就增加了兩倍以上；由原來每天營業不過一百多元增加到三百多元。

這種“贈獎券”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老板名義上規定，“贈獎券”的獎金分為六等：頭獎一個，獎金五百元；二獎幾個，獎金各二百元；三獎、四獎若干個，獎金五十元；五獎、六獎獎金二十元、十元或付給糕團點心。其實這也是欺騙顧客的一種辦法。在規定的六等獎金中，頭獎根本沒有，二獎只有一個，大部分都是五獎、末獎。這種“贈獎券”連續六個月，共發放了約五萬四千多張，只有一個二獎，其餘都是三、四、五、六獎。支付獎金的金額，老板早已加在點心的利潤中了。但到後來，即使得中了五獎六獎的人，老板也只發給他幾只團子。後來不少顧客發現了這個真相，就不再來上當了；有的顧客吃滿了一元，

也不再要这种骗人的“赠奖券”了。

老板眼看这个办法已经失效，又换了一个新办法：凡是吃满五元的顾客，奉送五色糕一盒。这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盒五色糕不到二两重，都是用一些零星下脚原料做的，而五色糕的成本也早已算在点心利润中了。那时，顾客吃满五元，老板就可赚两元五角。沈大成老板就是靠这种噱头来欺骗顾客的。他经常对职工说：“做生意就是靠骗。上海滩人多，一个人上我一次当，我就可以大发财了。”

店堂里的“老虎肉”

沈大成靠噱头做出牌子以后，生意更好了，老板又从点心售价上来动脑筋。当时沈大成各色点心的售价不仅比人家明高三成，而且还利用物价飞涨等条件，提高点心的售价，一碗面一天要涨几次价。一九四六年春天，南京路大新、新新、永安、先施等四大公司举行“春季大减价”，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沈大成老板看到后很高兴，他对职工说：“人家买了便宜货，一定要来吃点心，他们大减价，我们来个大涨价，做一笔好生意。”接着他就用换汤不换药的办 法抬高了各种点心售价。如早晨“鲜肉馄饨”是二千元一碗，到下午供应“鸡肉馄饨”，售价三千五百元一碗，实际上，这并不是鸡肉，而是用猪肉切碎放在水里浸一浸、捏掉血水后，当鸡肉用。到晚上，他又换了花样，

供应“虾仁餛飩”，售价四千五百元一碗。可是虾仁只有几只，大部分还是猪肉做的。

由于沈大成的点心价格飞涨，因此不少顾客都骂沈大成是一家“黑心店”，有的顾客还讽刺它说：“吃沈大成的点心，好象是吃老虎肉，价钱贵。”老板听到这些话，还厚颜无耻地对职工说：“做生意就是要这样，顾客不来是我倒楣，来，是他们倒楣。”当时，吃沈大成的点心，的确是象吃“老虎肉”，而点心的质量呢，说来真天晓得，不少点心的原料都是用的蹩脚货。刚开店时，老板为了拉生意争出名，肉面、小籠湯包等点心的原料还比较好，但到后来，沈大成一出名，生意又好，老板剥削的欲望更大了。他除了用明的涨价方法外，还用了暗的降低质量的办法进行剥削，如餛飩、大包、湯团、小籠湯包，原来都用好的腿肉，后来他总要等菜场快落市的时候，去买进那些按八折出售的变质的夹心肉、膶头肉等来当芯子用。爆鱼面的爆鱼，本来是用青鱼做的，后来都用价钱较便宜的黑鱼、白鱼、鲤鱼。有时他看到店里生意特别好，也要来个临时涨价。有一次中午，老板看到楼上楼下的店堂里都挤满了顾客，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厨房间里来，对职工说：“啊哟！不对，今天顾客多，大概是我们的点心价钱比人家贱了？人家可能已涨价了。”他马上将各色盖交面，包括柜台上糕团点心一律都上涨一成。有的顾客在就餐时，吃一碗“三鲜盖交面”只要四千元，到吃完付钞票时，已变成了四千四百元了。

秤上的“把戏”

沈大成老板还用“翘秤砣缩规格”的手段来欺骗顾客。

过去每到春节，沈大成门市出售白糖年糕和水磨年糕时，老板总是亲自上柜台，弄虚作假，欺骗顾客。有一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职工和他一起在柜台上做买卖，亲眼看到他的“门槛”：在秤货时，他用拎秤钮的右手手指在秤杆头上稍稍一揪，拿秤砣的左手又同时往上一松，这样秤杆秤砣就向上翘起来了，秤砣一翘，他乘人家还未看清时，嘴里就喊着：“鲜点！鲜点！啫……”立即将秤盘往柜台上丢，把货交给了顾客。有时他看到有些眼力好的顾客，做法又不同了。如有的顾客买十五斤年糕，他只拿十三斤半，在秤货时，就将秤砣打在十三斤的地方，这样，当他拎起秤钮时，后面的秤杆秤砣就立即会往上一翘，顾客看了很欢喜，实际上已上了他的当。老板不仅自己这样做，还经常做给职工看，要我们学会这个“门槛”。

秤上骗顾客不算，他还要缩小糕点的规格。如在逢时逢节，购买各色糕团的人多，他就立即把糕团规格缩小，比如重阳节供应的重阳糕规格是二两重一块，他看到买糕的人多，就以原来做二块的料改做三块出售。那时，每逢他上柜台时，五百块糕往往可以卖五百五十块糕的钞票。为此事，他平时还经常教训我们职工说：“象你们

这样呆板地做生意，只好餓肚皮。看我立山头(柜台)，同样这点貨色，卖的鈔票就比你們多。”

剝削职工的花样

这个老板对我们职工的剝削是很殘酷的。过去我們飲食店职工的收入，全靠小賬。老板虽然做一天营业可以賺不少錢，但是他对我們职工应得的一点小賬也不肯放过。沈大成在南京路开始营业后，我們二十几个职工一共只占三十七份拆賬，而老板不仅自己占了两份，还以老板娘、老板丈人、老板家里娘姨等名义占去了近十份。同时，店里用的茶叶、毛巾、肥皂等东西，他也要在拆賬中拿出錢来购买。在一九三八年初，沈大成老板在浙江路宁波路渭水坊八号借了一幢楼房，他自己一家住了三間，有两間作了商店的工場，职工只占用了一間不到的地方，但老板却以职工宿舍为名，房租要职工付，硬在小賬总额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作为支付房租費。名义上小賬都是职工的，实际上被老板占去了一半。沈大成过去每天以供应糕团点心为主，糕团点心的营业额占整个营业额的百分之四十，但老板規定出售糕团点心的营业额中，不准加提小賬。这样他就可从职工身上多榨取血汗。在物价飞涨的时候，老板把职工一天三拆的小賬改为五天一拆，使职工收入更加减少。一九三七年七月前，我們职工的小賬是一天三拆(早、中、夜)。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

老板看到物价不断上涨，就以多进货为名，将一天三拆的小账改为五天一拆。他拿了我们的钱去做投机买卖，自己发财，我们职工倒楣。后来，我们曾经算过一笔账，原来一天三拆所拿的五天小账可以购买四、五个大头（银元），改为五天一拆后，五天的小账就只好买一个大头了。

老板剥削我们职工的花样真多。在抗日战争前，他曾明确规定每一个老师傅每月发固定工资六元，学徒二元。抗战开始后，他借口企业困难，一连八年未发工资。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经过职工多次要求才恢复。当时因考虑到物价不断上涨，钞票不值钱，同老板协商后，确定我们职工每月的固定工资为三碗牛肉面（每碗三千五百元）。头几个月，老板算是照这个办法做了。可是到后来，他又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剥削我们的新花样：碰到发薪的时候，他就来个肉面跌价，工资发好后，肉面马上又涨价。如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肉面从四千五百元一碗涨到五千元，可是一到十六日上午发工资时，在开门营业前，老板就通知说：“今天肉面跌价，四千元一碗。”一到工资发好，下午三时点心开市前，他又马上把肉面恢复到原来的老价钱。

牛馬似的生活

那时，职工一天要做十七八个小时，学徒更是劳累得要命，每天从早晨四时天不亮起床，一直要做到深更半夜

才能睡觉。第二天早晨准时起来，如果迟到几分钟起身，老板就要给你处罚。记得在一九三九年底的一天，有个学徒叫沈裕根，因店里生意好，他直忙到深夜一点多钟以后才睡觉，到早晨四点钟的时候，正是好睡的辰光，老板看他还没有起床，就用脚踢他的头，并气势汹汹地骂道：“小赤佬，你不想做啦！”

过去有些不了解饮食店职工生活情况的人，看到我们职工天天与雪白的大米、面粉打交道，生产各色糕团面点，总认为我们饮食店的职工比人家吃得好，油水足。其实真是冤枉。那时，老板一天三餐都是大鱼大肉白米饭，而我们职工吃的是“回笼汤”（顾客吃剩的菜汤）。在一九四〇年以后，老板看到市面上粮食供应比较少，就以大米要做生意为名，规定职工不准吃店里一粒米。当时我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只好照他的规定做，因此大家每天吃的都是苞谷粉、南瓜片、隔夜多余的断头烂面等东西。但老板家里一天三餐仍是大鱼大肉大米饭，而且还将大批白米藏在自己箱子里，让它发霉变质。

老板还经常想出各种理由开除职工。过去点心店一到夏天，生意较清淡，老板为了减轻开支，便想出一个花样：动员职工还乡歇夏，过了夏天再来上海。因此，不少家在乡下的职工都回乡过夏。有时，他也借这个机会开除职工。如有个职工叫蒋桂保，原是糕团师傅，在一九四三年夏天，曾回家种了几个月田。老板因他年纪已五十开外，当他在回店的时候，就和他說：“现在生意清，你还

是蹲在乡下种种田吧。”当时，蔣桂保再三托人向他央求无效，只好背了鋪盖回家乡。有时职工刚回乡过夏不久，沈大成老板就写信去，通知职工不要再来上班。他用这种办法，停了不少职工的生意。有的职工因体弱多病，老板就逼他们离店。职工张宝仁在沈大成开店时就当糕团师傅，在沈大成已经做了几十年。由于他平时劳累过度，身体虚弱。老板看看他身上的“油水”榨干了，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就把他一脚踢出了店門，甚至连回家盘川也一点不给，最后还是由职工帮他解决了回乡的车费。有一个厨师叫薛三宝，在一九四〇年时，因积劳成疾，气喘病发作了，一天下午突然死在店堂里。老板看到后，不肯出钱收殮。后来，还是由我们职工凑了一笔钱把他收殮了。那时，我们工人在资本家眼里还不如一条狗啊！

今日的沈大成

解放以后，我们沈大成飲食店在各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五反”运动中，我们对老板的违法行为开展了斗争，对老板的一套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也作了清算。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在党的领导下，企业出现了不少新气象。

解放以后，我们沈大成职工彻底翻了身，当了企业的主人。职工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生病不仅无钱医治，还要耽心停生意；现在生、老、病、死都有了劳保。职

工政治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有的职工已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看现在新社会的店员生活，回忆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日子，该爱什么，该恨什么，我们心里就更加明白了。

周三金整理

一幢大楼的变迁

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唐家俊

上海市最繁荣的南京路西藏路口，有一座用米黄色瓷砖砌起来的巍峨大厦，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近十万甚至二三十万顾客，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

这座大楼的前身是上海大新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过去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正如解放前所有的旧企业一样，大新公司也有着一段残酷的剥削史。我在这个大楼里工作了二十六年，对新旧社会不同遭遇有着深刻的体会。据我所知：大新公司老板蔡昌原来是广东中山县上柵乡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的哥哥蔡亨在澳洲悉尼开一爿水果店。后来他哥哥回到香港，与人合股投资开办了先施公司，于是蔡昌仗着他哥哥的势力，当上一名高级职员。他凭着一张油滑的嘴皮，到处进行欺骗，奉承拍马，不久串搭上了一个姓卢的华侨，为他投资在香港开了一爿小百货商店。为了达到更大的欲望，他施展一套骗人本领，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办了香港大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广州分行。后来，他又在上海开设了规模更大的

大新公司。这时，蔡昌便成了港、粤、沪三家大新公司的总监督，他的亲属也当上了经理、副经理和司库（管钱的）。

大新公司为什么能够一家又一家地开起来，蔡昌又是怎样变成大富翁的呢？蔡昌和他的后代经常对人說，他們也是“苦出身”，靠“勤儉”起家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首先是靠他一套騙人的伎俩，是剝削起家的。三家公司的開設，都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广招股本。他揚言凡是入股的都可以得到八厘的年息，比存銀行利息高，同时还可得到职位，投資越大，职位越高。当时很多人不信任銀行，认为公司比較牢靠，而且还可找到职业，这样，有些人就被迷惑了，特别是华侨上当的很多。一九三六年，有位华侨刚从国外回到广州，因受蔡昌之騙，加入了港币七千元的股份。公司开幕后，派他当了一名挂名部长，每月二十五元工資。到了年終，他根本没有拿到絲毫的股息。等这位华侨发觉，已知大上其当，他想如把加入的股金放在銀行里，所得的利息比工資还要多。因而想把股票在市場出售，但料不到蔡昌竟施出一套毒辣手段，禁止大新公司股票在市場上流通，同时又暗中在市場外压低股票价格收进。这位华侨左等右等，大新公司“暗盘”股票价格还是有降无增，于是一气之下，将全部股票平均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票面值在市場外出售，当然这些股票就全部落在蔡昌的手里。

蔡昌为了发财，他每次利用从香港到上海、广州的机

会，都在贴身的衣袋或行李皮箱里夹带许多手表、金笔等贵重商品进行走私活动。蔡昌更有一个厉害的致富手法，就是用别人的名义向国外订货，货到后即转卖给公司换取现金。这样，每从外国订来一批货，即赚到一笔很大的利润。大新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董事会主持的。为了控制董事会，蔡昌用了蔡记、蔡堂等许多化名，还将儿子、女儿、女婿、媳妇、孙子等作为股东，这样使股份有限公司变为蔡家的天下，以便独揽整个公司的行政大权。

蔡昌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经营的商品以“环球”百货作为号召，在全部商品中外国货占总商品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一粒纽扣、一把扫帚都是进口货。他不惜在广告牌、包装纸上大做广告。他还将质量较好的国产商品标上英国狄克逊和沙利文工厂的招牌，以求达到高额利润。还有一种“鱼目混珠”的欺骗顾客的方法，将一些好销、质量好的商品和大量滞销、质量差的商品堆在一处，大吹大擂进行宣传介绍，来使顾客上当。再有一种就是用“大特价”的方法。过去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不断进行明争暗斗，三大公司经常以大减价来号召。独大新公司资本家标新立异，经常运用周年纪念的方式，向顾客宣传大特价，大摸彩。所谓特价商品都是一些陈年宿货，摸彩也不过是骗取顾客多买商品，实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新公司还设立“礼券”部，即用现金购买礼券作为礼品送人，礼券随时可作现金购买需要的商品，不受时间限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获利的方法，因为顾客来买礼券，公

司等于已出售了商品，可以充实流动资金，特别在敌伪时期币值猛降，经过十天半月，原来的购买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

大新公司之所以发展得这样快，最大的因素是残酷地剥削职工。他们为了控制和剥削、压迫职工，依靠他们的“皇亲国戚”，以及从香港、广州调来的一批爪牙，进行监视。蔡家培养亲信的手法是很“巧妙”的，如用送“干股”来笼络他们。所谓“干股”就是名义上是股东，实际股权仍在蔡家手里，只是多得一些红利而已。蔡家依靠这些亲信，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控制职工。

蔡家剥削的手段十分“高明”。上海大新公司职工最多时近八百人。当时做一个营业员最高的工资是十八元，最低是六元，而几个经理和代理人的收入足足抵上全体职工的工资总额。资本家还大量雇用女职工，因为当时女职工的劳动力便宜，并可作“花瓶”来吸引顾客。为了进行更大的剥削，还雇用相当多的练习生。提起练习生，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入大新公司当练习生的，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三元钱。有一年冬天，我只穿着仅有的一件破棉衣，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大公司里是会被停掉生意的。于是，我父亲不得已，只好将仅存的一条旧毯子典当了，给我做了一件布罩衫去上班。没想到有了长衫还不行，还得交钱做制服。在物价高涨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每餐都用杂粮充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妹妹和弟弟生了病没有钱就医，就白白地死

去了。

蔡家的剝削真是无孔不入的。每个男职工初进商店，都要做一套冬天呢制服，一双黑皮鞋；女职工則要做旗袍。夏季还有夏季制服，制服錢在工資里分三个月扣还。练习生由于工資少，为了做制服，进公司先得交上十元錢制服費，而且练习生的褲子是不做袋的，为的怕他們偷窃商品。特別殘酷的手法是为了騙取职工血汗錢，要职工参加公司儲蓄，說什么每年可以双倍归还，还有利息，儲蓄款每月在工資中扣百分之十。当时职工怎知道由于币制不断贬值，无形中就被老板吞吃了所有存款。

由于老板的种种剝削，大多数职工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特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更无法維持生活。有些职工除了在公司劳动以外，不得不找些其他工作来弥补家庭生活。职工蔡桂森，一家六口，工資收入連粥也喝不上，逼得他每天大清早四点钟去漕河涇背米到市区来卖，再到公司工作。日积月累，他身体支持不下去，結果积劳死了。

职工們最怕老和病。老职工楊作輝，从香港大新公司到上海大新公司，为老板服务了三十多年，到老的时候，資本家罵他又聾又瞎，說他老不死，他病了也不給錢医治。他死的时候，連一条衬褲也是破破烂烂的。

公司里的女职工，資本家是当作“花瓶”来使用的。老板强迫女职工装着笑脸接待那些所謂“闊佬”，如果侍候得不周到，就可能受到侮辱。有一次，文具柜有位女职工

正在接待顾客，一位“闊佬”来了，沒有专门接待他，就认为看不起他，竟拔出手枪，“啪！”的一下放在柜台上，吓得这位女职工哭叫起来。最后，不仅要她赔礼，而且还受到资本家的責罵。在女职工中，最怕怀孕，因为如果被资本家发现，是会被停生意的。因此女职工万一怀了孕，为了防止资本家发觉，只好用布带把肚皮束得紧紧的，結果造成有的流产，有的孩子生下来发育不健全。如女职工梁桂芳，有一次生了孩子，只好谎称生病請几天假，等到小孩吃奶时叫家人抱到公司厕所去，自己装作去小便，偷偷地急忙給孩子喂上几口奶，还心惊肉跳地怕給资本家狗腿子看到后被停生意。

职工在进公司当店員、练习生时，必須有他們认为“可靠”的介紹人和店鋪作保，本人还要填写一张保证书，保证绝对服从公司的一切規章，不得有任何意見和违背。而且，如有损坏财产和商品，要負全部賠償責任。如果生病或失去劳动条件等，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对于住在宿舍里的职工在假日或晚上外出，都要写明原因、地点及回来時間。另方面，资本家还在职工中制造等級，如地下室廉价部的职工比鋪面、楼上的职工工資少。他們以工資等級划分高、中、低級職員，有意使职工之間造成隔閡。

有剝削就有反抗，公司里的职工无不对资本家恨之入骨。蔡昌不仅殘酷剝削职工，而且还大力鎮压职工。他在广州时，就曾勾結帝国主义的商团来鎮压过当时大革命时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三九年底，上海大新公司全

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曾經与其他几个大公司职工举行了一次大罢工。由于当时处在英帝国主义“租界”势力范围内，蔡昌等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和巡捕房镇压职工，结果不仅开除了工人领袖和大批积极分子，资本家竟然在一个月內陆续开除了一百多名职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仇恨的种子却埋在每个职工的心里。

抗日战争胜利了，公司全体职工总认为生活可以过得好些了，怎知道前門走了虎，后門来了狼，物价还是一天数涨，生活更不好过，我們店員連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沒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党的领导下，一場有組織的向资本家进行改善生活、增加工資的斗争展开了，逐渐发展成六大公司三千多职工轰轰烈烈的联合大怠工。大怠工連續进行了五天，虽然资本家施尽了軟硬兼施的花招，并勾结伪警察局和社会局采取恐吓和伪善的手段，但由于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識破和粉碎了他們的阴谋詭計，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以后，我們又进行了争取民主的斗争；“爱用国貨，抵制美貨”的斗争；在蔣家王朝全面崩潰、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我們又組織了工人糾察队，进行护店斗争，直到解放。

現在这幢大楼获得了新生，成为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我們所經營的近五万种商品，几乎全部是祖国的产品，而不是吸取我們血汗的洋百貨。我們的服务对象是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过去的所謂“士

紳”“闊佬”了。

随着企业性质的改变，人的地位也起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我們这些被人称作“柜台獅子”的店員，現在成了企业的当家人了。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我們的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很多同志被提升到领导崗位上来，参加企业管理工作。

至于生活方面的变化，同样是很大的。現在我們商店里，有一百四十多位老年职工退休，欢度幸福的晚年。随着祖国經濟建設的发展，我和全市工人兄弟一样，生活不断提高，我的弟妹有的成了机关干部，有的成了工人，我的父亲虽然年老也成了里弄干部，我的孩子也幸福地成长。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时时对比大新公司和現在第一百貨商店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会增强我的斗志和信心，也使我更加热爱党，热爱新社会。我要牢記党的話，按党的指示办事，更好地为生产为消費者服务，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貢獻一分力量。

柜台生活四十一年

上海大昌祥綢布商店老營業員 曹杏声

我今年已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从到上海小东門大昌協記綢布商店学生意开始，一九三九年大昌協記綢布商店盘給南京路上的大昌祥，我也跟了过来，一直到現在。屈指算来，不觉已度过了四十一年柜台生活。可是，在那旧社会的二十六年柜台生活中，它包含着多少憤怒的往事！多少痛苦的回忆！

学徒受苦做奴仆 先生传艺哄嘴騙

十六岁那年，有个远亲跑到我家里来，說給我找到工作了。临行时，他以长辈的口吻对我說：“杏声啊！学生意可不比在家里，万事要忍气吞声，至少得做三年的奴仆呀！”我当时不懂什么奴仆不奴仆，只知道有了工作，可以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到了上海。一进大昌協記綢布商店，老板側着脑袋，用凶利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大概看到我身体还結实，就把手一

揮，算是录用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奴仆的生活。每天天沒亮就要起床，倒痰盂，泡水，扫地，揩桌椅，揩櫥窗，下門板……；晚上关門后，我們当学徒的更忙了，要理紙头，做票签，倒水烟筒，忙得热天手指經常磨起泡，冬天十个指头冻得皮开肉綻，鮮血淋淋，但是你还得不停地做。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等休息下来，已是深夜十一、二点了。那时，学徒是不能住宿舍的，只好睡在店堂里。晚上搬出鋪盖，往地上一攤，一夜就算过了。冷天，西北风从門縫里呼呼地钻进来，直往被窩里吹，冷得你嗦嗦发抖；大热天，地上的热气向上蒸，热得你汗流如注人发昏。加之門外車馬声响个不絕，門里麻将声噼噼啪啦，被窩里臭虫很多，睡觉真好比活受罪。等你刚刚合上眼睛，門外一声高喊，倒馬桶的来了。我們把它当作起床的号声。这时如果不起来，被老板看見，会把你一脚踢出店堂，叫你滾蛋。就这样，我苦苦地熬过了三年的奴仆生活，滿以为这下子可以为家庭挑些担子了，不料老板找我去談話，賊头狗脑地說：“小家伙，这三年表現還不錯呀，現在給你拜先生了。”“呀！”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老板已經說得很清楚了，要我拜协理殷某为师。于是我就重新再学生意，又开始了新的奴仆生活。那天，“先生”对我第一次談話。他手里捧着一只水烟筒，阴阳怪气地說：“杏声，你要学会做生意的‘門檻’嗎？”我說：“要！”他又說：“你要学会做生意的‘門檻’，必須牢記三个字——哄、噱、騙。”我想：我出門来学生意，难道就是来学这一些“門檻”嗎？

但是我在店堂里看到的，确是事实，每一笔生意，都必须以这三个字为准则，如果啥人违反了这三个字，就有被停生意的危险。那时虚伪的号召可多哩，什么足尺加一，其实这好比变戏法，手里抖一抖，顾客买到的比不加还要吃亏；什么买一送一，其实“送一”的钞票早已加在“买一”的料子上了；什么贱卖，大拍卖，吹吹打打大喇叭，其实顾客买到的真是贵上加贵。我是个老实人。有时我做一些老实事，竟然会闯祸。有一次，一位顾客在我手里买一件毛葛马褂的料子，我替顾客精打细算节省了一寸料子，被老板看见了，在一次经理训话会上，点到了我的名字，说我不会做生意。他说：“做一个伙计，应该是拳头打出外，手板弯进里，对顾客越浪费越好，对店里越节省越好，这是我们的‘生财之道’，希全体同仁切记之。”按照过去的常规，这种点名是停生意的预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挽了好多人去向老板说情，才勉强保住了饭碗。但是，我亲眼看到有些职工因为不愿干这种哄骗的勾当，而被老板开除了。如有一次，一位顾客到店里来买白府绸，零售价每尺七角，那位顾客要买一匹，按照规定，买一匹是可以打折扣的，但是老板却暗示接待那位顾客的职工吴某以每尺八角出手。吴觉得这样做不好，就问老板：“为什么批发价反而要加一角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被老板停了生意。

老板利上滚利 职工雪上加霜

天下烏鴉一般黑，老板都是一票貨色。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一九三八年，大昌協記綢布商店逃難逃到“英租界”的南京路上來，第二年，以六萬五千元盤掉了。新老板姓曹，是個鴉片鬼，矮個子，瘦長臉，為人陰險，詭計多端。他一上任，就把大昌協記綢布商店留下來的一些老年職工都停掉了。當時有個叫江嘉生的老年職工，因為家里的生活全靠他，苦苦哀求要留下來，可是曹老板却把臉一沉說：“你也不算算你的年紀！”江嘉生回到蘇州鄉下，生活無着，整天悶悶不樂，終於餓死了。我當時正是壯年，被留了下來。大昌祥一開門，就顯出了曹老板的“能干”。他來個“關店大拍賣”，店堂里貼着五光十色的紅綠告示，各種料子來一個徹底的改頭換面，哄嚇騙的手段層出不窮。每天要營業十六七個小時，中間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這樣一連三個月，每個職工累得身上輕了三、四斤，可是連工資都沒拿到，只拿了少得可憐的厘金；而老板一轉手竟賺進了四萬元。

在舊社會，高利貸剝削有印子錢、皮球錢利上滾利的算法，而曹老板對職工的工資，卻來個扣上加扣的復扣制度。請假工資全部照扣，續假一天扣二天，續假再過期一天要扣五天。這樣不算，還有月度復扣和年度復扣。如一個月工資三十元，請假十天扣去十元，還有二十元再按

三十天計算，每天六角六分，再扣去十天，这月实际到手只有十三元多一些。到了年終，再按三百六十五天計算，进行年度复扣。我是难得請一次假的，有一年生了病，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請了两天假。按照曹老板的复扣制度，这里扣那里扣，到年底一算，竟被扣去半个月的工資。那时，店里有一个职工，請假回安徽乡下去，当时因交通时常受阻，无法按期赶回，他心里一急，就生起病来。在家一共耽了半年多，后来回店，狠心的曹老板竟扣了他五百多天工資，說这还是照顾他的。于是他只得把家庭生活置于不顾，給资本家白做了一年半。曹老板这种毒辣的工資复扣制度，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我有一个相处二十五年的知心老同事，名叫叶燧生，是大昌祥的“开門元老”。他熟悉业务，为老板卖了一辈子的命，后来得了便秘病，无錢去看病，請假休养吧，又怕复扣工資，于是他暗地里捉了几只紅头蒼蝇当泻药吃。蒼蝇下肚，大便是通了，可身体更坏了，变成了黄疸病，面孔象黄蜡一样，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可是他还是搖搖晃晃地站在店堂里。职工兄弟看到这情况，便把他送了回去。到了家里不久，我的好友就两脚一伸咽气了。

曹老板对职工的剝削是不会滿足的。他訂出了这种毒辣的工資复扣制度以后，还觉得太便宜了职工，因此又来了个緩发工資。每月原定十号发工資，他总要拖到十五、六号才发，而且每次发工資都要曹老板签字才好拿。一九四八年有一个月，大家都等着拿工資，曹老板却带着

太太到杭州游玩去了。等他玩罢回来，已是二十六号了。全店一百多个职工家属的肚子饿得哇哇叫，可是他却慢条斯理地说：“急什么，工资又不会少你们的。”可是，这时发出的工资，已不值原来的一半了。最低的工资一个月只值一双呢子的鞋面料。我们棉布行业的工资都是固定工资加厘金制。按照规定，厘金应在下月初发，而曹老板总是要拖到十五、六号。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物价连日狂涨，当时我算过一笔账，每天所得厘金如果当天给我，生活还可以勉强过得去。但是曹老板却拖到下月十五号发出来，这样，一月的厘金成了一天的厘金，我拿到了这些钱，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有什么办法呢？旧社会有苦是不能叹苦的，如果叹叹苦，被老板知道了，他会说：“你嫌这里苦吗？那就另请高就吧。”被保人知道了，会说你没出息，要退保。旧社会哪有我们店员的生存权利呢？我每月拿到几斗米的工资，怎么能够养活一家五口人呢？我把家里的东西卖得连箱子底也翻过来了。有一次，苏州家乡来了一位姓张的亲戚，要我陪他到乌鲁木齐路去。吃了饭回来时，亲戚没有带钱，但是我袋中也没有分文，坐电车被卖票的赶了下来。那时，家里把米当茶叶一样，在清水里撒一些，一天三餐喝着薄粥汤。我的一个最小的孩子苦苦地对他娘说：“妈妈，等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吃一餐饭好吗？”天真的孩子的这一句话，说得我与他妈相对流泪了。

柜前有虎后有狼 条条店規套頸項

“店堂好比虎狼窩，前有老虎后有狼外婆”，这是老店員的經驗談，当时的情况确是这样。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店堂里来了三个国民党軍官，老年职工虞乾欽因为没有立即上前招呼，为首的那个三角眼的軍官，用右手把烏龟壳似的硬帽子向脑后一推，捋起袖管，伸出巴掌噼噼啪啪地朝虞乾欽的脸上打来。打罢以后，他还拍拍胸脯冷笑說：“哼，张开眼睛瞧瞧，老子是什么样的人！”虞乾欽只觉得眼前火星直冒，脸上被打得紅一块紫一块，两眼露出憤怒的目光，逼視着那个丘八，但就是沒敢頂嘴。因为这是有先例的，一九四四年，职工张建华頂撞了那些丘八，在端午节的时候，被老板停了生意；同业中的中华綢布商店职工李关庆，因为被顾客打耳光，他不服打，立即被老板停了生意。当时我自己編了首順口溜：“伙計一年做到头，只好天天低着头，你要稍微抬起头，就要打痛額角头，老板曉得吃排头，弄得不好卷被头。”

柜前是这样，那么柜后呢？曹老板为了殘酷剝削职工，还訂出了一百二十条店規。他把这店規写在紙上，配了个大鏡框，挂在二楼扶梯口。我們一早起来，先要看一看这只鏡框。每个职工都得照章办事，稍有违犯，輕則罰款、記过，重則解雇、开除。所以我們都把它叫套在职工頸上的一百二十条繩索。其实，曹老板套在我們职工頸

上的绳索决不止一百二十条，他随时都可以找你麻烦。早上起来吃早饭，就碰到了限制吃饭的店规。曹老板公开贴出布告，每人每餐限吃两碗，而且都是小碗。开头是每日两干一稀，后来中、晚两餐要干稀各一碗对搭，而且吃的都是霉米。吃罢早饭上厕所，又碰到了上厕所的店规。店里有一百多个人，可是楼下没有厕所。老板为了监督职工上厕所的时间，把马桶放到三层楼，规定草纸只准用一张，腹泻也不例外。在二楼扶梯口，老板设了一个检查大便的卡子（关口），派专人坐在那里，记录每人大便的时间及发放草纸的数字。如果违反制度，那又得罚款。曹老板对“大便账”是查得很勤的，如果发现大便的人次与所用的草纸不符，就要追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他还把每个人的大便时间总和起来，再加上每个人出外买东西、理发洗澡等时间，在年底算总账扣你的工资。平时大便好，你要立即去签到，如果忘了签到或过了时间，又要罚款；接着就有人来检查每人胸前配戴的、写着大昌祥店名并编有号码的证章，如果查到有人没有戴，轻的罚款，重的停生意。如有一个姓汪的青年职工，那天早上因为换了一件衣服，忘了戴证章，当场就被老板停了生意。职工如果不慎打碎了饭碗，当你还没来得及拾起碎片时，老板已派人来向你讨赔款了，弄得不好还会被停生意。如有一次，茶房陈阿康在擦玻璃杯时，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就买了一只赔给店里，可是曹老板却对他说：“你手脚大，我养不起你，你还是回家去享福吧。”就这样他被停了生

意。后来陈阿康的老婆一再求情，都被曹老板赶了出去。为了今后的生活，他老婆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备了厚礼再来说情，老板才勉强答应留下来。

关门以后，老板还有一个门禁制度。每天晚上十时落锁，逢五逢十放宽到十一时，不管你家在上海或外地都是一样。如果你有事外出回来，超过一分钟也要关在门外或被停生意。职工范剑虹有事外出，回来时见离门禁的时间没有多久了，立即打一个电话来请假，刚好那天曹老板从鸦片窝回来，他亲自接了电话，说：“你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你要玩可以玩个痛快。”范剑虹一听，心里着了慌，不管袋里有没有钱，立即坐了出租汽车赶回来。车子开到门口，刚好十点钟。这时，大门已被那把无情的大锁“咔嚓”一声锁上了。范剑虹在门外打着门，声嘶力竭地高喊：“开开门，请开开门呀！”我们在里面听着，心也碎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答应。就这样，范剑虹被停了生意。有一次，店里一个老司务因为亲戚家有要事叫他去，他想了一个办法，把棉衣等物垫在被褥下面，使被褥隆起，并在床边放了一双自己平时穿的鞋子，伪装睡着。这样，晚上查铺时是被混过去了，可是早上却出毛病了。他原想后门一开，买一根油条进来，使人家相信他是去买粥菜的。可是，当他拎着油条走近后门的时候，后门的大锁还没有打开，却被老板的狗腿子发觉了，并报告了曹老板。于是曹老板就大喝一声：“给我滚！”又叫人把这个老司务的行李铺盖甩了出去。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曹老板

找查夜的談了話，要他以後在查鋪時在每個人的身上敲一敲，說是“要看看是活人還是死人”。象這樣因為違反無理的門禁制度而被開除的職工，不下五、六個人。

覺醒起來作鬥爭 掙脫枷鎖獲新生

曹老板對我們職工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使我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職工群眾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四八年，物價飛漲，曹老板大量進貨，囤積居奇，採取“不賣主義”。我們就來個針鋒相對的鬥爭，進行勤工運動，從早上開門到深夜都做生意。這一來，可觸到了曹老板的痛處。他暴跳如雷，只得去請后台老板。巡捕房裏來了一批全副武裝的警察，為首的一個還凶相畢露地亮出手槍，槍口對準我們職工，厲聲地說：“你們再不停止行動，我要開槍了。”他的話音剛落，人群中竄出一個人來，原來是老年職工虞乾欽。他一拍胸脯對着那個壞蛋說：“你有‘種’先開我一槍！”“你敢！”“你敢！”群眾的吼聲如排山倒海，吓得那個壞蛋倒退了几步，差一點把手槍掉下來。在我們團結一致的鬥爭下，他夾着尾巴溜跑了。反動派為了挽回面子，就來了最後一着，要抓我們的代表。我說：“要去大家一起去。”我們跟着代表一起到了偽警察局。曹老板勾結反動派，對我們代表使用種種威吓手段。我們始終團結一致，堅持鬥爭。反動派對我們沒法，只得把代表和我們一起釋放了。釋放以後，我們繼續

不断地坚持斗争，一直到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又一次斗争开始了。全体职工在店堂里举行控诉会。控诉资本家对店员的剥削与压迫。曹老板避而不见，他悄悄地溜到大东旅馆开了个房间，叫一个狗腿子在店里探听消息，随时向他密报；曹老板听到我们竟然在“他”的店堂里控诉起他的罪行来，立即吩咐狗腿子打电话给公安局，诬告有暴徒捣乱营业部。

正当我们愤怒的控诉会在进行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个公安人员。会场顿时轰动起来。公安人员看到“废除苛刻的一百二十条店规！”等标语和漫画，立即笑嘻嘻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乱，大家坐好。”两人边说边做着手势，然后向会场主持人问清了情况。一个公安人员上台讲话：“同志们，你们不要害怕，现在解放了，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公安局也是人民自己的公安局，我们不但不会抓你们，而且要保护你们，因为你们的斗争是正确的，祝你们斗争胜利！”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会场里的凯歌声，早已通过狗腿子传到了曹老板的耳里。这个一向欺压职工的曹老板，此时也泄了气，他懒洋洋地拿起电话听筒……。不一会，会场主持人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刚才资本家打电话来，答应废除一百二十条店规，其他的要求也同意协商。”会场上再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也兴高采烈，两眼流出了激动的泪

花，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老店員苦尽甜来 光荣花戴上胸怀

解放以后，店員真是翻身了，再不受老板的压迫和剥削了。我们的生活真正得到了改善，不久又实行了劳保。最使我感动的是，五年以前与我同事二十五年的老店員虞乾欽同志退休了。领导亲自送来喜报，向他握手道贺，祝贺他为商业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把他送上火车。现在，虞乾欽同志享受劳保工资，在西安兴平与他的老伴、女儿一道，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看到今天虞乾欽同志幸福的晚年，不由使我想起同样与我同事二十五年的叶燧生的悲惨遭遇来。新社会与旧社会，竟有这样的天壤之别，这怎么不叫我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呢！我现在虽然越来越老了，可是工作的劲头却是越来越足了。一九五五年，我因为工作上作出了一点成绩，并创造了对折裁剪法，被评为劳动模范。

“柜前有虎后有狼”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柜前柜后成一家了。职工在店里，有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的关怀，他们从政治思想上、经济生活上处处关心我们。职工身体稍有不妥，就劝我们休息，生了病还上门来看我们；在柜台外，顾客与我们的关系也亲如一家人，与解放前那些满脸横肉，面目狰狞的面孔相比较，更体会到

今天店員的幸福，這使我更加熱愛今天的櫃台生活。我決把我的一生，貢獻給社會主義的商業，貢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

顧忠慈整理

“广告大王”的“门槛”

上海市广告公司美工厂退休老工人 郭性善

解放前，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街头、屋顶，以及沪宁、沪杭、隴海、胶济等铁路沿线两旁，到处都可以看到耸立着的一块块油漆广告牌，上面画着各种商品的彩色图案；在广告牌的上面，写着一行大字：“荣昌祥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的老板被称为“广告大王”。

生財有道一本萬利

荣昌祥广告公司的老板学过道士。一九一二年，他背了一只破竹箱来到上海找“生財之道”。由于他能說会道，又会钻营，后来就与人合伙在郑家木桥开设“合兴隆招牌店”。不久，散了伙。以后他又向人借了七十五块銀洋，在武定路租了一間坐北朝南的店面，挂上“荣昌祥油漆广告”的招牌，經營起油漆广告来了。一九二八年，他巴結上伪公用局局长和一个科长，通过賄賂和其他手腕，攬下了公共广告場的大部分生意，他又千方百計地拉攏了伪公用局、社会局、巡捕房等处的九个流氓結拜为十兄

弟。有了这股恶势力的撑腰，荣昌祥要在哪里竖路牌，就在哪里竖，要竖多大就竖多大，有时路牌把居民的窗户都遮住了，人家也奈何不了他。就这样，荣昌祥老板为以后发展路牌广告找到了有力的靠山。再加上荣昌祥老板有独特的一套招揽生意的办法，并且剥削工人的“门槛”又精，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到凤阳路租地造屋，门口竖起了“荣昌祥广告公司”的大招牌。这时候，这家公司已拥有五万元的资金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除了上海的总公司以外，他还在南京、天津两城市设立了分公司，成为有名的广告公司，这个老板也被人称为“广告大王”。荣昌祥的资金从七十五元滚到三十六万银元，增加了四千多倍。

荣昌祥老板招揽生意的手法的确与众不同。他一般不是从生意谈起，而是从吃、喝、嫖、赌下手。每接一笔广告，他首先看准厂商方面掌管广告的人的爱好是什么，喜欢吃的，陪你吃遍上海名菜馆，喜欢玩的，就到处陪你玩，一切费用，勿须半点劳心，当你心满意足时，一张准备好的合同摸了出来。每当他与厂商交际时，总把三姨太、四姨太带在身边，随其暗示，小心侍候，乘机承接生意。老板说这是做生意必须具备的“投其所好，损小利以换大利”的经验！资产阶级为了钱，使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法，丢尽了脸皮。

荣昌祥老板弄来了大宗生意以后，他马上又伸出另一只手来压榨工人。他从小吝啬刻薄、诡计多端，苍蝇飞

过他头上也要被搞去一只脚，对工人他又有一整套刻毒的剝削手法，多少年来，工人吃尽了他的苦头。

剝削工人手段毒辣

荣昌祥老板认为要是长期雇用工人，在生意清淡时，便会养“闲人”吃“闲饭”，不合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他挖空心思想出长期雇用“短工”的办法。每逢接到客商订制本市或外埠的民墙、路牌广告，他就挖空心思地打算盘，往往只以订价的一半钱，招揽木工和油画工人来做“件工”。生意清淡的时候，便将这些人撇在一旁。这样，他就不会养“闲人”、吃“闲饭”了。老板这一手可害苦了工人。那时我们工人完成了一项承包的“件工”工程后，不知道到哪一天才有活干。为了找工作干，我们只能每天一早便到荣昌祥去等候。有时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見有活，只好带着沮丧、失望的心情回家。那时候的荣昌祥，真象是“荐头店”一样，每天坐满了等活干的工人。到了中午，老板和他的亲信围坐一桌进餐，吃着丰盛的菜肴，嚼着雪白的大米饭，有说有笑。可是坐在一旁的工人们，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眼前直冒金星。有的只好啃着又冷又硬的羌饼和大饼，聊以充饥。当时，我也是常去荣昌祥坐冷板凳的“老主顾”。有时候虽然侥幸接到了活，但暗地里却在担忧：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时往往被雇用一个月，就要失业半个月。因此，生活十

分困难，有时候家里連鍋也揭不开。

这个老板为了控制工人，还有一条断絕工人后路的毒計，就是在荣昌祥干过活的工人，即使在荣昌祥生意空閑时，也不准你到別家广告公司去做工。他和其他中小型广告公司老板約定：互不雇用属于对方名下的工人。如果你脱离了荣昌祥，休想在別家广告公司找到活干。工人们害怕砸了这只破飯碗，纵然連半饥半飽的生活也不能維持下去，还只得敢怒而不敢言。

就是派工，老板也是极其狡猾的，他总要等到工人手无分文，借貸无門时，才派点活給你做，并且乘机压低工价，工人明知吃亏，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忍受着。老板說的工价，还不許工人还嘴呢。一次，工人俞四信要求老板把工价調高些，触怒了他，从此竟叫俞四信坐了四年冷板凳。这真把俞四信弄得走投无路，后来只好去推小車度日。那时候的工人才真苦呢！荣昌祥不派工，在它名下的工人就等于失业，留又不是，走又不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听其摆布，任其宰割。

一九三九年，荣昌祥变成合資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又新来了一个老板，过去这个老板对工人已够刻薄的了，如今又添了一个圣約翰大学毕业的老板，真好似如虎添翼，工人遭的罪就更多了。新老板一上任，就施行了一个什么計算工价的折扣累进制。本来工价的計算方法是做多少面积，算多少錢，这个新老板来后硬說这样算法不合理，新規定每块路牌在二百平方呎以上者，工价打七折，

四百平方呎以上者打六折，八百平方呎以上者打对折。这样牌子越大，工人所受的剥削也就越深，这是明摆着从工人身上割肉。这个老板还有一手花招，就是他承接客户预订广告时，按银元或实物计算；但包给工人“伴工”时，却以伪法币计算，而且要等到完工后才付钱。预支给工人的钱，也要按银元折价扣除。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钞票，物价飞涨，工人们因此而吃的亏真是难以计算。工人孙瑞良就是深受其苦的一个，一九四九年，老板派他去京沪铁路沿线做“英雄牌絨线”的广告，去前向老板预支一些安家费、材料费和交通费，老板用银元折算，说是欠公司的，而对工价则用金圆券计算，说是等完工时来结账。孙瑞良就起早摸黑足足地做了三个多月。等他回来结账时，金圆券早已贬值得连草纸都不如了，老板却仍按当时用金圆券结的工价付给，而预支的安家费等则用银元按时价折算扣回，算下来，孙瑞良不仅白做三个多月，反而欠老板四千万金圆券。真是天下奇闻。但是，这的确是荣昌祥资本家的铁算盘里算出来的。

老板为了进一步榨取工人的血汗钱，他又想出了一个“金同仁”字号的投机组织，威胁利诱工人存款。有一个技术比较好的老工人徐绍唐，平时生活做得比较多，老板就硬要他把一年所得七百二十万元存入“金同仁”，后来币制贬值，物价飞涨，徐绍唐再三要求提出存款，老板却是再三拖延，以后通货膨胀得实在太不象话了，老板才叫徐绍唐来提取存款，结果连本带息，总共才值三打

“414”毛巾。工人一年所得就这样給老板吞沒了。

广告工人苦难深重

工人们为了在老板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件工”工程，只得拚死拚活地干。劳动条件很差，劳动强度又高。由于沒有劳动保护措施，广告工人經常发生工伤事故。工人们在高空画屋顶广告牌或大楼高墙广告时，沒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梯子搖搖晃晃，工作時間长，身体弱，有的就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死的工人，仅我記得的就有好几个。如有个工人叫陈邦才，不过二十来岁，在抗日战争期間，一次他在盆湯弄桥堍的一幢房屋頂上画广告牌，因为沒有安全防护设备，不小心誤触带电的电綫，一个“倒栽葱”从屋顶上摔下来，当场身死。还有一个是青工彭庆福，有一年冬天，他在云南路延安路口的大楼高墙上画广告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一着地，人就断气了。

可是工人跌死了，老板只当无介事，他說：“你們是临时工，和我沒有劳資关系。”推得一干二淨。彭庆福跌死那回，工人联合起来和他斗争，他看众怒难犯，假装慈悲地送了一口棺材，他还对死者的母亲說：“儂也勿要哭了！庆福死得这样排場（指有口棺材），也算是有福气了。”工人跌伤，老板更不当作回事。一次工人馬景超在南京路做工，从梯子上摔下来，正好老板走过，他赶紧上前去，但是他并不是关心工人跌伤何处，却是来責备馬景超“介勿

当心，把草地都压坏了。”在老板眼里，我們工人竟不如草！

一九四七年，有一次我被派到浦口一帶工作，不幸左脚受傷骨折，在南京的一家醫院里敷了石膏，便回到上海。老板給了我一點醫藥費，便將我一腳踢開了。我因為一家人全靠我掙錢糊口，傷勢稍有好轉後，便一蹶一拐地到榮昌祥去，要求老板再借給一點錢，老板一口拒絕說：“我哪有這些閑錢做好事！”

有些工人因過度疲勞被活活折磨死。老工人馬阿毛經常被派到外埠去畫牆頭廣告，由於日晒雨淋，受凍挨餓，得了毛病。後來他挽人再三向老板求情，好不容易調回上海工作。馬阿毛到上海後，老板便叫他到工場間做敲鉛粉塊的工作。老板為了多賺錢，買進的鉛粉都是一些次貨，已結成硬塊，要把硬塊敲碎，也要花不少力氣。馬阿毛雖然體力不支，但一家人生活担子壓在他的肩上，不得不撐着身子干，毛病一天天加重。有一天，他終於累得大口大口地嘔吐鮮血，昏倒在地，送醫院不治身死。老板知道馬阿毛的兄弟馬阿炳也在他公司里做工，便不肯支付喪葬費用，甚至連已經付給醫院的醫藥費，也在馬阿炳的工資內扣除了。

廣告工人除了擔心發生工傷事故外，還擔心年老。因為一到五十歲，老板就嫌你年老體弱不肯雇用。老工人王春九替老板做了一輩子牛馬，到了一九四八年，因年老體弱，便被老板一腳踢開，並且連回鄉盤川都不給。最

后，还是工人弟兄凑了一笔钱给他买了车票，他才能回到南京乡下。他回乡不久，就悲惨地死去了。资本家就象毒蚊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工人身上的鲜血，直到把工人身上的血吸干后才罢休。

翻身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工人阶级当了家、作了主。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首先向资本家争得了作为荣昌祥的正式工人的权利。一九五〇年我们又成立了工会。从此，工人有了党的领导，又有了自己的组织，觉悟提高了，不断和资本家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现在，荣昌祥广告公司全部并入上海市广告公司美术工厂，成了美术工厂的一个车间。

我们这些过去被资本家看得连草都不如的工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真正抬起头来当家作主。在路牌工人中，已有十个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人被国家任命为广告师；过去，被老板弄得坐冷板凳、走投无路的俞四信同志，如今是美术工厂的工会主席，担任了路牌车间的主任。

现在我们的劳动条件大大地改善了。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早就拆除了高墙上的危险广告牌，还为我们新盖了高敞的车间，并且把绝大部分路牌，都改装成活络的，可以拆下来在车间里画好，再运出去安装。在生活上

我們也徹底翻了身，过去我們为一日三餐发愁，为生老病死担忧，如今有了固定收入，又有了劳保，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过去做工反欠老板債的孙瑞良同志，前年生了肺炎，不仅得到很好治疗，厂里还給他假期休养，并且照发病假工資。許多老工人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享受退休的待遇，在家安度晚年。这一切的一切，我們过去怎么敢想象呢！

我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会給我們路牌工人带来真正的春天！

楊兴华整理

在“40000”的后面

上海市出租汽車公司党委宣传委員 黄玉成

解放前，上海人看到“40000”这个号码，就晓得这是“祥生汽車公司”的電話号头。就在这个号码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罪恶！

半辆汽車起家

祥生汽車公司老板本来是“礼查飯店”的西崽。这个飯店进进出出都是些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外国人。当时，祥生老板看到这些洋人来来去去都要坐出差汽車，但那时上海只有一个美国商人經營出差汽車，总共不过几辆，租一辆車每小时要收車費四、五块銀元。祥生老板眼看这个生意好，賺錢多，一九二〇年，他就向人借了点錢，拼拼湊湊，和别人合伙购买了一辆杂牌貨旧轎車，临时雇了个司机，拋崗在“礼查飯店”門口，专攬洋人的生意。以后，他又通过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的手段，套进了四辆汽車，就在武昌路开起了“祥生汽車行”。

祥生老板懂得，在上海滩上站住脚，首先要依靠外商

买办，勾結流氓地痞，做自己的后台老板。因此，祥生老板很快就与几家洋行的买办拉上了关系，巴結上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并买了个什么“特別巡捕”的头銜，結果車子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上海的时期，祥生老板又投大汉奸吳世宝之所好，亲自送去了一辆汽車。他还依靠沪西大流氓朱順林，一手包攬“好萊塢”、“六国飯店”等大賭場、舞厅和大飯店、火車站、輪船碼頭、机場等专利业务。汉奸陆連奎死了老婆，祥生老板就免費出借五十辆汽車給汉奸出丧用。他一面討好汉奸，一面就大做“祥生出差汽車广告”，当时曾哄动一时。

抗战胜利后，祥生老板又勾結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还送給陆京士三辆汽車。他自己也“官运亨通”，挂上了一个什么“上校”头銜，来欺压工人，欺压人民。

祥生老板有了依靠，有了后台，就更加殘酷地剝削职工，“日进斗金”、“財运亨通”，不过二三十年工夫，它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出差汽車公司之一。当时它拥有二百七十多辆汽車，雇有五百五十多个职工，并設置汽車站二十一处，还建立了一千多平方米的汽車修理保养車間。那时祥生汽車公司真是显赫一时。这还不算，祥生老板还到处搭股，如过去的中国紡織厂、亚洲銀行、中国国貨公司、民誼药厂、金門飯店、大鴻运酒楼、康乐酒家、浴德池、大众殯儀館等等，都有他的股份，并兼任近十多家企业的总經理职务。

要命的“三保”

祥生老板对职工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一个司机要想进祥生汽车公司，除了要拿出五担米的代价向祥生老板的亲信作为运动费外，还要向祥生老板交上“三保”：现金保、铺保、连环保。

司机进祥生，先要拿出一百块银洋作为“上生意”的保证金。很多司机为了这保证金，只得把家里所剩无几的东西卖光、当光，或者去借高利贷。这样，很多司机虽然进了祥生汽车公司，但一年到头就是借债、还债、欠债，没有一个尽头。如有个姓刘的司机，当时失业，一家七口生活无着，但为了“上生意”，好容易凑些钱七转八弯地请人介绍进祥生汽车公司。为了向祥生老板交上一百元的“保证金”，他饿着肚子天天东奔西走，却只借到二十块钱，还差八十元，没有办法，心一横，咬着牙借了八十元“印子钱”。他生意是上了，但家里连锅盖也揭不开，全家望穿眼，直熬到发工资那天，拿到了十几块钱工资，祥生老板亲信要他送礼，高利贷者逼他还债。这样一来，哪里还有钱拿回去养家活口，全家只得继续挨饿。为了生活，他只好再去借高利贷。有个姓萧的司机下手，为了想做司机，就在总站里请大家帮助，向其他司机借钱，五角、一元，零零碎碎凑到几十块钱。祥生老板知道这件事后，竟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穷鬼，胆子倒不小，竟敢在这里搞

鬼，快卷鋪盖回老家去！”姓蕭的就这样被老板停了生意。

祥生老板所規定的“現金保”，实际上是一种强盜式的掠夺。

有了“現金保”不算，老板还規定司机要找到洋行、錢庄、百貨公司之类的行商做鋪保。一般的小商小店，如剃头店、老虎灶、裁縫店、紙烟店的保都不要。所以进祥生汽車公司的司机，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和代价，托人求情送錢送礼，求那些行商老板做鋪保。祥生老板在保单上規定：“……如有不測，乃由天命，与本公司无关……立志願书人和保证人不得借故要挟本公司……”这样，老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剝削司机了。司机呢，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鋪保，为了保牢飯碗，逢年逢节要向做鋪保的老板送錢送礼，否則就不太平，就要停生意。例如有年中秋节，有个姓刘的司机实在无錢送礼，保证人一气之下，就跑上門，吵着要去退保，这个司机只得借了二十块錢送去，方才了事。

有些司机实在找不到老板規定的鋪保，就只好設法走“內綫”，送錢送礼，托人买通老板的亲信，去向祥生老板說情，找三、五个現职司机做自己的“連环保”保人。但倘若这个司机一旦出了个什么大事故，賠償不了祥生老板的“損失”时，那被圈在一起的“連环保”司机，就要共同分担“責任”，賠償祥生老板所規定的莫名其妙的“損失”。这样，就使司机之間，相互牵制，相互監督，永远被老板所控制。

好长的班头

祥生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用少雇人、多出差的办法，规定每个司机要连续做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才得休息一天。很多司机为了糊口，常常带病开车。有的实在煎熬不住，就把车开到半途停下来，向乘客打个招呼，借口去小便，乘机闭一闭眼睛，或站在风头里吹一吹，透口气。有的司机为了提神，就用万金油涂在眼皮上刺激一下。有的还用香烟头含在嘴里咀嚼，强打精神。有的还因此吸上了毒（鸦片）。这样就常常发生行车事故。发生事故后，倒霉的当然还是司机，祥生老板是一毛不拔的。

往往还发生这种极为悲惨的事：一部分司机实在支撑不住，病倒了，班头上的司机就是连续做了三天三夜，也不允许落班。祥生老板为了赚钱，哪管司机死活，看见谁落班，就用停生意来威胁司机。司机为了保牢饭碗，只得硬着头皮、睁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为老板卖命。有的司机就这样被逼连续做五天五夜、六天六夜。有个叫陆麟书的司机，连续做了近百小时后，实在做不动了，要求老板让他请一天假休息休息。老板对他說：“你要休息，请你回家去休息，上海找一只狗倒不大容易，招一百个开车的很便当。”老板說着看看陆麟书还不出车，就又威胁說：“你还站在此地不动，影响了生意，我找你算账！”

陆麟书一吓，只得把車勉强开走。可怜他眼看自己快要倒下来了，自己心里明白，若再开下去，一定要出事，就冒着被开除的危險，把車开进总站，决定回去休息一下。他昏昏沉沉地离开車子，搖搖晃晃地离开車站，刚过馬路，还没走滿百步，就在金城电影院門口，双手抱着电綫木杆，活活地累死了。

那时，这种悲惨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司机孙福杜，也因开车時間过长，疲劳过度，一天，当他把車子开到保修車間換汽車座垫时，竟弯着腰，两手撑在座垫上，死在車厢里。司机郭祥云因劳累过度，在东湖路汽車站暴死。司机丁庆祥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就倒在地上死了。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工人累死了，老板根本不負任何責任。

拿不到的工資

祥生老板对工人的剝削，同所有的資本家一样，真是挖空心思，絞尽腦汁。他还訂了很多規定来榨取工人的血汗。其中仅賠款这一条，就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

当时司机的工資，每月只有二十元左右，而老板对司机少得可憐的工資也要想出种种罰款賠偿办法，把它捞回去。如車子放出去，乘客跑了，就要在司机工資中扣除“空放回票款”。司机送走乘客，空車回站时，因为路上車多塞档，或多“吃”了几只紅綠灯，或者其他原因而超过回

站規定時間，就要扣司機的“過時款”。有些司機因連續做了八九十個小時，偶爾在車廂里打个瞌睡，也要扣款。如有個叫王福祥的司機，一次在半夜里出差後，疲倦極了，想稍為閉一閉眼睛休息一下，誰知竟睡着了，直睡到天亮才醒。當他慌忙把車子开到总站車庫時，老板竟要按照實際出差時間如數交款二十多元。後來托人懇求，最後賠了八塊錢才了結。

有時，車子進站放不下，司機只得把車子停在馬路旁，等調檔再進車庫。這時，要是被偽警看到，就要抄號碼。第二天，“新衙門”（偽法院）就會來傳票，把司機叫去罰款，而祥生老板可以一點不負責任。當時，司機被“新衙門”叫去罰款的名堂，也是多如牛毛，花樣百出。如闖了紅綠燈，就要罰五、六塊錢，甚至連多擡几下喇叭也要罰款。據說有個司機犯了所謂“新衙門”的“禁規”，來傳票要罰他一塊錢。當時這個司機因有急事，就借了一塊錢托一個學徒去代罰。這個學徒跑到“新衙門”，他想想氣不過，就為這個司機講了几句公道話，誰知惹怒了“新衙門”的偽法警，說他無理取鬧、搗亂法院，定要罰他大洋十塊。

司機出差，倘若碰到美國的爛水手（海軍），就倒楣了。這些爛水手經常惡作劇，把車窗、座墊、車廂內的設備弄壞，然後揚長而去。倒楣的是司機，又要被扣除車輛設備損壞賠償費。還有，司機經常碰到的是：車輛被碰碰擦擦，如果擦去一些漆，老板就要按照被擦去漆的面積大

小，要司机赔偿，少则二、三元，多则竟要赔上一二十元，甚至要司机完全赔新的。如汽车叶子板被碰擦，赔的更多。把碰坏的旧叶子板挂起来，司机称之为挂“火腿”。过些时候，老板又把它拿下来，重新补一补，漆一漆，再换到另外车辆上去。这要赔那要罚，当时司机名义上有工资，实际上很多司机连一半工资也拿不到手，有的还要倒贴给老板。据说，有一次发工资时，去拿工资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因为大部分司机的工资被扣除了还不够抵偿，所以大家都不敢去拿了。

司机因操作关系，或者忘记加水，或者车辆本身问题，或者与车相撞而造成车辆机械设备的损坏，司机都得赔偿，多的几十元、上百元不等。有些司机为了赔偿，被逼得家破人亡。有个司机叫丘云来，有一天闯了车祸，祥生老板叫顾问律师去打官司，后来说是官司打输了，老板要丘云来全部赔偿，甚至还要丘云来出打官司的费用。丘云来将自己家里所有东西卖光，还不够付赔偿费。他被逼得无路可走，一个人偷偷地跑到现在的瑞金二路的一条小弄堂里吊死了。司机车永才也是因为赔不起二百八十块银洋，上吊自杀的。

軟硬兼施

当司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大家就团结起来进行罢工斗争。祥生老板为了分化工人，磨灭工人的斗志，就采

取軟硬兼施的办法来对付工人，对付司机。

軟的，就是拿出一点經費办“司机同人俱乐部”，用騙、拉、拖的方式，引誘司机到俱乐部去玩乐、賭博。老板的亲信还叫自己的大小老婆住到俱乐部来，聚賭抽头。誰輸了錢，老板的亲信就假装关心的样子，以低利息借給他再賭，結果誰借得多，就輸得多。这样一来，輸錢的司机就无形之間被他們控制了。如有个司机叫小山东阿四，单身一人，被騙去賭博，向老板的亲信借了不少錢。到了冬天，他身上只穿一套单衣，洗車子时，赤着脚在冰滑的水門汀上走来走去。他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与其他司机一起鬧着要增加工資，老板的亲信馬上出来向他逼債，吓得他連話也不敢讲了。

硬的，就是从打罵直到开除。祥生老板是喜怒无常的，当他不高兴时，就对司机拳打脚踢，拿鸡毛撻子随便抽人，有时連職員也不能幸免。祥生老板对于那些敢于参加罢工斗争的人，就大批开除。有一次，一下子就开除三十六个司机。有的还被拘捕用刑，如有个姓吕的司机，积极参加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老板就誣告他偷公司的汽油，并賄賂伪警察局将他捉去坐牢。

祥生老板为了对付司机的反抗，除了勾結反动势力，四布走狗爪牙外，还特地招收部分外国侨民作司机，来監視中国司机。如中国司机起来斗争、罢工，要求增加工資时，祥生老板就故意叫外国司机去出車。

祥生汽車公司老板的罪惡发家史，不就是千百个司

机的血泪史嗎？

新企业的新风尚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派来了干部，重新整顿祥生汽车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后，改名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从此，工人、司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领导上对工人、司机各方面都很关心。每年到夏天，早已准备好的凉席、竹榻都已安放在各停车站和公司大礼堂内，好让司机同志安静休息。科室干部还到停车站为司机送毛巾、送消暑的清凉饮料。为了方便做夜班和路远的司机能睡足歇好，还设有单人宿舍十多处。在党的教育下，司机的政治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决心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在司机中涌现了很多的好人好事。热情主动，体贴乘客，扶老抱幼，抢救病伤，帮助乘客寻亲找友，帮助乘客解决困难，在司机中已形成风气，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赞扬。